

中国古代农民战争



毛主席语录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目 录

绪 言	1
陈胜 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革命战争	11
绿林赤眉大起义	33
黄巾大起义	52
隋末农民大起义	65
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革命战争	80
两宋时期的农民大起义	100
元末红巾大起义	119
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革命战争	136
清代中叶各族人民大起义	165
附：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简表	185

绪 言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史，早在四千多年以前，就从原始社会跨进了奴隶社会，在这一千五百多年的奴隶制的历史阶段里，奴隶和平民反抗奴隶主贵族的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阶级斗争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因而在公元前四七五年，我国历史进入到封建社会。

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史。每次农民革命斗争，都是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愈演愈烈。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与农民革命战争，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时间之长，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

“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遵循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我们应当着重学习与研究中国的现代史和近代史；也要重视学习以农民战争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史。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不仅要熟悉祖国的今天，也要知道祖国的昨天和前天。学习农民战争史，能够使我们了解封建社会阶级

斗争的具体内容，和明了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与总的趋势，从而加深对农民革命战争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的理解。这对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服务于现实的阶级斗争与批判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的反动谬论，均具有重要意义。

在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是在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血腥统治和残酷剥削的情况下发生的。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革命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秦朝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使广大农民处于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陈胜、吴广才率戍卒“揭竿而起”。唐末农民革命战争则是由于惊人的土地兼并与繁多的苛捐杂税，使“贫者无立足之居”、“无米复无柴”，黄巢才带领贫苦农民奋起反抗。明末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战争，也是因为封建统治者对劳动人民敲骨吸髓的剥削，使农民流离失所，造成“乡乡几断人烟”，李自成才高举义旗领导广大农民南征北战。许多农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事实，展示了这样一条真理：“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

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农民群众，面对封建统治者剥削和压迫的血泪斑斑的现实；与地主阶级“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在政治上要求平等、经济上要求平均，充分地体现农民起

义的“等贵贱、均贫富”的政治纲领里。从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唐末农民革命领袖黄巢自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直至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提出的“均田免粮”等革命口号为止，反映出封建社会中农民革命思想的辩证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对孔孟所宣扬的“君权神授”和他们维护的宗法等级制度的一个沉重打击。广大农民群众在“均贫富”的革命思想指导下，对封建统治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铁的事实给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所宣扬的农民群众是没有独立思想的“乌合之众”等无耻谰言，以一记响亮的耳光。是对孔孟鼓吹的“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以有力地批判。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秦末农民起义的另一名领袖吴广，利用“篝火狐鸣”喊出“大楚兴，陈胜王”；黄巾起义领袖张角在传播“太平道”的同时，宣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宋代农民起义领袖方腊在传播摩尼教的过程中，广泛宣传“法平等，无有高下”；元末红巾起义军宣传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直到明末李自成大起义编出的“金江山，银江山，闯王江山不纳绢”等通俗易懂的歌谣，都起到了革命的动员作用。这充分说明起义农民懂得推翻地

主政权建立农民政权大造革命舆论的重要性。当然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受生产地位与生产规模的局限，农民不可能建立科学的革命理论。因之，这种革命舆论的宣传从农民最迫切的愿望出发，采用民谣、歌谣和寓言等形式，虽然有些与传播的宗教相结合，披上迷信的外衣，但却成了发动起义的工具，迸发出革命的光辉；广大农民利用宗教作为联合自己力量的手段，进行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不能不说还具有某种策略上的意义。

“世界上的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农民革命战争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地主阶级的政权，因为地主阶级之所以成为压迫农民的统治阶级，就是由于它们掌握着军队、监狱、法庭等国家机器，实行地主阶级的专政。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者，利令智昏，以为他们掌握了反革命的“暴力”，就可以为所欲为，对广大劳动人民就可以任意宰割，甚至梦想他们的统治会千秋万世，可是历史的客观规律却粉碎了这群丑类的痴心妄想。恩格斯指出：“**被统治者和被剥削者在任何时代都比统治者和剥削者多得多，所以真正的暴力总是在前者的手里。**”被统治被剥削的贫苦农民，当意识到封建地主是其不共戴天的仇敌的时候，便发动起义进行坚决斗争，这才是真正的暴力，封建皇帝的王冠之所以一顶一顶的落地，封建皇朝的政权

之所以一代一代的崩溃，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关系之所以一次一次的被砸烂，都是农民革命斗争的结果。

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斗争的革命道路，与所有的革命斗争一样，并不是平坦笔直、一帆风顺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的理论，同样适合于农民革命战争。因为农民革命战争，有它叱咤风云、波澜壮阔的斗争局面；也有表面平静的低潮时期，虽然结局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反封建的斗争却越来越深入。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证明：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农民革命战争已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

历代农民革命战争，在浴血奋战中，都建立了农民的革命政权。如陈胜、吴广建立的“张楚”政权，黄巢建立的“大齐”政权，红巾军建立的“大宋”政权，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等，都是贫苦农民在革命斗争中所建树的不朽的历史功勋。农民革命政权建立之后，颁布了一系列代表农民利益的“政纲”，制定了许多多打击封建地主的措施。如黄巢领导的农民军，在攻下长安时“见贫者往往施与之”，而对封建官吏则“得者皆杀之”。起义农民爱憎分明的革命行动，迫使地主阶级的文人也不得不发出“天街踏尽公卿骨”的哀鸣。对封建地主的打击，就是对贫苦农民的解放，在明末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当起义军还未到达时，在广大农民中便传诵着“早早开门迎闯王，管叫大小都欢悦”的歌谣。这充分证明：“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起义军还制定了“均田免粮”、“三年不征”的政策，在河北、山西和山东的部分地区把地主占据的土地、房屋和耕牛分给农民，并且使封建的“纲常法纪，扫地无余”。这就体现了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专政，这也说明农民革命战争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可是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却抛出反动的“让步政策”论，鼓吹什么：“每次农民战争的结果，时常迫得新兴的朝代不能不对农民给些让步，使农民得以稍微休养生息。因而把生产力的发展或多或少地推动了一步。”这纯粹是无耻的捏造。因为封建地主的剥削阶级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在农民革命战争失败后建立的封建王朝是旧王朝统治的继续，所以它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恢复已失去的“天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一步一步地夺回它们在农民革命战争中所丧失的一切，这是地主阶级制定统治政策、实行反攻倒算的出发点。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把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说成是对农民阶级的“让步”，其罪恶目的就

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

农民战争史，又是封建社会劳动人民反孔斗争史。反孔斗争，是在它们反对奴隶制残余、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秦末陈胜“奋臂为天下倡”，到纵横捭阖，叱咤风云的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所提出的一切斗争口号和革命纲领，都沉重地打击了儒家思想借以存在的反动基础，从根本上批判了儒家的思想观点。反动的地主阶级为了维持日趋没落的封建统治，曾把孔老二抬到吓人的高度，把儒家思想上升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使儒家思想更加腐朽和反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农民战争不但猛烈地冲击了儒家的理论基础，而且直接地声讨了这个反动地主阶级的“圣人”——孔老二。金代的红袄起义军，曾烧毁了曲阜的孔庙，使“殿堂庑廊灰烬什伍”；明中叶的农民起义军，再度攻占曲阜，驻军孔庙，把《四书》、《五经》扔进水池，砸碎了尊孔祭器，将孔门血统的世袭大地主扫地出门；明末农民战争的兵锋所至，使各地尊孔文庙“遗迹鲜有存者”。几千年来，以农民战争为主体的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如火如荼，一浪高过一浪，猛烈地冲击着地主阶级维护统治的思想堤坝。无数事实充分表明，劳动人民是反孔斗争的主力军。

在农民起义军内部，曾出现过复辟反复辟、投降

反投降等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这是阶级斗争在农民起义军内部的反映。

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是农民和地主之间进行的两个阶级的大搏斗。封建统治者对农民革命采取武装镇压和政治欺骗（包括招安）的反革命两手，企图达到消灭农民革命和维持其封建统治的目的。在封建社会初期，奴隶主残余势力，乘机钻进农民起义军中，大搞奴隶制复辟活动。在地主阶级内部由于派系斗争等原因，有的地主分子伪装革命，混进农民革命队伍中，还有的农民起义军领导集团中的个别成员，被剥削阶级腐蚀拉拢蜕化变质或屈服于敌人的武装压力而投降变节。他们在起义军内部大搞封建复辟和投降等罪恶活动，同外部敌人遥相呼应，形成一条反革命的阶级投降路线。因此，农民革命，一方面要用革命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同时还要不断揭露和打击剥削阶级的政治阴谋。特别是同隐藏在农民革命内部的反动势力进行尖锐复杂的斗争，坚持农民革命路线。这就出现了农民起义军内部的复辟反复辟、投降反投降等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农民革命战争史，曾无数次的证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个伟大真理。当农民起义军中的革命路线，击败了复辟、投降路线之后，就促进了农民革命的飞快发展，加速了封建王朝

的灭亡。反之，就会把革命引向失败。这是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给后代留下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我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并为以后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得到巨大进展的。”正因如此，农民革命斗争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然而这种对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与对反面经验，即深刻教训的认识也是分不开的。农民革命战争，虽然把封建王朝一个一个的摧毁了，但因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新的阶级力量和先进的政党作领导，从而被地主贵族利用了去，当作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是封建社会历史上农民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留给后代的最基本的教训。

农民革命战争的结局虽然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了，但是农民革命的火把也总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进行前赴后继地英勇斗争。学习起义领袖和农民群众敢于向地主阶级挑战、高举革命的造反旗帜的斗争精神，就更能激励我们的革命斗志，勇敢地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现代修正主义者同封建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一样，从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出发，极力歪曲和诬蔑农民革命战争。把反抗封建统治的革命农民贬为“盗贼”，而把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称为“英雄”，这完全

是对历史的颠倒。我们一定要遵循关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伟大真理，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我们必须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积极参加批林批孔斗争，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坚持反修防修，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

陈胜 吴广领导的秦末 农民革命战争

公元前二〇九年，在中国历史上，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统一了中国，结束了战国以来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制和国家的统一，坚决实行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路线，同代表奴隶主残余势力的儒家复辟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斗争中，推行了有利于国家统一的郡县制，在全国确立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他还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等等，使全国有了大体相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奠定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基础。这对我国历史的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

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说：“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但是叛徒、卖国贼林彪，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儒反法，对秦始皇进行恶毒的咒骂。充分的暴露了他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用心。

毛主席指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新兴地主阶级毕竟是一个剥削阶级，秦始皇毕竟是一个剥削阶级的代表，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来说，它们在推进封建化的过程中，同样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使用暴力镇压奴隶主残余势力的复辟活动，这是进步的。另一方面也使用暴力对广大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这是由它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从地主阶级产生的那一天起，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就已经开始。秦统一后，伴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巩固，农民反抗地主的阶级斗争，必然是日渐激化。

新兴地主阶级，虽然反对了奴隶制的残余势力，在客观上有利于广大农民摆脱奴隶地位，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由于它们带有剥削阶级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使它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同奴隶制彻底决裂。新兴的封建制代替腐朽的奴隶制，毕竟是一种剥削制

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同时，它又是刚刚从奴隶制脱胎而生，其发展也不够完善，因此，封建制度本身，保留了相当浓厚的奴隶制因素。

毛主席指出：“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为了巩固和强化地主阶级的统治，封建国家用各种刑法，一方面用来镇压奴隶主的复辟活动，同时也用来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他们制定了割鼻、砍脚、杀头、车裂、活埋、灭族等十几种刑罚，企图用这种办法，把广大农民永远置于它的奴役之下。

秦朝地主阶级，疯狂地掠夺土地，迫使占有一小块土地的农民纷纷破产，有的沦为给地主“佣耕”的雇农，有的沦为以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的佃农。租种土地的农民，要向地主缴纳收获物的一半以上作为地租。广大农民除了受地租和劳役剥削外，还要向封建国家缴纳沉重的赋税和承担无偿的徭役，去养活一大批剥削和压迫人民的贵族、官僚和军队。秦朝统治集团仅在修筑阿房宫和骊山墓（秦始皇墓）这两项工程上，就强迫民工和刑徒七十万以上（其中大部分是劳动人民）从事繁重的劳役，不知有多少劳动人民，在这种奴隶式的劳动中，累得骨断筋折，甚至惨死在荒山蔓草之中。广大劳动人民，在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下，经常过着“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的奴隶生活。有

的甚至“嫁妻卖子”，再度沦为奴隶。

新兴地主阶级，虽然给奴隶主残余势力以沉重打击，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将奴隶制残余势力扫除干净。不但秦朝政府保留了许多官奴婢，特别是六国贵族，有的还占有土地，采用奴隶制的剥削方式，六国的大工商奴隶主们，更利用手中的“余财”，大搞奴隶制经营，有的甚至成为“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的富豪。广大农民除了受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外，还受到奴隶主残余势力的威胁，随时随地都有沦为奴隶的可能。至于奴隶和奴隶的子女，没有任何人身自由，被当作会说话的“牛马”，有时还被装在木笼里，放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甚至被任意杀害。

被打倒的奴隶主阶级，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它们时刻梦想恢复已经失去的“天堂”，复辟奴隶制度。在公元前二一〇年，以赵高为代表的奴隶主残余势力，发动了沙丘反革命政变。赵高是埋藏在秦朝封建政权内部的野心家。他原是赵国贵族的后代，因为“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乃自宫以进”，由于他善于耍两面派，欺骗了秦始皇，并得到重用。在公元前二一〇年，秦始皇巡游到沙丘时，因病去世，野心家赵高，利用掌管皇帝印玺和起草机要文件的职权，诱骗胡亥、威胁李斯，发动了沙丘反革命政变。赵高政变后，控制了秦朝中央政权，立胡亥为秦二世，用儒家路线

代替法家路线。一方面，“更为法律”，对地主阶级当权的法家人物，进行血腥镇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并实行“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的复辟路线。企图把被打倒了的奴隶主残余势力，重新扶植起来，骑在人民头上，过着榨取奴隶血汗的奢侈生活。另一方面，利用和扩大封建制本身保留的奴隶制因素，并加重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封建压迫和剥削，以此作为复辟奴隶制的步骤之一。这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当时在政治上，是“法令诛罚，日益深刻”；在经济掠夺上，是“驱山未毕，复作阿房”，“赋敛愈重，戍徭无已”。赵高为了巩固其反动政权，在关中一带集结大量军队，并下令“郡县转输菽粟”，“头会（按人纳税）箕敛（用簸箕按户收赋）以供军需”，由于这种残暴的封建掠夺，使咸阳周围三百里地的广大农民，得不到自己种的粮食吃。赵高复辟集团，已把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提高到最大限度。当时的秦朝，上有赵高复辟集团兴风作浪；下有六国贵族群魔乱舞。它促使社会矛盾普遍激化，特别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发展到尖锐化的程度。一场大规模的农民反封建、反复辟的革命战争，即将来临，它好象在全国已堆满了易燃的干柴，只要有星星之火，就会迅速形成燎原之势。

二

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公元前二〇九年（秦二世元年）七月，赵高复辟集团，强迫陈胜、吴广等九百名贫苦农民从安徽、河南出发，到渔阳（北京密云西南）去当戍卒。陈胜是阳城（河南登封）人，年轻时就为地主“佣耕”，是雇农出身。有一次给地主种地的时候，停下活来，他站在田垄上，“怅恨久之”，向伙伴们说：“苟富贵，勿相忘”。这句话倾吐了他内心的不平，表达了他要革命的“鸿鹄之志”。富与贫、贵与贱，是封建社会地主和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尖锐对立的具体表现，陈胜要求改变贫与贱的地位，这种革命的思想，有力地批判了孔老二的“富贵在天”的反动谬论。吴广是阳夏（河南太康）人，也是贫苦农民出身。陈胜和吴广同当时的所有贫苦农民一样，对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充满了深仇大恨，造反精神很强。他们在向渔阳进发的途中，经过蕲县大泽乡（安徽宿县西南）时，遇上滂沱大雨，道路被冲毁，不能按期赶到，按照秦朝的戍役法规定，误期就要杀头。

陈胜和吴广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分析了“天下苦秦久矣”的形势，共同商定举行武装起义，杀出一条生路，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事先陈胜和吴广，

在群众中大造革命舆论。他们用朱砂在帛条上写下“陈胜王”三个字，把它塞进鱼腹中，戍卒买鱼烹食，剖开鱼腹，见帛条上的红字，甚为惊异。吴广又在夜里，秘密的到营舍附近丛林中的神庙里，点着灯笼，学作狐狸的声音，高叫：“大楚兴，陈胜王！”戍卒们听到后，更加惊异。用这种“鱼腹丹书”和“篝火狐鸣”的方法大造舆论，虽然在形式上带有迷信色彩，但是，它的内核是革命的。正当九百名贫苦农民，处在“失期当斩”的死亡前夕，得知这样的消息，必然在群众中点燃起革命的火种，坚定了他们造反到底的决心。

有一天，陈胜和吴广，乘机杀了押送他们的反动军官，群众集聚在他们周围，陈胜挺身而出，慷慨激昂的向大家说：“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就是不被杀头，十之六、七也要被那种苦役折磨死，“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这番铿锵有力的誓言，不但揭露了秦朝的徭役把广大戍卒逼得走头无路，而且表达了他们视死如归的革命决心，特别是提出王侯将相，并不是天生的贵种，要打倒他们！这个战斗的口号是“犯上作乱”的动员令；是批判孔老二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战斗檄文；是一篇造反的宣言书。陈胜的主张受到同命运共呼吸的九百农民的热烈拥护，他们“削木为兵，

揭竿为旗”，一致公推陈胜为将军，吴广为都尉，号称“张楚”，就这样，在公元前二〇九年，于大泽乡，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

陈胜、吴广领导的，以九百贫苦农民为骨干的起义队伍，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很快就攻克了大泽乡和蕲县(安徽宿县南)，起义军队伍不断壮大，继续乘胜前进。这时候，陈胜派葛婴率领一支队伍，向蕲县以东进军，自己率主力部队，向西挺进，直捣秦朝的心腹地区。主力部队迅速地攻克了安徽河南交界的铍(安徽鄆县)、潞(河南永城)、谯(安徽亳县)、苦(河南鹿邑东)、柘(河南柘城)等重要城镇，逼近了秦代的著名城市——陈县(河南淮阳)。这时，起义军已经拥有战车六、七百辆，骑兵千余，步兵数万的强大队伍。在陈县经过激烈的战斗，击溃了顽抗的秦军，打死了秦朝的守城官吏，攻克了陈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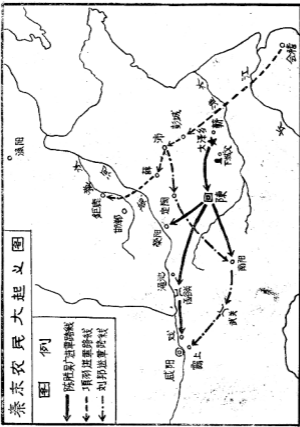
历史上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总是迷信武器的，秦朝统治者也是这样。但是历史的发展，总是同反动派的愿望相反，大泽乡的起义农民，用农具、竹竿和木棒打败了用各种精良兵器装备起来的秦朝反动军队，农民用革命的实践，击破了剥削者的反动的唯武器论。



大泽乡起义

秦末农民大起义图

图例
 —— 陈胜、吴广起义路线
 —— 项羽进军路线
 —— 刘邦进军路线



三

毛主席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的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燃起的烽火，迅速在全国各个角落里燃烧起来。各地起义军，“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在农民革命战争的巨大浪潮推动下，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分化，有一部分秦朝的官吏，特别是下级官吏，怀着不同的目的参加了反秦活动。还有一部分官吏，按兵不动，注视形势的发展，企图在农民战争中，乘机夺取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地主阶级的统治已处于分崩离析的局面。特别是“散处闾巷之间”的六国贵族分子，在翻江倒海的农民革命中沉渣泛起，在阴暗的角落里纷纷打出反秦旗号，在各地混水摸鱼，大搞复辟活动。更有的混进农民起义军中，企图改变农民革命的方向，为其反革命复辟的目的服务。魏国旧贵族势力的余孽，张耳和陈余，混进起义军队伍后，又把孔老二的八世孙孔鲋拉进来，在农民军内部，形成一股反革命复辟逆流。孔鲋抱着孔老二传家的“礼器”来见陈胜，要陈胜“法先王”，要“兴灭继绝”。陈胜对他的谬论，当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六国之后，吾不能封也’，过去那些贵族，同我根本没有关系，我是绝不‘法先

王’的”。使孔鲋的企图遭到可耻的失败。

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由于不断地取得胜利，推动了全国反秦斗争形势的迅速发展。为了将各地农民起义军联合起来，促进农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最后摧毁秦朝反动政权，因而迫切需要建立农民革命政权。起义军攻克陈县后，当陈胜开始着手酝酿成立革命政权的时候，却遭到张耳、陈余的坚决反对，他们提出要在各地立“六国”贵族的后代为王，割据一方，企图恢复秦统一前的分封割据局面，妄图扭转历史车轮的前进，破坏农民革命的胜利发展。陈胜拒绝了张耳、陈余的主张，于公元前二〇九年（秦二世元年）七月，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国号“张楚”，以陈胜为王，吴广为副，称假王。从此陈县便成为农民革命的中心。以陈胜为首的农民领袖，同代表旧贵族势力的孔鲋、张耳、陈余等人的分歧，是引导农民革命向何处去的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问题，这是在农民起义军中尊儒和反儒，复辟和反复辟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激烈反映。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的建立，是革命农民同内外阶级敌人斗争的产物，这是两千多年前，中国农民在革命战争中所创造的历史奇迹，这个政权存在的时间虽然只有六个月，但是，它推进了全国人民反秦斗争的胜利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为后代农民革命，树

立了光辉的榜样。

农民政权成立以后，各地人民的反秦斗争，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广大人民纷纷地响应陈胜、吴广的起义，当时“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扳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尉。”对地主阶级分子，奴隶主残余势力及其封建政府中的反动官吏进行坚决镇压，革命洪流，席卷全国，“天下云集响应”，各地参加起义的人，就象潮水一样，势不可挡。

在这个大好的革命形势下，陈胜又作了全面的军事部署，向敌人展开了一次主动的、规模宏大的武装进攻，分别派出三支大军，向西方——秦朝统治中心进攻。

由宋留率领的一支起义军，向西南方向迂回前进，很快的攻克了南阳（河南南阳市），为进攻关中的重要门户——武关，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吴广统率西征大军，向西挺进，一路上，取得不少的胜利，当这支大军进至荥阳（河南省荥阳东北）时，遇到了秦朝主力部队的顽抗，秦军死守荥阳不出，起义军猛攻不下，使战局处于胶着状态。

当战报传到陈县后，陈胜再派周文率军西征。周文避开敌人的主力，集中兵力向敌人的后方挺进，争取了战争的主动权。大军所向势如破竹，秦朝的统治

势力纷纷瓦解。这支军队，在进军途中，得到了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持，使队伍不断地得到扩大和补充，这时，周文大军的战车已经达到一千辆，战士也发展到数十万。九月，大军进驻戏(陕西临潼东)地，直接威胁了秦朝的统治中心——咸阳(陕西咸阳市东)。

以赵高为头子的一小撮统治者惊慌万状，不知所措。充分地暴露出他们的纸老虎面目，秦朝封建政权，已临近总崩溃的前夕。

四

毛主席指出：“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当时的农民起义，虽然遍及全国各地，但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不能协同配合作战，有的甚至不服从统一指挥。例如，陈胜听说秦嘉等人在淮北各地起义，曾派武平君为将军，前去指挥；但是，秦嘉不但不服从，反而杀害了武平君。

特别是起义军内部的某些将领，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失去应有的警惕，给敌人钻了空子。在大泽乡，同陈胜共同起义的葛婴，按照陈胜的命令，率兵东征，一直打到东城，他曾错误的立襄疆为楚王，但他得知陈胜建立政权后，立刻处死襄疆，并“还叛至陈”，表明他已认识自己的错误，并拥护农

民政权的决心，但陈胜反而把葛婴处死。当吴广率军攻打荥阳的时候，混入起义军内部的野心家田臧，竟伪称陈胜的命令，阴谋杀害了吴广。陈胜对这一严重破坏革命纪律和团结的行为，不但没有严肃处理，反而提升田臧为上将。不久围攻荥阳的起义军被敌人击败。这些事例，说明了由于个别领导者的骄傲情绪，使其不能有效的团结战友，严肃革命纪律，因而削弱了对敌斗争的力量，给革命带来了损失。

最严重的问题是钻进起义军内部的“六国”贵族分子妄图利用起义军的力量，恢复封建割据的局面，搞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当张耳、陈余反对建立农民政权的阴谋失败以后，他们贼心不死，在起义军胜利发展时期，陈余乘机向陈胜吹嘘自己熟知河北一带的地理、人情，要求率领一支部队，到河北去扩大起义军的力量，企图骗取一支队伍，作为他进行复辟的工具。当时，陈胜没有识破张耳、陈余的阴谋诡计，同意了他的意见，并派武臣为首，张耳、陈余为副，率领一支军队进行北伐。武臣这支军队，在北渡黄河后，一方面公开打着陈胜起义军的旗号，骗取了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又阴谋制造“割地有土”，成“封侯之业”的反革命舆论，到处煽风点火，鼓吹复辟活动。当武臣率军进驻前赵国都城邯郸（河北邯郸市西南）以后，在张耳、陈余的策划下，便公开叛变了起义军。武臣自立

为赵王，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成为一支反动的割据势力。此后，盘踞在北方各地的贵族势力，便纷纷乘机复辟，割地称王。这种局面，严重地阻碍了农民起义军在这些地区的发展，使起义军陷于孤军作战的被动局面。

当西征的周文大军，进逼咸阳的时候，赵高等人吓得手忙脚乱，使用各种手段，拼凑了数十万反动军队，由刽子手章邯率领，向起义军猛扑过来。就在这关键时刻，陈胜曾命令武臣前往支援，但张耳、陈余正极力策划扩大割据势力，根本不予出兵，坐视不救，从而使周文大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被秦军打败，退出关中。最后在滎池(河南滎池县)一战，这支军队被击溃，周文壮烈牺牲。吴广一军，在吴广被害以后，战局愈处于不利地位，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战败。宋留一军，在攻占南阳后也被打败，宋留投降了秦军，当了可耻的叛徒。

在起义军作战相继失利的情况下，秦朝反动军队于公元前二〇九年十二月间，尽全力向起义军的中心陈县反扑，陈胜亲自率军奋力抵抗，由于军力众寡悬殊，无法坚守，向东转移到下城父(安徽蒙城县西北)地方，准备重整旗鼓，继续战斗。但就在这一紧要关头，给陈胜赶车的叛徒庄贾，暗杀了陈胜，出卖了革命，投降了敌人。起义军失去了自己的革命领袖，使农民

革命事业遭受了重大损失。

但是，英勇的起义军，并没有被消灭、被吓倒，革命斗争仍然继续进行。陈胜的部将吕臣，在新阳（安徽太和西北）率领有广大奴隶参加的起义军——苍头军，在艰苦的条件下，主动地对秦军展开了猛烈的反击，秦军被打得落花流水。起义军乘胜收复了陈县，处决了无耻叛徒庄贾。秦军不甘心失败，重新组织反扑。起义军撤出陈县，又联合英布为首的起义军，进行联合反攻，在青波（即青陂，河南新蔡西接息县界）地方，又击败秦军，再度收复陈县，又恢复了“张楚”国号。到公元前二〇八年（秦二世二年）春天，吕臣领导的起义军，主动的同另一支起义军联合起来，继续同敌人进行斗争。

在各地起义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刘邦率领起义军迅速西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占宛城、陷武关，直指咸阳。这时赵高集团，已临近垮台前夕，但他们并不甘心失败，仍作垂死挣扎。赵高率党羽二次发动政变，逼迫秦二世自杀，企图另立秦王子婴为傀儡。并向起义军提出分王关中的主张，妄想割据一方，保存其反动势力，以便得到喘息之机，重新组织力量，进行反扑。赵高的求和，被起义军拒绝，使其阴谋破产。不久，赵高被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秦王子婴杀掉。起义军，并没有因为赵高的垮台，而停止其

前进的步伐，终于在公元前二〇六年十月，进驻咸阳。秦王子婴，无力抵抗，只得捧着打算“传之万世”的玉玺，向起义军投降。秦朝的统治政权，终于在农民革命的怒火中烧毁，显示了农民革命的巨大威力。

秦朝灭亡后，国内政治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农民革命被剥削阶级利用了去，分成两大势力。以项羽为首的六国贵族势力，顽固推行复辟倒退的儒家路线，篡夺了农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凭借其暂时强大的武装力量，大搞割据复辟的反革命勾当，他自封“西楚霸王”，强封刘邦为“汉王”，把全国分成十八个王，使中国暂时出现分裂割据的倒退局面。以刘邦集团为首的地主阶级势力，继承法家路线，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坚持地主阶级专政，反对奴隶主复辟，利用农民革命所造成的历史趋势和威力，同项羽为首的反动势力，展开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史称“楚汉之争”。

楚汉战争时期，失道寡助的项羽反动势力，越来越弱。得道多助的刘邦统一进步势力，越战越强。公元前二〇二年，刘邦联合各路大军会剿项羽，最后，把项羽包围在垓下（安徽灵璧县东南）。在四面楚歌声中“霸王别姬”，率残兵突围逃跑，走向穷途末路的项羽，只有在乌江边上自刎。项羽死前胡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这种顽固到底的自白，只能作为历

史的笑柄。

项羽失败后，刘邦统一全国，重建地主阶级封建政权。历史上叫做西汉王朝。

五

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起义，虽然被地主和贵族所利用，成为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而失败，但是，这次起义所创造的英雄业绩和它产生的极为深远的影响，却是不可磨灭的。

大泽乡的起义，最初只有陈胜和吴广几个先进人物，他们敢于大造革命舆论，组织反秦斗争。接着是几百名手无寸铁的农民“削木为兵，揭竿为旗”，同貌似强大的敌人，进行英勇奋战！当时的革命力量，只不过是星星之火。但是，他们那种敢于斗争、敢于造反、敢于革命的伟大精神，不断地唤起和鼓舞着千百万人民站起来，参加反秦斗争，使革命的烈火燃遍了大半中国。这次起义，宣告了被压迫的农民，以战斗的姿态，登上封建社会的政治舞台。它在这个斗争舞台上，第一次举起了农民战争的革命火炬，为以后千百万的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革命斗争，照亮了前进的道路。作为这次起义的领导者——陈胜、吴广，平凡而伟大的名字，为中国人民千秋万世所传颂。

秦末的革命农民，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创

建了第一个与封建政权相对抗的农民政权。这是农民群众的智慧结晶，是革命农民的伟大创举。起义军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口号之下，团结了广大革命群众，并以农民政权为中心，形成了一股巨大的革命暴力，仅仅用二年多的时间，就横扫了包括今天的河南、山东、河北、陕西、安徽、江西、江苏、福建等广大地区的反动势力。农民起义军兵锋所到之处，反动的地主贵族纷纷地倒下去，击溃了地主阶级的一统天下，把地主阶级的统治政权，从地方到中央统统砸碎。这是农民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马克思指出：“假如封建领主碰上农民的大草叉（这到一定时候是很容易发生的），徭役就会自行消失的。”正是广大的革命农民，用革命的暴力，才铲除了秦朝的繁重徭役和严刑酷法，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和封建土地占有关系，给地主阶级以极为沉重的打击。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这次农民革命战争，在进行反封建统治的同时，还肩负着反对奴隶主残余势力及其反革命复辟的历史任务。革命的农民，是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进行反复辟斗争的。它不是反对奴隶制，拥护封建剥削，也不是反对奴隶主专政，拥护地主阶级专政。而是既反对封建统治，又反对奴隶制复辟。这一斗争的性质和深度，是地主阶级法家人物的反复辟斗争所不能比拟

的。赵高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大量屠杀执行法家路线的封建官吏，疯狂镇压广大劳动人民，在这一反革命的白色恐怖面前，地主阶级法家人物无能为力，表现出新兴地主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相反，秦末农民大起义，以巨大的革命暴力，粉碎了赵高为首的奴隶主残余势力的复辟活动。并以前所未有的气势，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奴隶制残余；而且对维护奴隶制残余的反动思想，给以强有力的打击，开创了封建社会劳动人民用革命战争的形式，进行反孔斗争的新篇章。在革命战争中，不但广大农民暂时摆脱了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同时，不论在奴隶主势力控制下的奴隶，或秦王朝本身所控制的官奴，都纷纷起来造反，通过自己的斗争，砸碎了奴隶身上的枷锁，获得了人身自由，参加了革命战争，给奴隶制残余势力以有力的打击。历史表明，广大劳动人民，是反复辟、反倒退的主力军。

总之，秦末农民战争，改造了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的复辟势力，为西汉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开辟了道路。

六

陈胜、吴广大起义，给后代留下了重要的历史教训，那就是力戒骄傲，加强团结，坚决肃清内部的反

革命复辟势力。由于革命的不断胜利，使某些领导者产生了骄傲思想，放松了革命警惕，给敌人从内部进行破坏活动，造成了可乘之机。陈胜和吴广这两位农民战争的杰出领袖，著名的农民英雄，都是被内部的阶级敌人杀害的。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特别是以张耳、陈余为首的奴隶主残余势力的复辟路线，始终同农民革命路线相对立。陈胜虽然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同这一复辟路线进行过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骄傲思想的滋长和缺乏斗争经验，没有看透这股反动的复辟势力对革命的严重威胁。相反，在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刻，陈胜被陈余的所谓扩大革命力量的花言巧语所欺骗，允许他们“北略赵地”，进行独立活动。虽然陈胜派自己部下武臣为主帅，但武臣很快的被他们所腐蚀，成为反革命复辟的工具。这一股反革命复辟势力，最后成为农民革命的严重危害，使革命势力处于孤立无援地位，而被各个击破。这一重要的历史教训，说明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它启示我们，在进行革命斗争中，要注意清除内部敌人，彻底打击复辟势力，坚持两条路线的斗争。

绿林赤眉大起义

在西汉(公元前二〇六年——公元二四年)末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农民大起义——绿林赤眉大起义。

一

西汉中叶以后，地主阶级穷凶极恶地兼并土地，强夺民田，掠夺农奴，霸占山林川泽，残酷地榨取农民的血汗。皇帝不但是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总代表，也是全国最大的地主。他们每年榨取的山泽、园池之税，就达到十三万万钱，约占全国赋敛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以上。皇帝下面，是享有特权的各级贵族，他们在分封区内，设置官署，征收赋税，大量掠夺土地，过着“租食税衣”的寄生生活。一般豪强地主，也无不是“乘富贵之资力”，“广其田宅，博其产业”，向人民进行疯狂的土地掠夺。汉平帝统治时期，当过侍御使的戴遵（字子高），仅家中的食客就有三、四百人，因而有“关中大豪戴子高”的谚语。官僚地主还同富商大贾、高利贷者，狼狈为奸，对劳动人民进行重利盘剥。西汉后期，赵王彭祖派人作买卖，其收

入竟“多于国租税”，成都大商人罗裒，在长安、巴蜀之间作买卖，集资千余万，赚到成倍的利息，他们的“奴婢以千、万数”，土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

同时，封建国家强加在劳动人民身上的赋税和徭役，也非常沉重。当时农民要向国家承担：“田赋”（缴纳谷物等）、“口赋”（自三岁至十四岁缴纳口钱，十五至五十六岁纳算赋）、徭役（自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的男丁，每年服无偿劳役一个月）、兵役（自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的男丁，要服兵役二年）等等。

西汉地主贵族，把广大劳动人民用血汗创造的物质财富，完全掠为己有，过着骄奢淫逸挥霍无度的寄生生活，甚至他们所喂养的马，因为吃粮食太多，“苦其太肥”，都要“日步作之”（天天牵出蹀躞）。他们活着时纵情享乐，死后还要厚葬。

一九六八年，在河北满城县发掘的两座汉墓，是中山靖王刘胜和他老婆窦绾的坟墓。建筑在陵山的山崖之间，简直是两座地下宫殿，据估计用现代施工方法，需要成百人花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建成。在两千年前的古代，使用铁锤和铁钎等工具进行开凿建造，很难估计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和时间。不知有多少劳动人民筋断肤裂含恨死于陵山之下，多少人家因此

家破人亡。墓中的随葬品，竟达二千八百多件。两套“金缕玉衣”的葬服，是分别用二千六百九十片和二千一百五十六片长方形的小玉片，四角穿孔，以细黄金丝缀合而成。这两套“金缕玉衣”，就是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人民的铁证。墓中的随葬品中仅一个铜甗(水盆)上记载的价格(是八百四十钱)就等于劳动人民四口之家三年所缴纳的全部人头税。在当时人民缴不起人头税(三岁至十四岁，每年缴口赋二十三钱，十五至五十六岁，每年缴算赋一百二十钱)，处于“生子辄杀”的悲惨境地。

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广大农民纷纷破产，被迫租种地主的土地为生，地租额，竟达到收获物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贫苦的农民一年到头，用自己的血汗换来的生产物，是“已奉租谷，又出豪税”，甚至“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有的不得不为地主“佣耕”(雇农)过活。不少破产农民，无家可归。有的甚至把自己的妻儿或自身典卖为奴隶，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有时，甚至连这种生活也难维持，有的“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有的“以大饥死，而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甚至达到“人相食食”的程度。广大农民被逼得实在不能生活下去了。

另外，从西汉中后期开始，整个地主阶级已逐步转向保守和反动。为了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它们把代

表奴隶主阶级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加以修修补补，使其成为地主阶级的统治工具。董仲舒就是复活儒家思想的罪魁祸首。他极力宣扬“天人感应”，“王权神授”的邪说，主张“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仁、义、礼、智、信”等三纲五常的反动谬论，把这些维护封建统治的教条，都说成是天安排的，是永恒不变的，即“天不变，道亦不变”。毛主席指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这种思想，是地主阶级维护剥削和压迫的精神武器，是毒害人民的鸦片烟。革命的人民，为了改变自己的贫困地位，必然要同这种反动思想进行坚决斗争。

从西汉中期开始社会阶级矛盾，已日益尖锐，广大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正在酝酿之中。

二

毛主席指出：“哪里有剥削，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斗争。”由于阶级矛盾日益激化，自汉代中期开始，全国各地就不断地有农民起来反抗封建统治。地主阶级虽然想尽各种办法进行镇压，可是起义的人数和次数越来越多，使统治者感到日夜不安。公元前五

年(建平二年)，汉哀帝悲鸣：造反的人到处都是，而内心感到万分恐惧。遂改元，自称“刘太平皇帝”，企图以此来缓和矛盾。同统治阶级的愿望相反，农民起义仍然连续不断，天下并不太平，阶级斗争的现实，有力地讽刺和鞭笞了“刘太平”的愚蠢和幻想。

在阶级斗争不断激化的情况下，地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激烈的矛盾。西汉末年，出身贵族“被服如儒生”的王莽，握有雄厚的政治和经济实力。王氏一族，是当时最凶恶的土地兼并者和大土地所有者，他们占有大片的封土，食几千到几万户的租税，是一个掌握大权的地主集团。公元九年，王莽废掉了刘姓皇帝，自己登上皇帝宝座，改国号为“新”。王莽粉墨登场后，大耍两面派手法，妄图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这个咒骂秦始皇，尊儒反法的复辟狂，竟把《周礼》中记载的奴隶社会的典章制度，强力推行于封建社会。他一方面，到处“聘求名儒”，大喊大叫要对人民施以“仁政”；另一方面，却“阴险擅权，淫刑以逞”，并大肆兼并土地，掠夺奴婢，肆意欺压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王莽为了镇压他们的反抗，不断地向人民征兵征粮，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因此，农民起义的地区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汇成了几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在南方的有绿林军、平林兵；在东方的有赤眉军；在北方的有铜马等起义军。严重地威胁着王莽的封建政权。

三

公元十七年(天凤四年)，长江中游的荆州地区，灾荒严重，民不聊生。成千上万的饥民只能到荒野泽地里挖野菜充饥。当时新市(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在饥民们的拥护下率众起义，接着又有马武、王常、成丹等率领许多群众前来参加。他们首先向附近的地主富豪展开攻势，夺取粮食、财物。仅在几个月的时间内，队伍就发展到七、八千人。他们开始以绿林山(湖北当阳县东北)为活动据点，因此，这支起义军被称为“绿林军”。后来，劳动人民把那些揭山林永泽之险，奋起反抗封建统治的英雄们，称之为“绿林好汉”。

公元二二年(地皇三年)，起义军离开绿林山，分两路向地主阶级进攻：一路由王常、成丹、张印等率领攻入南郡(湖北江陵)，号称“下江兵”；另一路由王匡、王凤等率领北向南阳(河南南阳市)，号称“新市兵”。不久，新市兵进军到随县(湖北随县)，平林(湖北随县东北)人陈牧等，率领数千人起义响应，号称“平林兵”。

绿林军掀起的革命风暴越来越大，各地农民纷纷参加起义。起义军所到之处，封建统治阶级的秩序全被打乱，地主阶级内部分崩离析。大部分地主富豪为

了保护自己的财富和地位，纷纷自作打算。有的组织武装结寨自保，有的打着反莽旗号钻到起义军中，企图篡夺起义军的领导权。因犯法而逃匿的破落贵族，汉朝的宗室刘玄，就混入了平林兵的队伍中。不久，刘玄的同族兄弟南阳大地主兼商人刘縯、刘秀弟兄，率领“宾客”七、八千人，乘机在舂陵（湖北枣阳县东）起事，号称“舂陵兵”。他们同新市、平林的队伍联合起来，表面上是和起义军共同作战去推翻王莽政权，骨子里却想利用农民起义军的力量，作为他们夺取政权的工具。

这时，王莽的军队，仍拥有较大的力量，他妄图一举扑灭起义军，在南阳作了重要的军事部署，派甄阜、梁丘赐率兵驻守南阳，调严尤、陈茂的军队，攻打起义军，又派王寻率十万军队屯驻洛阳，作为各地的支援部队。农民军没有被这个貌似强大的纸老虎所吓倒，为了迎接敌人的挑战，新市、平林、下江等几路义军会合在一起，经过多次的战斗，绿林军在淝水（河南泌阳县境），将甄、梁所部十多万莽军全部击溃，两个莽军头子也被击毙。为了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夺取战略要地宛城（河南南阳），他们迅速北进，截击严尤、陈茂部于清阳（河南南阳市南），并斩杀莽军三千多人，严尤、陈茂部狼狈逃窜，起义军便将宛城团团围住，王莽的战略部署，全部被粉碎。绿林军取

得了重大的胜利，这时已发展成为十多万人的强大队伍。

随着起义军的大联合，起义力量不断增大，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机构，来领导反莽斗争。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新市、平林等义军首领同春陵兵头目产生了根本的分歧。满怀着“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的地主阶级代表刘縯，一心想把领导权抓在自己的手里，并得到所谓“南阳豪杰”的一批地主分子的支持。而新市、平林等义军首领们却欲立刘玄作首领。他们认为刘玄和刘縯虽然是同族兄弟，但刘玄参加平林兵较早，特别是刘玄没有武装力量，势力比较孤单。因此支持刘玄，实际上领导权仍然掌握在农民军将领手中。双方斗争很激烈，在开会前，新市、平林的将领们“先共定策”（事先共同作了决定）立刘玄，然后“召縯示其议”（把决定告诉刘縯），刘縯见自己不能当权，又花言巧语的提出暂时不推举首领的意见，企图用欺骗手段拖延下去，准备将来伺机夺权。刘縯的主张虽得到一部分人的呼应，却遭到义军将领们的坚决反对。义军将领张卬听了刘縯的意见之后，气愤地“拔剑击地”力持原议，结果，取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粉碎了刘縯的阴谋。这样，刘玄在义军将领们的支持下，于公元二十三年称帝，改元“更始”。

此后，起义军一方面继续进攻宛城，并切断宛城

与洛阳的通道；另一方面又派王凤、王常等北上攻占昆阳(河南叶县境)、定陵(河南午阳)、郾(河南郾城)等城镇，革命形势越来越好。

四

绿林军起义的第二年(公元十八年)，山东琅邪(山东临沂)人，雇农出身的樊崇，在莒县(山东莒县)领导一百多名农民起义，仅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形成了一支一万多人的队伍。他们以泰山、沂蒙山区为据点开展革命斗争。

樊崇这支起义队伍，是由贫苦农民组成的。他们到处打击地主，没收地主的钱粮和财物，帮助贫苦的农民，始终保持着纯朴作风和严格的纪律。他们为了区别于王莽的反动军队和便于对敌斗争，把眉毛涂成红色，作为标志，因此被称为“赤眉军”。他们与绿林军相呼应，痛击王莽在山东的统治。

约在公元十九年(天凤六年)，赤眉军击败驻守山东的莽军，歼敌一万多人，取得了第一次大胜利。这时候，赤眉军已成为拥有几万大军的强大队伍。

公元二一年(地皇二年)，王莽派太师羲仲景尚和更始将军王党率兵前往镇压，经过激战之后，莽军遭到重创，羲仲景尚也被击毙，起义军又取得第二次大胜利。王莽集团为了挽回败局，在公元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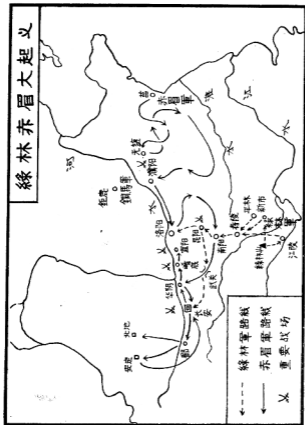
年（地皇三年），再派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率领十几万官军前往镇压。这支反动军队，到处进行抢掠烧杀，给人民带来了无数灾难。当时民间流传一首歌谣说：“宁逢赤眉，勿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这充分的反映出，广大人民对反动武装的残暴掠夺所激起的极大愤怒。公元二三年（地皇四年）冬，赤眉军同王莽军在成昌（山东东平县西）一带会战。赤眉军首先击败了莽军王匡部，歼敌一万多人，王匡狼狈逃窜，义军乘胜追击到无盐（山东省东平县东），又同廉丹所部遭遇，在激烈的战斗中，将反动头子廉丹打死，莽军大溃，起义军取得了第三次大胜利，这就基本上结束了王莽集团在东方的统治。

此后，赤眉军活动的地区不断扩大，东至营城，南达汝南（河南上蔡西），西到颍川（河南汝县），北至濮阳（河南濮阳南），包括了经济发达、地位重要的今山东、江苏、安徽、河南诸省交界的广大地区。在这些地区内，义军摧毁了豪强地主的营堡，镇压了许许多多的地主官吏，赤眉军已形成拥有数十万人的强大队伍。赤眉军点起的革命烈火，已燃遍了中国的半壁河山，由于赤眉军不断地牵制、打击王莽的军队，这就更便利了兄弟部队——绿林军攻入长安，最后推翻王莽政权。



綠林軍大敗王莽反動軍隊

綠林赤眉大起义



- - - 綠林軍路綫
 ——— 赤眉軍路綫
 X 重要战场

五

斯大林曾经指出：“丰富的历史经验教导我们：直到现在没有一个阶级自愿让路给另一个阶级，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这种先例的。”“绿林”、“赤眉”两支起义军，在东南两个战场取得了重大胜利，直逼王莽的统治中心——长安。王莽象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押上了全部资本，孤注一掷，企图集中全力对付绿林军。公元二三年五月，王莽派王寻、王邑征集各地官兵四十二万，号称百万官军，倾巢而出，南向颍川，准备去解宛城之围，中途包围了昆阳（河南叶县）。当时王莽的军队，“鉦鼓之声，闻数百里”，满山遍野都是王莽的军旗。这时，守昆阳的起义军，只有八、九千人，在数十倍敌兵重重围困的面前，仍然坚持顽强的战斗；同时派出一支由十三个人组成的轻骑队，夜间从昆阳突围，去调发郾和定陵等地起义军，前来参加昆阳战斗。莽军用楼车和挖地道等战术，猛攻昆阳城。乱箭象雨点一样，射向城内，甚至军民到井边汲水，都要背一块门板，以防箭伤。莽军头目王邑得意洋洋地叫嚣：“先屠此城，喋血前进，前歌后舞，顾不快耶！”满以为昆阳城指日可下。以王凤、王常为首的城内起义军，收缩阵地，集中兵力御敌，以坚韧不拔的斗志，组成了铜墙铁壁，击退了莽军的多次进攻，昆阳城屹

立不动，表现出革命人民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不久，各地来的义军援军，约一万多人进入昆阳阵地，起义军选出三千人的突击队，直冲王邑的中坚大营，杀得敌人仰马翻。王寻也被义军砍死。与此同时，城内义军乘胜出击，内外夹攻，呼声震天动地，当时又值风雷大作，“屋瓦皆飞，雨下如注”，河水猛涨，莽军大乱，溃不成军，自相践踏和淹死的以万数，王邑等残兵败将踏着莽军死尸渡河，逃命而去。不久前宛城也被起义军攻下。

昆阳大战，是起义军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消灭了王莽的全部主力。在这次战斗中，农民军打败了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战之一，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之一。

列宁指出：“在任何深刻的革命中，多年内对被剥削者还保持着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的剥削者，照例要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反抗。剥削者没有在这样的、拼命的战斗中，在多次的战斗中，试验自己的优势以前，决不会……服从被剥削者多数的决定。”地主阶级分子刘歆对过去篡权失败，始终是不甘心的，总是蠢蠢欲动，伺机篡权，他眼看着王莽即将垮台，认为时机已到。他的亲信刘稭，甚至不接受刘玄的命令妄图篡权。由于刘歆等人的阴谋诡计，已被起义军首领们察觉，刘玄在农民军将领的坚决主张下，处决

了刘斌和刘稷。地主阶级的复辟活动再一次遭到沉重打击。阴险的刘秀，见哥哥被镇压，怕牵连自己，耍着两面派手法，假惺惺地向刘玄请罪悔过，白天谈笑自如，若无其事，晚上却泪流满枕，妄图变天复仇，继续潜伏在义军内部。

昆阳大战给王莽的反动统治以致命的打击。起义军于公元二三年八月间，分兵两路，展开最后攻势。一路北上攻洛阳，一路西进取长安。西路军迅速进入关中。这个输光了本钱的赌徒王莽，恐惧万分，手足无措，就率领群臣到南郊去告天求救。妄图用“天命”来拢络死党，维持其反动政权。他带头跪在地上，仰天嚎哭。然后，又不断地叩头。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也跟着嚎哭。王莽还规定谁哭的最响，就给谁升官，结果够标准的竟有五千多人。这些丑类死到临头，还不忘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就在地主阶级哀鸣末日来临之际，起义军逼近了长安。这时，王莽又把一些囚徒聚集起来，妄图作最后的挣扎。但是，囚徒们对王莽政权素有强烈的仇恨，当他们被赶过渭桥之后，便造起反来，立即掘毁了王莽的祖坟，烧毁了“九庙”。十月，起义军攻入长安城，城里人民群起响应，攻入未央宫，火烧宫门，群众大声疾呼：“反虏王莽，何不出降”！到这时，这个死有余辜的王莽，仍然不愿退出历史舞台，守着他的六十万斤黄金和珍宝，嘴里

还唧噥着孔老二的反动说教：“天生德于予，汉兵（指起义军）其如予何。”义军攻上皇宫里四面环水的“渐台”，杀死了王莽。后来将王莽首级传到洛阳，悬挂在市街上示众，“百姓共提击之”。有人还特地把他的舌头割下来。这对作恶多端而又一向使用仁义道德等花言巧语欺骗人民的王莽来说，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的。

经过六年的血战，农民起义军终于推翻了地主阶级的全国统治政权，赢得了巨大的胜利。

王莽政权被推翻后，隐藏在更始政权内部的刘秀，乘机跑到河北，打着起义军的旗号，组织起地主武装。他利用镇压和欺骗的反革命两手，瓦解了当地以铜马等为首的各部起义军。并于公元二五年六月于鄗（河北柏乡县北），建立了封建地主政权——东汉。这时候，以樊崇为首的赤眉军代表，亲自到洛阳，表示愿同更始政权合作，但以刘玄为中心的地主集团，对他们进行歧视和排斥，引起赤眉军的不满，使他们由相互配合走向分裂，最后造成互相残杀的局面。尤其是钻进绿林军内部的刘玄，进长安后，不断培植地主势力，生活腐化。引起起义军的强烈不满，他们曾发出“成败未可知”竟“放纵若此”的呼声。当赤眉军迅速向长安进兵时，刘秀也派兵西向，准备“乘更始赤眉之乱”，夺取农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当时长安局势非

常不稳，绿林军的将领们，主张撤离长安，“复入湖池中”坚持斗争，表现出起义英雄们造反到底的革命精神。但刘玄留恋宫廷的生活，不但坚决反对撤离长安，而且乘机向起义军首领大下毒手，杀害了申屠建、陈牧、成丹等起义军重要将领。刘玄的血腥屠杀，使革命势力遭到重大摧残。

这时，张卬和王匡等率起义军进行反击，并同赤眉军联合打入长安，将刘玄绞死。这个妄图利用农民战争，来建立封建王朝的地主阶级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赤眉军在公元二七年，被刘秀地主武装击败。后来刘秀集团又经过十几年，将各地割据武装次第消灭，从而取得了全国的统治权。

六

以“绿林”、“赤眉”为首的农民起义，从开始时的“星星之火”很快成为燎原之势，历经十年，横扫全国，使封建统治阶级的武装一批又一批地被消灭，反革命阴谋一次又一次地被粉碎以至最后摧毁了王莽的封建统治政权，这是这次农民革命的巨大历史功绩。它从政治上、经济上严重地削弱了封建地主豪强势力，给封建统治以有力的改造，打乱了土地高度集中的现象，扼止了土地兼并的继续发展。同时还进一步打击了

罪恶的奴隶制残余，并摧毁了王莽的反动民族政策，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这一切对东汉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混进农民起义军中的以刘氏贵族为首的地主集团，同王莽政权的矛盾，“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它们都是反对农民革命，维护封建统治的地主阶级反动势力。以刘氏贵族为首的地主集团，在起义军内部，多次掀起复辟封建政权的恶浪，企图利用农民革命力量，作为它们改朝换代的工具。绿林军进长安后，地主分子李淑，向刘玄建议：“陛下定业，虽因下江、平林之势，斯盖临时济用”，“宜厘改制度，更延英俊，以匡王国。”他露骨的提出，在革命中为取得封建皇帝宝座，不得不暂时利用农民革命的威力，现在应当用封建制度代替革命制度，要重用地主阶级分子，把农民起义军一脚踢开，以复辟封建政权。这篇反革命复辟的宣言，充分的暴露了混进农民军内部的地主阶级的反革命面目。

在绿林起义军内部，曾展开了尖锐、复杂的两条路线斗争。

在农民起义军建政初期，革命势力曾击败了刘歆篡夺领导权的阴谋，使革命势力得到发展，因而取得决定性的昆阳大战的胜利。接着又镇压了刘歆和刘稷的反革命活动，进一步推进了大好的革命形势，最后，

推翻了王莽政权。这是西汉末年农民革命的巨大胜利，也是起义军内部革命路线击败封建复辟路线的巨大胜利。

农民起义军中的革命力量，虽然击败了刘缤等复辟阴谋，但没有铲除埋藏更深的刘秀。最后使他从革命内部分离出去，打着农民革命的旗号，重建地主阶级武装，终于成为农民革命的大敌。同时，更没有注意防止刘玄势力的发展，进长安后，不得不同刘玄集团展开激烈地两条路线斗争。当赤眉军和绿林起义军中的革命势力合力击败刘玄集团后，又被刘秀集团抄了后路。最后，被刘秀集团夺取了农民革命的胜利果实，使革命遭到失败。

从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启示人们：在革命的队伍里，要高度警惕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始终坚持革命路线，彻底打击复辟路线，这是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黄巾大起义

东汉王朝(公元二十五年到二二〇年)的统治是西汉王朝统治的继续。公元一八四年,爆发了席卷全国的黄巾大起义。

东汉时期,民间流传着一句童谣:“太狱如市,人死如林”。这句童谣,正是东汉反动统治阶级,残酷压迫人民的真实写照。

东汉王朝的统治阶级利用政治特权,拼命兼并土地,抢夺奴婢,残酷剥削农民,过着“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即被大地主掠为己有,直接役使的破产农民)万计”的荒淫无耻生活,他们一方面把公地、荒地、森林、川泽、牧场等窃为“国”有,另一方面又掠夺民间土地,无孔不入的榨取农民血汗。如汉灵帝,他在河间(河北河间)“购置”了大量土地并起造房屋,做为灵帝母子的“私产”。刘秀的外祖母家姓樊,既是个大恶霸,又是个商人、高利贷者,有地三百多顷,资产至“巨万”。他的一个岳父姓阴,有田七百多顷,而车马奴隶之多比得上一个小邦国。

再如大官僚马防，不仅兼併了洛阳附近许多肥田好地，拥有上千名奴婢，甚至连少数民族也受到他的搜括。有些豪强地主虽无官职也称霸一方。

农民和奴隶，在残酷地压榨下，受着非人的待遇。农民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产品被豪强地主榨取去了。依附农民在庄园里除农业劳动外，还负担砌院墙、筑围子、挖掘水渠、修盖房舍等各种杂役。甚至被强制编成武装，叫做“部曲”、“家兵”，替豪强地主看家护院，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依附农民在残酷地压榨下，确是“瓮中无斗米储”，过着“苦饥寒”的悲惨生活。一遇荒年，就卖妻卖女，家破人亡。奴婢处在最低下的地位，他们被地主当作物品可以转让与买卖，受到种种蹂躏。至于自耕农，则是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的对象。如外戚梁冀曾掠夺几千个自耕农变成自己的奴婢，还无耻地把他们叫做“自卖人”，他们仅有的一点点土地，也被侵吞去了。在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到处都出现“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的萧条景象。

东汉王朝统治后期，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也愈来愈激烈。由于东汉王朝的皇帝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大多短命，从章帝以后，皇帝的寿命没有超过四十岁的，往往由皇太后抱着小皇帝临朝执政，大权旁落外戚手中。小皇帝长大后又勾结太监向外戚夺权，出现宦官

执政。官僚们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无不贪赃枉法，贿赂公行，这就更加重了人民的痛苦。尤其严重的是，东汉统治阶级竟以公开拍卖官爵的手段大肆搜括民脂民膏。如汉灵帝当权时竟在京城鸿都门贴出了明榜，标明从三公到卫士等各级官爵的价格。定价之外，还有折扣价目，额外价目，临时价目；拿不出现钱的，还可以赊欠。皇帝甚至给狗戴上“进贤冠”，成了享有盛名的官吏。当时就有这样民谣：“公卿牧守，都是戴帽狗”。一针见血的揭露了统治集团的反动本性。东汉统治阶级对农民实行敲骨吸髓的压榨，使广大农民身受重租、苛税、灾荒、疫病的重重袭击。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广大农民忍无可忍，纷纷奋起反抗。

二

“发如韭，剪复生；
头如鸡，割复鸣。

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

这是东汉末年民间流传的一首歌谣。这首歌谣充分反映了被压迫农民不畏强暴前仆后继的革命造反精神。

在整个东汉王朝反动统治时期，各地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仅在公元一〇七年到一八四年期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与武装暴动就有六七十次之

多。公元一〇七年游牧在青海、四川、新疆一带的羌族起义就是其中的一例。公元一〇七年因强制征调羌人随征西域，激起羌人进行武装暴动，由于得到备受摧残的汉族人民的支持，这次暴动直到一二六年才被镇压下去。公元一四〇年羌族人民又掀起第二次反抗高潮，斗争坚持了十年之久。公元一五九年羌人又掀起第三次反抗高潮，直到一六九年才最后被镇压下去。农民起义虽然一次一次的失败了，但却一层一层的加深了东汉统治的危机。长期的战争，使东汉王朝军费消耗高达四百多万，士兵因受到虐待而死的竟“白骨相望于野”。新的苦难就更加激发了灾难深重的各族人民的顽强斗志。

各族人民波浪起伏的反抗斗争，必然汇合成革命的巨流。一场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黄巾军大起义终于爆发了。黄巾军大起义的领袖张角，他是河北钜鹿人。在宗教迷信极为盛行的东汉，张角利用“太平道”这一组织，作为组织和发动群众的工具。

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提出了“人人无贵贱，皆天之所生”，“人各食其力”，“令人不穷”的平等观念和实现财产公有的太平世界的口号，受到被压迫人民的拥护。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太平道传遍了青（山东东部）、徐（江苏北部）、幽（河北东部）、冀（河北中部）、荆（湖北湖南）、扬（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兖（山

东西部)、豫(河南)等八州,有教徒几十万人。张角把组织起来的农民划为三十六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一个首领,叫“渠帅”,统一在张角的领导下。

三

张角在起义前,在思想与军事上做了许多准备。他首先借治病与传教,秘密传播反抗地主阶级统治的思想,广泛宣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革命口号。明确地提出要用农民的“黄天”,取代地主阶级的“苍天”,这对儒家提出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谬论,给予了有力的批判。张角又以“天公”将军的名义号召农民于一八四(甲子)年举行起义,推翻东汉政权。并派人在东汉京城洛阳及各地方的官府的墙壁上,用白土大写“甲子”二字,标志出起义攻打的目标。在军事上,张角派一个“大方”首领马元义部署荆、扬地区的道徒几万人到邺(河南安阳)集中,与冀州道徒会合待命;并让他亲自到洛阳活动,准备里应外合,约定在甲子年(公元一八四年)的三月五日,在京城和全国各地同时举行起义。但是,就在起义的前一个月,革命内部出现了叛徒,张角弟子唐周向东汉王朝告密,革命计划全部泄露。马元义被捕牺牲,在洛阳的一千多名道徒也横遭杀害。东汉王朝还

下令通缉张角等人，妄图扑灭刚刚燃起的革命火焰。

张角闻讯之后，派人连夜飞告各“方”，果断决定提前起义。这一年的二月，三十六方在一天之内全部起义。因为起义的人头上包着黄巾为标记，号称“黄巾军。”他们来势迅猛锐不可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席卷了长江以北直至河北的广大地区。黄巾军所到之处焚烧官府，捕杀官吏，攻打地主庄园，猛烈地冲击着封建势力。

黄巾军的主力，分布在河北、河南广大地区。形成三支骨干力量，一齐把进攻矛头指向洛阳。由张角兄弟领导的黄巾军，在冀州广宗(河北广宗)一开始就活捉了东汉王朝的安平王刘续，甘陵王刘忠。由波才、彭脱领导的黄巾军，在颍川(河南禹县)打败了太守赵谦。由张曼成领导的黄巾军，攻下南阳(河南南阳)杀了太守褚贡。这三支强大的黄巾军布阵在洛阳周围，使洛阳危在旦夕。此外，分散在各地的义军，多的二、三万，少的几千人，到处打击封建统治。在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也起义响应。如北宫伯玉领导的羌族人民在甘肃北地起义，在南方的有“武陵蛮”与“板楯蛮”也举起义旗。全国各地到处燃起了农民革命斗争的熊熊烈火。

这时东汉王朝惊恐万状，赶忙调兵遣将，加强洛阳的防御力量。一方面派皇甫嵩、卢植、朱儁和董卓

等刽子手率领反动军队，向河北、河南的黄巾军反扑过来。另一方面拼凑地主武装，配合王朝军队围攻黄巾军。这年四月间在大河南北展开一场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生死大搏斗。

颍川一带的黄巾军，在波才领导下，首先逼近洛阳，在围攻洛阳的战斗中英勇善战，不畏强敌，打败了来犯的朱儁部队，并在长社(河南长葛)包围了皇甫嵩的部队。后来由于失去警惕，又缺乏足够的军事经验，为了长久的围困敌军，“结草为营”，疏于戒备，被敌人钻了空子。皇甫嵩在夜间从城里秘密派出偷袭部队，乘风放火，黄巾军的营盘全被烧毁。皇甫嵩与朱儁合军进犯，曹操又率领敌援军赶到，义军腹背受敌，几万人遭到屠杀。接着波才败于阳翟(河南禹县)，彭脱败于西华(河南西华)，八月间在陈国(河南淮阳)的黄巾军又遭到失败，首领卜己被俘牺牲，在颍川的黄巾军被迫转入更为艰苦的地下斗争。

由张曼成领导的南阳黄巾军几万人围攻宛城(河南南阳)，战斗了一百多天，使敌人遭到很大伤亡。东汉王朝又派秦颀作南阳太守，并增兵顽抗。不幸张曼成作战牺牲，黄巾军又推赵弘为领导，士气更加旺盛，队伍扩大到十几万人，终于拿下宛城，赶走了秦颀。东汉王朝急忙把朱儁军队调来，和秦颀合军反扑。从六月到八月，黄巾军多次粉碎敌军的围攻。赵弘英勇



黄巾军严惩东汉贵族、官僚和地主

黄巾大起义形势图



牺牲，黄巾军又推赵忠为帅，赵忠阵亡，再推孙夏为帅，打得东汉王朝惊惶不安，几乎撤掉朱儁的职务，充分表现了革命农民前仆后继的革命斗争精神。但由于黄巾军在长期战斗中兵力消耗太大，困守孤城没有外援，又失去一些主动进攻敌人的战机，不得不在十一月间放弃宛城，转移到西鄂精山(河南邓县西)，最后被朱儁部队击败。

由张角亲自领导的黄巾军攻占广宗(河北威县东)、下曲阳(河北晋县西)，先后打败了卢植和董卓的军队，迫使敌人龟缩洛阳，队伍扩大到数十万人。不幸，在八月间张角病死。他的弟弟张梁和张宝领导黄巾军继续战斗。十月，皇甫嵩部队包围了广宗，黄巾军在张梁领导下骁勇善战，抗击敌军，打得围困广宗的敌军不敢出战。这时黄巾军又因多次胜利失去警惕，被皇甫嵩的军队夜袭了军营，黄巾军仓促应战，张梁等八万多人壮烈阵亡。十一月，皇甫嵩部队进犯下曲阳，张宝和全军十一万人经过激烈战斗，在敌军围攻中壮烈牺牲，至此冀州的黄巾军也宣告失败。

经过九个月的战斗，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黄巾军的主力虽然失败了，可是农民的武装斗争并没有从此停息。从公元一八五年到二〇五年的二十年间，革命洪流仍然滚滚向前，分散在各地的农民起义军遍及山东、河北、河南、陕西、山西、

湖南、湖北、四川、江苏和甘肃等省。其中活跃在黄河以北的黑山军(河北浚县西北)，在黄巾军的主力失败以后，战斗于中山(北京)、常县(河北真定)、赵郡(河北邯郸)、上党(山西长子)、河内(河南沁阳)五郡的地方，队伍发展到百万以上，成为一支强大的革命队伍，曾多次抗击了军阀袁绍的围剿。一九三年克邺城，俘虏了袁绍的家属。直到二〇五年才被曹操战败。

一八八年冬天，青、徐二州黄巾军又重新起义。徐州黄巾军曾攻破北海(山东益都东)，包围了北海相孔融在都昌(山东临朐)的部队，直到刘备的援兵赶到才解围。青州黄巾军在一九二年攻击兖州，杀任城相郑遂和兖州刺史刘岱，两处黄巾军也曾发展到百万人以上。终因孤军奋战，陆续被镇压。尽管这些起义失败了，但是以黄巾为旗帜的农民大起义，却给东汉王朝以强烈的震动，并加速了它的灭亡。

四

毛主席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黄巾大起义也证明了这个伟大的真理。

黄巾大起义严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使东汉王朝土崩瓦解，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这次农民大起义是经过十几年的长期准备，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进行的。起义军的成份比较单纯，除少数知识分子参加外，大多数都是贫苦农民，在两个阶级的决战中起了极大的作用，狠狠打击了封建势力。那些有成群奴婢、上万个依附农民的豪强地主，在黄巾军的打击下，有的被杀死，有的被俘虏，有的被赶跑，出现了“没有主人的土地”和“土地没有常主”的现象，这就中断了东汉时期日益激烈的土地兼并，使豪强地主的庄园受到很大的破坏。黄巾军到处焚烧官府，捕杀官吏，攻打聚邑，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势力。

黄巾大起义留下的优良革命传统，给以后的农民革命战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树立了典范，成为鼓舞农民起来造反的巨大精神力量。如东汉以后，革命火种仍然没有熄灭，直到南宋时期的方腊起义，还是尊崇张角为起义军的祖先，义军宁可被反动统治者杀死，也不说“角”字。可见，黄巾大起义的威力不断地鼓舞人民的革命斗志，激发着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光荣的革命传统一代一代继承下来。

黄巾大起义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进一步交往，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巩固与发展。当黄巾起义爆发时，西

北的羌族，巴蜀、汉中一带的巴、氏人，以及在湖南的“武陵蛮”与“板楯蛮”等，都纷纷起来响应，和中原人民一起，同呼吸，共患难，开展了反封建的斗争。这就打破了地主阶级所造成的民族隔阂和民族界限，促进了各族人民的友好往来。同时农民革命战争也打破了东汉王朝束缚各族发展的锁链，促进各族人民的内迁，与中原地区人民杂居，共同创造物质财富，从而使中华民族得到巩固与发展。

隋末农民大起义

隋王朝（公元五八一年到六一八年）末年，爆发了全国规模的隋末农民大起义。

当时，地主阶级里面有世族地主、官僚地主、一般地主与僧侣地主等区别。隋王朝极力扶植世族地主，提高他们的身份、地位和待遇，使之“庶享荣位”以压迫人民。官僚地主是有权有势的当朝权贵，既可以凭借政治势力欺压百姓，又能通过封建王朝的赏赐掠夺大量土地与财富。一般地主大多是没有政治身份的中小地主，却受到隋王朝的重视，采用开科取士的办法，拢络他们的头面人物，以巩固封建统治。寺院是封建统治者利用佛教来麻醉人民的工具，其中的僧官就是地主，他们凭借寺院财产，勾结官府，广占土地，大放高利贷，盘剥僧俗群众。

这时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农民，则有均田户、自耕农、隐户、荫户、浮客与佃客等区别。均田户是指隋王朝把荒地与“公地”拨给农民，强制农民耕种的农户。他们在名义上可得“百亩”，实际上连廿亩也得不

到，但必须缴纳沉重的赋税。自耕农是指那些有少量土地，暂时能够自给自足的农民，但和均田户一样，受着官府的欺凌与压榨，随时都会陷入破产和死亡的痛苦深渊。隐户与荫户、浮客是指那些在沉重的赋税压迫下，逃亡他乡，为地主耕种土地的农户。佃客是农村中的贫苦农民。这些劳动者每年大半收入都被地主所夺去，还受到官府“赋重役勤”的欺凌，痛苦更加不堪言状。

此外还有部曲和奴婢，是可以赏赐、买卖与转让的劳动者，毫无人身自由。

在政治上，农民还受到残酷的统治，动辄触犯“法纪”，稍有违抗，不是杀头，就是坐牢。隋文帝就曾颁布过这样的法令：“有偷盗一钱以上的判死刑，三人共盗一瓜的处死”。

杨坚的次子杨广在公元六〇四年，乘杨坚卧病的时机，派党羽入宫将其父杀死，“血贱御屏”，发动政变，取得帝位。他就是历史上极其荒淫残暴的隋炀帝。他一上台，就把苛重的徭役与兵役统统加在农民身上。他常常兴师动众，大兴土木，建洛阳、筑西苑、开运河、修长城、缮治离宫、伐木造船，大的工程常年役使一、二百万人，较小的也要征发一、二十万人。修建洛阳所用的木料，要到江南各州去采集，一棵大木料要用两千人搬运，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往返运

送的民夫，千里不绝。同时还征调人民进行远征。男丁不够用，就逼迫妇女做各种苦役。隋炀帝经常四出巡游，寻欢作乐，每次巡游都带上大批的士兵与侍从，有时多达五十余万人。公元六〇五年（大业元年）炀帝从水路由洛阳到江都（今扬州），乘坐的龙船就有二百尺长，四十五尺高，分为四层，布置得极其奢侈，其他各样船只也有几千条，加上载兵的船只，排起来足有二百里长，单是拉纤民夫就用了八万人。沿途经过的地方，五百里内的州县都要贡献珍贵的食物。为了满足隋炀帝的挥霍，很多郡县强迫农民预交几年的租调。

隋炀帝为了扩大封建王朝的领域，从公元六一二年到六一四年发动了三次侵略高丽的战争。公元六一〇年开始作战争准备，以山东的东莱（掖县）与涿郡（河北涿县）为水陆进攻的基地，下令全国各地的陆军，不分远近都到涿郡集中，又征发二百多万民夫日夜不停地运输军用物资。这样，被强制征调兵役与徭役的人数竟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在东莱造船三百只，船工在官吏的鞭打督役下，昼夜站在水中不能休息，腰部以下都泡烂生蛆，死者达十分之三四。农民为了反抗隋朝的徭役和兵役，甚至不惜伤残自己的肢体，叫作“福手福足”。可见这种徭役和兵役，加给人民的痛苦，该是多么沉重。隋王朝的暴政，迫使无数农民颠

沛流离，家破人亡，无数农村“耕稼失时，田畴多荒”，更加上灾荒连年，广大劳动者只能以树皮、树叶为食，皮叶吃光，又煮“仙土”与谷子秆充饥。隋王朝的非正义战争，使“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阶级斗争更趋于尖锐化。就在隋王朝准备发动侵略高丽战争的六一一年，革命的烽火划破了阴翳的天空，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了。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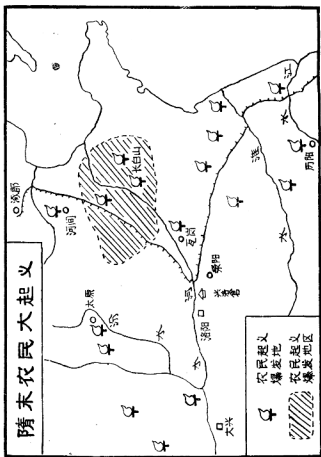
公元六一一年(大业七年)，山东邹平县人王薄率领农民在长白山(山东章邱、邹平、长山等县间，现叫白云山)，首先举起反隋大旗。王薄自称“知世郎”，表示能知天下事，料定起义必胜，隋朝必亡。又作歌谣，号召人民不要为隋朝发动的侵略战争去送死。并提出“昏君赃官杀个光”的战斗口号。起义军英勇善战，很快攻下县城，砍下县官的脑袋，挂在城门上示众，这对孔老二提倡的不许“犯上作乱”的反动说教以坚决的打击，大长了农民的志气，大灭了地主阶级的威风，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许多逃避征役的人纷纷参加了革命队伍，不久就发展到几万人，攻占了山东许多州县，揭开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接着孙安祖、窦建德等起义于高鸡泊(河北故城县西南)。高鸡泊是个大水泊，宽广数百里，芦苇丛生，

港汊交错，地势异常险要，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孙安祖原是漳南(河北故城县东北)人，家被大水淹没，妻子饿死，县官还逼他去当兵。愤激之下，杀死了县官，起义于高鸡泊，掀起反抗怒涛。窦建德出身于劳动农民家庭，为人勇敢，隋王朝征兵的时候，被派为二百人长。因他帮助孙安祖起义，全家惨遭隋官吏杀害，于是他率领二百人投奔高士达，成为高鸡泊地区起义军的首领之一。与此同时，还有翟让起义于瓦岗寨(河南滑县)，高士达起义于清河(河北清河县北)，张金称也在河曲(河北清河)聚众起义，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隋王朝从农民起义一开始，就进行了残酷的镇压，除进行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外，还下令，凡抓到起义者都要当地处决，甚至没收起义军的全家财产。隋朝统治者满以为这样就能扼杀革命，“**但是和这种反动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近于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则**”，敌人屠杀的结果反而使起义队伍越来越多，起义的范围越来越大，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从公元六一二年到六一五年，起义的队伍已经达到一百五六十支，大者十几万，小者几万人，总数在四五百万以上，遍布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阶级力量的对比正朝着有利于农民革命方面转化。



瓦岗军攻占了隋兴洛仓，把粮食分给贫苦群众



三

经过几年的奋战，起义军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它们认识到“势分力弱”的缺点，主张“合以为强”，团结起来共同对抗隋军，才能取得胜利。起义队伍由分散到集中，从军事上的劣势转为优势，到公元六一六年，形成了三支强大的起义军，革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第一支是翟让领导的瓦岗军。这支义军兴起于六一一到六一二年之间，以河南滑县的瓦岗地区为根据地，因此名叫瓦岗军。起义队伍最初大部分由善用长枪的渔民和猎户组成，作战十分勇敢。他们先攻克宋（河南商丘）、郑（河南郑州）等地，缴获了隋王朝与大商人的大批粮食与货物，解决了给养问题，联合许多支义军，扩大了革命力量。公元六一六年十月，隋炀帝命令北方最凶恶的敌人，河南道招捕大使张须陀从洛阳疾趋荥阳，妄图一举扑灭这支起义军。瓦岗军却利用张须陀骄傲轻敌的弱点，在荥阳大海寺北面的树林子里埋下了伏兵，诱敌深入，将张须陀引到这里，展开了大会战，敌人的两万精兵大部分被消灭，大刽子手张须陀为伏兵所杀，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从此瓦岗军声势大震，逼得敌人退守虎牢关（河南巩县东）。

公元六一七年二月，翟让亲率七千瓦岗军，绕道阳城（河南登封东南），越过方山，从罗口用奇袭之计，攻占了洛阳附近的全国最大的粮仓——兴洛仓，把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出现了“老弱赧负，道路不绝”的情景，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进一步削弱了隋王朝的统治势力，壮大了革命力量。隋王朝气急败坏地派遣虎贲将刘仁恭统帅三万五千人东攻兴洛仓，瓦岗军早已严阵以待，敌军一到就被义军冲垮，杀得敌人丧魂落魄，刘仁恭化装逃跑。同年，瓦岗军在洛口（即兴洛仓所在地）建立了临时革命政权，几十支起义军都来会合，队伍迅速发展到了几十万人。接着攻下回洛（洛阳北七里）、黎阳（河南濬县大伾山麓）两大粮仓，拿下洛阳附近许多据点，洛阳陷于瓦岗军的包围之中。隋王朝赶快调来另一个大刽子手王世充所率的兵团，妄图解洛阳之围，可是几次交锋，都被打得溃不成军，王世充躲进洛阳城里不敢出来。这样，隋王朝的两支王牌军全被瓦岗军所歼灭，瓦岗军也就成为全国农民起义军的主力。

第二支是由竇建德领导的起义军。

竇建德在高士达领导的队伍里，作风淳朴，与士兵同甘共苦，深得士兵的爱戴。在河北农民起义爆发后，隋炀帝下令太仆卿杨义臣、涿郡通守郭绚前往镇压。张金称、郝孝德等部队都先后失败，但竇建德却

在公元六一六年八月，歼灭了郭绚所部，砍下他的头颅。杨义臣急攻高鸡泊，由于高士达失去警惕，轻敌硬拚，为杨义臣所败，英勇牺牲。窦建德突围后，聚集了高士达、张金称的部队，收复了高鸡泊根据地，士气大振，几个月功夫，发展到十几万人，成为河北最强大的一支劲旅。六一七年一月，在一片凯歌声中建立了革命政权，定都于乐寿（河北献县）。七月，涿郡留守薛世雄率三万多人进犯，当进到河间（河北河间）附近的时候，窦建德预先布下伏兵，又亲率精兵一千，乘着大雾，冲入敌营，杀得敌军大败而逃。薛世雄仅带几百残兵狼狈逃窜。从此河北大部分地区得到解放。

第三支是杜伏威、辅公柘领导的起义军。

这支义军兴起于六一二年间。六一三年杜伏威率军从长白山向江淮一带转移，团结了江淮一带分散的起义军，革命力量得到迅速的发展。这时北方的农民起义节节胜利，牵制了隋王朝的军事力量，使他们赢得了时间，在江淮流域消灭了许多地主武装。公元六一六年隋炀帝调公孙上哲前往镇压，盐城（江苏盐城）一战，遭到起义军的伏击，全军覆没。六一七年又派老奸巨滑的陈稜率禁军八千人进犯，也被打得落花流水。起义军乘胜攻取历阳（安徽和县）作为根据地，使隋炀帝驻守的江都，受到致命威胁。

这样，以瓦岗军为中坚，以竇建德、杜伏威为两翼，控制了山东、河北、河南、江淮等广大地区，从根本上动摇了隋王朝的反动统治。到六一七年末，隋王朝仅能控制洛阳、江都、长安等几个城市，完全陷入了农民战争的包围之中。

这时候，许多大官僚、大地主眼看隋王朝即将覆灭，为了逃避农民起义军的惩罚，纷纷起兵形成各自割据的封建集团，并不断扩充实力，伺机夺取农民革命果实。如隋将罗艺自称幽州总管，霸占涿郡。鹰杨都尉梁师都割据陕西北部；马邑（山西朔县）将领刘武周占据山西北部；金城（甘肃兰州）府校尉薛举自称西秦霸王，他们纷纷打起反隋的旗号。

其中隋炀帝的姻亲、大贵族李渊更是野心勃勃。当时他任太原留守，在起义军遍布太原周围的时候，为了逃避起义军的打击，趁机窃取统治权，在六一七年起兵，渡黄河攻入关中，打下长安，控制了渭水流域，并取得富饶的巴蜀，经济与军事力量都超过了当时其他地主集团。

公元六一八年正当隋炀帝陷入农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朝不保夕的时候，大官僚宇文文化及于三月发动兵变，勒死了隋炀帝，隋王朝垮台了。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了唐王朝。紧接着，他调动主力军队镇压农民起义。

四

在农民革命战争的沉重打击下，隋王朝的统治垮台了，但社会主要矛盾并没有解决，许多称王称霸的军阀都成了镇压革命的刽子手，阶级斗争仍在继续发展，农民革命继续向封建割据势力冲击。六一八年三月，在江都的隋朝反动头子宇文化及率军北上，企图与洛阳的王世充配合形成夹击瓦岗军的形势。瓦岗军却利用敌军的矛盾，集中兵力击溃了宇文化及的反动军队。同年，窦建德起义军攻下河间郡等地，最终消灭了宇文化及的残部。在南方的起义军攻下江都等地。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势，却被内外阶级敌人给破坏了。

大贵族李渊趁瓦岗军与王世充鏖战之机，采取先西后东的策略，打垮了刘武周、薛举等封建割据势力，稳定了后方，扩大了地盘。他一面竭力挑拨各支起义军之间的关系，以便各个击破；一面竭力调整地主阶级内部的关系。同时又积极搜罗混进起义军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和隋朝死党，向起义军进行疯狂反扑。

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封建复辟和反封建复辟的两条路线斗争。正在革命大发展时，隋朝的官僚、政客、贵族、野心家们纷纷混进革命队伍里。他们到处煽风点火，制造分裂，时刻都想夺取领导权，把农民起义变成地主阶级争权夺利的工具。瓦岗军中的李密出身

于没落官僚地主家庭，是一个到处钻营，野心勃勃的政客。他钻到起义军中，结党营私，招降纳叛，形成一个阴谋复辟封建统治的集团。他排挤了翟让，自称魏公，篡夺了瓦岗军的领导大权。六一七年十一月，李密又阴谋杀害了执行革命路线的农民领袖翟让，引起瓦岗军革命将士的不满，甚至“众心颇怨”，严重的削弱了起义军的战斗力，使革命受到很大的挫折。六一八年洛阳王世充乘机进犯，李密战败，投降李渊，出卖了革命。公元六一九年江淮一带杜伏威降唐，他的养子世族地主闾陵与王雄诞，极力排挤坚持革命斗争的辅公祐，分化瓦解了起义军。辅公祐在六二四年三月于丹阳被俘就义。活跃在河北的起义军，为经不起考验的窦建德所出卖，降于王世充。在六二一年五月，为李唐王朝所战败。农民起义的主力军虽然先后被血腥镇压，但农民革命并没有被杀绝、被吓倒，他们在刘黑闥等人的领导下再度高举革命义旗。

刘黑闥本来是失去土地的农民，隋末，参加了窦建德起义军，英勇善战，博得“神勇”的称号。窦建德起义军失败后，他隐蔽在漳南（山东武城东），一面参加农业生产，一面酝酿再度起义。李唐王朝对起义军的余部横加摧残，并妄图把起义军的各级领袖押解到长安加以迫害。刘黑闥遂在六二一年七月率众起义，攻占了漳南县城。八月攻克饶阳。九月饶阳一战，打

得五万唐军狼狈逃跑，半年之内，完全收复了窦建德原来控制的地区。公元六二二年初，攻下洛州（河北永年），建立了革命政权，号称汉东王。

刘黑闥领导的农民起义动摇了李唐王朝的统治，李渊慌忙命令李世民、李元吉统率唐军进驻卫州（河北汲县），对洛州展开了攻势。又调幽州总管罗艺率兵数万南犯。洛水一战，起义军的主力为李世民所破，沙河一役又败于罗艺，直到同年十二月，刘黑闥为叛徒饶阳守将诸葛德盛出卖，壮烈牺牲。

刘黑闥农民大起义虽然又失败了，但此伏彼起的反唐斗争直到六二四年才告一段落。

五

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功绩，首先是推翻了隋王朝的统治。

隋末农民革命战争的实践证明，貌似强大的封建帝王不过是一只纸老虎。隋炀帝从六〇四年即位到六一六年就陷入农民战争的包围之中，并预感到末日将临，每天饮酒作乐，照着镜子说：“我这颗脑袋，不知谁来砍它”。正是人民战争的巨大力量，把隋炀帝推上断头台，加速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

其次，隋末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义军控制的山东、河北、

关陇、江淮等地区，一向是世族地主霸占的地方，而义军所到之处镇压了大量贪官污吏和地主豪绅，有力地冲击了封建生产关系，使农民的依附关系得到减轻，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扫除了障碍。唐代初期的经济恢复与发展，正是隋末农民革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结果。

最后，隋末农民大起义促进了中华民族进一步团结与发展。隋末农民大起义有离石(山西)胡、白瑜等少数民族被剥削者参加的反封建斗争，打乱了隋王朝对少数民族的统治，而各族人民在斗争中同甘苦、共患难，又加强了相互往来与经济文化的交流。这样，各族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革命战争

中国历史上唐王朝(公元六一八年到九〇七年)的统治，依然是豺狼当道，人民遭殃，终于爆发了唐末农民大起义。

唐政权拥有庞大的军队，到八〇七年就有兵卒达八十三万人之多，当时全国纳税户仅一百四十四万，不到两户就得养活一个兵。它还维持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到八〇五年文武官吏将近三十七万人，这就构成了剥削人民的吸血网。唐王朝还控制了大量的土地，建立起官庄与皇庄。官庄是以封建王朝的名义所霸占的土地，由户部与各地方官吏派遣庄宅使、宫使、宫苑使等管辖，对农民进行剥削。皇庄是皇帝和皇室的私有土地，租给农民耕种，由管庄的内庄宅使、内园使、内宫苑使等向农民榨取租税。这时，世族地主已走向衰弱，而官僚地主与一般地主却成了掌握政权的实权派。官僚地主依仗权势，可以从皇帝那里得到赐田、借地或强占民田，还可以用买卖的手段，大搞土地兼并，所谓“比见朝士，广占良田”。这些人肆无忌惮

俾地兼併土地，到“安史之乱”以后更加严重。一般地主，包括商人、高利贷兼地主在内，通叫作“富豪之家”，也在猛烈地兼併土地。他们是：“多置良田广修宅，四邻买尽犹嫌窄”的吃人豺狼。商贾地主更是如此。唐初的邹凤炽曾对皇帝说：他可以买下终南山，如果一棵树价值绢一匹的话，把山上的树买完了，他家的绢还用不完。这是个地地道道的商人兼地主。唐王朝到处建立寺院，极力扶植僧侣地主的发展。僧侣地主通过典买庄田，强占荒地，宗教性的讹诈等办法掠夺大量的土地，以致“京畿之丰田美腴，多归于寺观”。僧侣地主也就成了脑满肠肥的寄生虫。

被剥削的农民名称极多，多少有些土地能够自耕的叫自佃人，为地主庄田劳动的叫做庄客、客户、庄户、佃户、佃家和寄庄户等。庄客与庄主间，是一种租佃的剥削关系，庄客必须缴纳“庄租”、“租课”。官庄的地租大约每亩“税粟三斗，草三束、脚钱一百二十文”，还要交丝、麻等物。私庄的剥削大体采取分成制，每亩地租在五斗到一石之间，剥削量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此外，还要缴纳草料、油料、丝麻以及土地上出产的一切东西，并受到高利贷的盘剥。一年辛勤的劳动，结果仍是过着“无米复无柴、男女空饿肚”的悲惨生活。无论在什么地方，农民都被当作牛马看待，担负着沉重的劳役，“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

避征徭”。农民必须缴纳正税(资产税，田亩税)，以及其它苛捐杂税，所谓“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尽尚征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尤其到唐朝后期，政治更加腐败，官僚与宦官们互相争权夺利，搞得乌烟瘴气，生活也越来越奢侈腐化。如唐懿宗非常宠爱他的女儿同昌公主，在她出嫁的时候，便在广化里给她建筑一所豪华的住宅，门窗上镶着宝石，用金丝编了箕筐，其它的东西也都是用金银做成的，连井口上的栏圈都是用玉石和金子打成的。过了两年，同昌公主死了，埋葬的时候，光陪葬的衣服就有一百二十箱，送葬的仪仗队排列有三十多里长。皇帝因想念公主，特意征来几百名女子，在用八百尺丝绸做的地毯上给他跳舞“解闷”。舞毕，珠宝手饰洒了满地。

残酷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地破坏，必然迫使农民举起义旗，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

二

在唐王朝残暴榨取农民阶级血汗的时候，就不断发生各种反抗斗争。逃亡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斗争形式。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就曾发生：“今天下户口，逃亡过半”的现象。逃亡的人多了，向封建王朝缴纳赋税、

负担劳役的人就少了，所以，在唐玄宗时竟用酷吏宇文融为劝农使，一次就搜括出逃户八十多万，占全国户数十分之一弱。到唐朝后期，由于土地兼并的猛烈发展，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多，逃亡人数更增加了。据记载：公元八一八年陕西渭南县长源乡原有四百户，下降到一百多户，河南阌乡县本来有三千户，现在只剩下一千户，其他州县，大体相似。逃亡的农民有的投奔官僚富豪之家，或者逃入寺院。但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些逃亡的农民仍然变成他们的客户，无法摆脱封建剥削与压迫。有的逃到边远地区开荒垦田，不久，又被唐王朝发现，不但将土地夺去，还要“置州镇压”，有的逃亡到山林里进行武装斗争，所谓“所在群盗，半是逃户”。公元九世纪以后，农民起义更是连续不断，浙东地区与桂林地区的起义，揭开了唐末农民革命战争的序幕。

公元八五九年十二月，浙东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攻克象山(浙江象山)，进逼明州(浙江宁波)，攻剡县(浙江嵊县)，震动了整个浙东。八六〇年正月占领了剡县，击败来犯敌军，斩官杀吏，并整编队伍为三十二队(每队一千人)。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定年号“罗平”，造了刻有“天平”的大印，成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分兵四出征战。唐王朝赶忙派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王式率领六镇军队，加上由回鹘与吐蕃所组成的

骑兵，包围了起义军所在地——宁海。起义军应战失利，六月初退到剡县固守，和敌军展开了浴血奋战。三天内打了八十三仗，城内人民和义军团结一致，连老弱妇孺都齐上城墙，用石块反击唐兵，打得敌人疲惫不堪。起义军坚守了一个月，终因寡不敌众，矢尽粮绝，被迫突围。不幸裘甫在突围中牺牲，刘从简率领五百战士转移到奉化县西北的大兰山中，在七月间失败。这次起义震动了整个东南地区，成为黄巢大起义的先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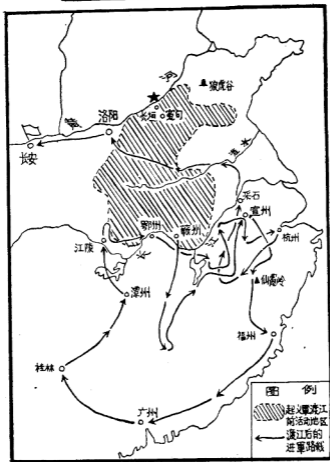
公元八六八年又爆发了庞勋领导的农民起义。原来在八五九年以后，唐和南诏(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发生了战争。唐王朝为了加强对西南的统治，在各地募集士兵到岭南戍守。从徐州与泗州招募的两千人，有八百人去守桂州。定期三年调还，可是直到八六八年仍不予轮换，戍卒们又受到种种迫害，激起了他们的愤怒，于八六八年七月爆发了起义。以粮料判官庞勋为领袖，“劫库兵北还”，沿途受到人民的热烈支持，胜利地渡过了淮水。十月，攻占了宿州，并打败从徐州调来的唐军，在人民的帮助下，很快又攻下徐州，起义队伍更加扩大。八六八年冬，占领了淮南和淮北的广大地区，切断了从江淮通往长安的漕运线。义军到处镇压豪富，攻城杀吏，威震中原。

唐王朝急派康承训率领十万官兵前往镇压。义军



黄巢大军攻占了通往长安的门户——潼关

黄巢起义军进军路线图



英勇战斗，将敌军打败。这时，庞勋开始骄傲起来，发生许多错误，贻误了战机，使敌人败而复聚。八六九年二月，唐军再次向起义军反扑，义军连战失利，唐降将张玄稔出卖了宿州，阶级异己分子路审中又在徐州城内叛乱，打开城门引进唐军，徐州陷落。由庞勋所率领的一支队伍，走到郟县被包围，庞勋等一万多人战死，表现了刚毅不屈的革命精神。从此，庞勋的余部斗争更加艰苦，散居在衮、郛、青、徐四州之间。事隔六年，全国性的农民革命战争爆发了，他们就成为起义军的骨干力量，汇成了一支巨大的革命洪流。

三

在唐王朝的残酷统治下，使广大农民群众失去了防御天灾的能力。到八七三年灾情更加严重，从河南西部到东海之滨，秋粮颗粒不收，农民只能以蓬蒿的种子和采槐树叶充饥。州县官吏还加紧催讨各种捐税，有的嫁妻卖子也凑不足被摊派的税额，农民群众忍无可忍，不断地掀起反抗斗争。当时在曹州流传一首民谣：“金色虾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广大人民以寓言的形式大造革命舆论。八七四年年底，山东濮县人王仙芝率领三千多人，在河南的长垣（河南范县）起义，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发表文告，揭露了唐王

朝官吏贪污、横征暴敛的罪行。八七五年五月，攻克曹州(山东曹县)和濮州(河南濮阳)。当王仙芝攻破濮州时，黄巢在曹州一带率领几千人参加了起义队伍。黄巢是山东冤句(山东菏泽县)人，读过书，会骑马射箭，文武双全又能接近群众。黄巢起义后，逃避苛捐杂税的贫苦农民纷纷参加义军，几个月功夫就发展到几万人。起义军向东深入到沂蒙山区，不久进入河南，破阳翟(河南禹县)、郑城(河南郑县)。八七六年九月打进了汝州(河南临汝县)，活捉汝州刺史王镣，并包围了郑州。革命形势的发展，吓坏了唐朝统治者，匆忙拼凑军队，妄图把义军消灭在汝、郑之间。起义军却乘势转到河南南部，连破许多地方，活跃在鄂豫皖地区。到十二月，包围了蕲州(湖北寿昌县)，蕲州刺史裴渥被迫投降。

在这种形势下，唐王朝一面进行军事镇压，一面用封官赐爵的欺骗手法诱降。唐王朝派招安使臣，授王仙芝官爵，而盐贩子出身的王仙芝，却兴高彩烈，妄想投敌背叛革命。这种投降活动，激起了以黄巢为首的广大起义群众的无比愤怒，黄巢当面怒斥王仙芝：“始共大事，横行天下，今独取官而去，使此五千众安所归！”随后，又“殴仙芝，伤其首”，广大起义战士也一致反对，“諠论不已”。在广大群众反投降斗争的压力下，王仙芝虽然没敢公开投降，但从此起义军内部

却发生了分裂。

八七七年二月，黄巢率军打入山东，破郚州（山东郚州），沂州（山东临沂），击溃唐行营招讨使宋威，逼敌退守宋州（河南商丘），以后又攻占了濮州。王仙芝、尚君长率军攻占了鄂州（湖北武昌）、安陆（湖北安陆）等地方，包围了襄阳。这时王仙芝继续执行投降主义路线，并派尚君长等去洛阳谈判投降条件，途中被唐军所捕杀。这次叛变虽未成功，却给这支起义军带来极大的损失，涣散了斗志。八七八年正月攻江陵失利，转入河南，到申州受到唐军截击，被迫退走湖北。二月在湖北蕲州的黄梅展开了激战，起义军牺牲了五万多人，王仙芝阵亡。这时，黄巢起义军正在围困亳州。尚让等率领王仙芝余部参加了黄巢的队伍。大家一致推举黄巢为领袖，革命有了统一的坚强领导，更加蓬勃发展起来。黄巢自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表示只有冲破地主阶级统治的“天”，才能实现“均平”的伟大理想。它给孔老二的反动天命观以有力的打击。同时也建立了革命的领导体制。

这时镇压王仙芝的唐军曾元裕北援亳州，起义军遂撤亳州之围，转攻宋州（河南商丘）、汴州（河南开封）等地，摆出攻打洛阳的样子，引起唐王朝统治者一片惊慌，赶忙把主力摆在洛阳一线防堵。起义军却避实击虚，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打到江南去，作

战略上的转移，切断唐王朝的南北供应线。公元八七八年三月，大军横渡长江，攻占了虔(江西赣县)、吉(江西吉安)、饶(江西鄱阳)、信(江西上饶)等州。又从浙西转攻浙东。唐王朝急调荆南节度使高骈率领川东军赶来镇压。义军交战失利，于是急速向福建进军，以顽强的革命毅力和艰苦的劳动，开出了七百里长的山路，十二月占领了福州。公元八七九年二月起义军通过潮梅地区，七月攻克广州，活捉了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然后进岭南、占桂林，控制了东起潮梅，西至苍梧的岭南千里之地。这时起义军发展到几十万人。黄巢被大家拥为“义军都统”，成为全国各地起义军的总领袖，并发表文告，痛斥唐王朝欺压百姓等罪恶，还颁布禁止刺史增殖财产、县令贪污要处死刑的法令，显示了与唐政权血战到底的决心。

起义军到广州后受到瘟疫的威胁。为了彻底推翻唐王朝的黑暗统治，经过两个月的休整，于九月取道桂林，乘坐竹筏，沿湘江北上，十月抵江防重镇潭州(湖南长沙)城下。唐王朝的宰相王铎屯兵于江陵，行营副都统李系率五万唐军进驻潭州，“以塞岭北之路”，和江陵形成对角阵势，妄图堵截起义军。但锐不可挡的革命大军只用一天功夫就攻破了潭州，全歼五万敌军，李系逃窜到朗州(湖南常德)。起义军乘胜进逼江陵，王铎吓得逃奔襄阳，江陵宣告解放。然后起义军

又直取襄阳，唐王朝赶忙把唐军集结在襄阳荆门一线，义军中伏失利，转兵东进。十一月攻占了湖北的鄂州(武昌)，江西的饶州(鄱阳县)、信州(上饶)，安徽的池州(贵池)、宣州(宣城)、歙州(歙县)，浙江的湖州、杭州等江南十五州的广大地区，粉碎了唐王朝的长江防线。

公元八八〇年三月，唐王朝派大刽子手高骈为诸道行营兵马都统，拼凑了七万唐兵，妄图再次堵击义军北上。在信州的起义军和高骈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相持了半年。高骈为了抢战功，把非直属的诸道兵调走。在北渡淮河的时候，起义军在七月向唐军发起总攻击，一下子歼灭了高骈的精锐部队，杀死他手下“骁将”张磷，乘势从采石渡江，屯兵六十万于天长(安徽天长县)，杀得敌人“上下失望，人情大骇”，刽子手高骈也自称得了风痹症，不敢出来。义军兵锋所向，势如破竹，敌人的防线又一次崩溃了。九月渡淮水，攻占泗州。十月攻占光州、申州，北入颍州、徐州、兖州、宋州等地。十一月破汝州，直取洛阳。一路上义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遇到贫苦农民争相救济，受到人民的拥护，参军的越来越多。黄巢还发表了告唐朝官兵书，指出：起义军直取洛阳，转而进攻长安，问罪于朝廷，地方文武官吏只要守境安民，不进行抵抗，绝不问罪。这个文告提出了主攻目标，起

了瓦解敌政权的作用。不久就攻下了洛阳，对城内军民加以慰问，秩序井然，人民安居无恐。

起义军占领洛阳，使唐王朝慌作一团，只好派神策军(中央卫队)去助守潼关。神策军本是乌合之众，由富家子弟与浪荡公子所组成。他们平时穿着华丽的衣服，骑着高头大马，仗势欺人，无恶不作，从来没上过战场，一听说要打仗，骨头都吓酥了，有的同家里人抱头大哭，许多人拿钱雇人代替去打仗。这样腐败的军队，怎能打过起义军呢？起义军在十二月兵临潼关城下，威武的阵容，一望无际的军旗，早吓得敌人胆战心寒。十二月二日就拿下了潼关。这时阶级力量的对比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人盘踞的长安城已经危在旦夕了。

义军接着占领华州，唐僖宗(李俨)仅仅领着卫队与少数皇亲、嫔妃向四川方面仓皇逃跑。十二月五日英勇的义军战士进入了长安城。长安市民都出来夹道欢迎。起义军还向人民宣传：黄王起兵，本为百姓，不像李家王朝欺压人民，你们安心生活，不要害怕。义军在长安爱憎分明，“遇穷民于路，争行施遗”，并多方救济贫苦群众，而对皇亲国戚与富家大族却十分痛恨，不少被捉处死。黄巢在起义前夕，曾作了一首《不第后赋菊》诗，诗中写道：“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现在这

一革命的抱负实现了。整个长安充满了革命欢乐气氛。在这座古城里，农民革命的洪流荡涤着唐王朝留下来的污泥浊水。黄巢受到当时劳动人民的热烈拥护。有一首民谣说：“要知圣人姓，田八廿一(黄)，要知圣人名，果头三屈律(巢)”。劳动人民根本否定了地主阶级吹捧的“圣人”——孔老二，而是把黄巢当作“圣人”来歌颂。

八八一年一月十六日义军在长安正式建立了革命政权，国号大齐，年号金统。新政权严厉镇压了那些阴谋暴乱的阶级敌人。如唐降将张直方，藏匿许多唐朝官吏及其死党，妄图组织暴乱。义军发现后，立即法办，镇压了张直方等一百多名反动分子，这些吸血鬼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唐王朝中央政权与地方割据政权虽然矛盾重重，但在镇压农民起义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这时，各地藩镇纷纷出兵抗击起义军，义军内部不断出现分裂活动，一些唐降将与投机分子常常拉出队伍投敌，使起义军处境非常不利。八八一年三月，唐王朝以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布置反扑。四月进犯长安，黄巢为了歼灭敌军暂时撤走。敌军入城，大肆烧杀抢掠，唐朝官军抢了许多珍珠财宝，因负载过重，无法行走，义军便大举反攻，打得敌人一败涂地，乘胜收复了长安与很多据点。可是义军并未乘胜追击，给敌人以重

新集结进行反扑的时机。义军重占长安以后，阶级斗争异常激烈，不但所控制的地区越来越小，而且有的地主分子搞武装暴乱，有的坚壁清野与人民为敌，由于缺粮严重使义军坐困长安。八八二年四月，王铎纠集了十四路反动官军包围长安。九月发生了驻防同州要地的出身于流氓赌徒的野心家朱温叛变，起义军失去了东面的防线。唐王朝又调遣外号叫做独眼龙的沙陀族李克用向长安东、北两面进犯，八八三年二月梁田陂一战，与四月的渭桥激战，起义军连续失利，不得不作战略转移，撤出长安。他们由蓝田东出河南，攻占了蔡州(河南汝南)，向北围攻陈州(河南淮阳)达三百天之久。八八四年四月沙陀族李克用等军队对包围陈州的起义军展开进攻，起义军撤陈州之围，从河南退到山东。在这紧要关头，原王仙芝部下尚让，也叛变投敌，敌军步步进逼，起义军伤亡很大。六月，黄巢最后退到泰山狼虎谷(山东莱芜县境内)，在敌军重重包围下，他们至死不降，黄巢自杀，跟随黄巢的起义军全部壮烈牺牲，这次革命终于失败。

四

以黄巢为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摧毁了唐王朝的黑暗统治，给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

唐的称号尽管还延续了二十多年，但唐王朝已经

是名存实亡了。因为起义军横扫了大江南北，打乱了封建中央专制机构，统治势力大为削弱，仅形同一个小藩镇。又常常受到地方军阀的挟制，并以拒绝给朝廷缴纳库银相威胁，使王朝财政开支极为困难，甚至百官的薪俸都开不出来。可见正是农民革命打得唐王朝一蹶不振，扼杀了它的经济命脉，使其财政收入陷入枯竭的地步。

黄巢大起义又给世族地主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从九〇七年以后，中国出现了“五代十国”的封建割据局面。这些地方军阀，有的是起义军的叛徒，有的是镇压革命的地主，有沙陀族的统治者，有小军官爬上去的统治者，唯独没有世代相传的世族地主。这说明了农民革命的力量使世族地主彻底垮台了。起义军还非常痛恨皇亲国戚和贪官污吏，抓到之后就给以严惩，严重地打击了官僚地主。正因为此，“五代十国”的军阀统治的局面是不稳定的。当时农民的反抗与军队兵变交错发生。列宁指出：“人民中的义愤愈深，军队就愈不可靠，官吏中的动摇就愈大。”有的兵变正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有的兵变虽然被地方军阀所利用，但都反映了在黄巢大起义的沉重打击下，统治阶级的某些军队的不可靠性与官僚统治的动摇性。起义军也打击了一般地主。据历史记载，黄巢过后，谁家的田园也没有完整的。这就充分说明黄巢领导的农民革命

战争摧毁了唐政权，严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暂时地中断了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唐末农民大起义，第一次提出了“均平”的战斗口号。当时这种“均平”思想是农民革命思想的重大发展，因为它是反对封建剥削制度的口号。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无非是为了完全推翻地主权力和完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而斗争的农民力求平等的革命愿望的表现而已。”唐末以前的农民战争是侧重反对劳役与兵役，反对人身依附的斗争。这次农民反封建斗争却侧重在要求实现政治平等，财富平均的斗争。这是对过去农民战争经验的总结，而把以前的农民战争的理想与主张进一步地深化与发展，使农民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次农民战争的足迹踏遍了山东、河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西、广东、湖南、陕西等十二个省份，行程数万里，经历了十年之久。这样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推动了各地农民反封建斗争的发展。在山东、河南分散起义的农民到处都是。他们“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纷纷造反，打击唐王朝的统治。当义军攻下洛阳、长安以后，各地农民起义就更多了。在八八一年有寿州王绪的起义；浙江有临海杜雄的起义；永嘉朱褒的起义；遂昌卢约的起义。

在湖南有“武陵蛮”曹满的起事，“石门蛮”向环的起义。八八二年有四川邓州的阡能起义，蜀人罗浑擎的起义。在江西有钟传的起义等等。这些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反抗斗争，也有力地支持了黄巢起义军的革命斗争。这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与进军，不但是我国农民革命战争史上的创举，在世界农民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

黄巢起义军能够避实击虚，转战南北各地，不但在战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也给南北经济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例如起义军从浙东向福建进军时，开辟了从衢州到建州（福建建瓯）七百里山路，这是伟大的创举。这条路所经过的仙霞岭是万木丛生，荒无人烟的地区。经过起义军的艰苦劳动，开辟的这条通往福建的陆路交通，对于东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劳动人民在南北各地转战中，又交流了生产技术与生产经验，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五

毛主席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里指出：“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这是极为重要的教训。黄巢起义军在长期流动作战中，没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没有可靠的后方，也就建立不了稳定的革命政权。他

们攻克了长安，却把洛阳抛弃了，又没有乘胜追击彻底捣毁唐政权，使敌人有可能卷土重来。在长安也只注意建立政权机构，忙于军事上的攻取，没有充分的发动群众，没有更严厉地镇压反革命分子，没有解决粮食问题，只是孤守长安，给敌人以可乘之机，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

这次农民战争是两个阶级又一次大决战，封建地主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从内部瓦解义军，在起义军内部始终存在着投降与反投降的两条路线斗争。在八七七年，黄巢与起义群众坚决的抵制了王仙芝的投降活动，使革命走向了新的发展阶段。八七九年，义军在江浙受到暂时挫折的时候，又有以毕师铎为首的几十名将领叛变革命，义军粉碎了敌人分裂革命队伍的阴谋，打开了新的局面。革命每前进一步，都是同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获得的。攻克长安后，革命取得空前胜利，义军内部的斗争更加复杂。一些伪装革命的唐降将纷纷拉出队伍，打击起义力量。野心家们要背叛投敌，不坚定分子也蠢蠢欲动，投降和反投降的两条路线斗争日趋激化起来。虽然义军采取一些措施，但并未完全清除叛变分子。当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些隐藏较深，诡诈多端的分子就露出凶相。如副都统尚让等投降敌人，叛变革命，还伙同敌人的军队追杀起义军。可见，起义军失败的

另一个原因，还在于没有把反投降的路线斗争进行到底。这里也给我们留下极为深刻的教训，即必须保持高度革命警惕，坚持路线斗争，善于识别那些伪装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阴谋家与野心家，以保卫我们已经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伟大胜利。

两宋时期的农民大起义

两宋时期（从公元九六〇年到一一二六年是北宋统治时期；一一二七年到一二七九年是南宋统治时期）的农民大起义，也同历代农民起义一样，是“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的必然结果。

一

在两宋时期的三百多年里，腐朽的封建王朝，倚仗着反动的国家机器，制订了一系列繁重的赋税、徭役制度，高度地集中土地，敲骨吸髓地榨取农民的血汗。宋王朝采用了屯田、营田、职田、学田和寺田等形式来经营他所直接控制的土地，并不断地用各种卑鄙手段扩大“官田”。公元一一一一年设立了西域括田所，名义上要把一些荒地 & 无主的土地收作官田，实际上是强占肥沃土地，把仅有一点点土地的农民逼成佃户榨取租税。到一一二〇年，北宋王朝掠夺的民田竟达三万四千三百顷以上。官僚地主还通过皇帝的赏赐乘机大肆掠夺土地，更多的则是用买卖手段来进行土地兼併。南宋一个封建将领张浚一年囤租米就有六

十万斛，占有土地不下六七十万亩。两宋时期的大地主都在农村扩大庄田，兼并土地，鱼肉人民，横行霸道。还有商人兼地主的，他们常常是贱买贵卖，囤积居奇，扩大财产，吞蚀土地，美其名为“求田问舍”。再有高利贷兼地主的，也在千方百计地侵占土地。所以到北宋英宗统治时期，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集中到封建地主手里，南宋统治时，三分之二的农民都变成他们的佃客。

宋王朝统治者把它所控制的户分为主户与客户。凡是占有一定土地，缴纳赋税的户叫主户，没有土地的佃客叫客户。它又把主户分成五等。一、二等户是指占田三顷到几百顷的大地主，三等户是指占田一顷到三顷的中小地主。四、五等户只不过是占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北宋时，四等户约占主户的百分之十二，五等户和客户加起来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而一、二等户只占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

当时耕种地主土地的农民，必须向地主缴纳实物地租。比较普遍的租佃形式是分租制，有牛具种子的四六分，没有的对半分，剥削重的高达七成。此外还有定额租，不管年成好坏都要按等按期交纳地租。这些受奴役的客户生活非常困苦，终年劳动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并常常受到地主加租、夺佃的威胁。主户中的四、五等户和客户之间没有显著的区别，都是被剥

削者，所谓“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就是对农民艰难处境的真实写照。

两宋时期的上三等户里许多享有特权的地主，是不纳税不出劳役的，僧、道和有军籍的人也有免役权，即使应当纳税服役的地主，又用种种办法转嫁出去；因此赋税和劳役就全都压在农民的身上。还有“丁口之赋”的正税。丁口之赋在形式上不分主客户都必须缴纳，实质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承受着最大的负担。由于交赋税不在本州而要送到别的州交纳，叫做“支移”，弄得广大农民“往返千里，耗费十倍”。有时官府按照它的需要，将某种物品折合成别的物品或货币交纳，叫做“折变”，使人民的负担愈来愈重。其他如盐税、茶税、商税，甚至果菜也要纳税、加税。到南宋统治时，苛捐杂税更多如牛毛。南宋统治的地区不及北宋的三分之二，可是税收却高于北宋。广大农民既交纳租税，又负担繁重劳役，被逼得倾家荡产，无法生活下去，阶级矛盾一天比一天激化起来。

从宋代开始，封建社会已向后期过渡，地主阶级更加腐朽没落。为了维持其江河日下的反动统治，它们不断吸取各种唯心主义渣滓，去填充儒家思想，把儒家思想推进到更加反动的理学阶段。反动理学家代表，在北宋有程颐、程颢，在南宋有朱熹等。他们十分欣赏“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将孔老二抬

到吓人的高度。还宣扬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是不可抗拒的“天理”，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甚至大肆叫嚷“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吃人的封建礼教。地主阶级“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把它作为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思想武器，摧残人民的造反精神。因此，广大人民在反封建斗争中，必然横扫反动的儒家思想。

二

唐末农民大起义，曾横扫大半个中国，但并没有进入四川。因此，四川的阶级关系始终很紧张，到北宋初期仍没有多大改变。

北宋初期，四川地区的土地集中情况，非常严重。佃户约占全境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一个豪强地主占有几十、几百甚至上千的“旁户”（佃客），对他们“役使之如奴隶”。“旁户”不仅向地主交纳地租，而且还要负担地主向国家交纳的赋税和徭役。这时候，北宋王朝还在四川设置“博买务”机构，实行专买政策，将丝帛、茶叶等产品，统一由封建国家收买垄断，严禁私市贩卖。因此，使广大手工业者、茶户和农民不断破产，断绝了他们的生路。在公元九九〇年到九九四年，四川又出现了严重灾荒，使“两蜀大饥”，促进阶级矛盾更加尖锐。以佃户为基本力量的广大农民和手

工业者，终于发动了著名的武装起义。

公元九九三年的春天，四川青城县人王小波率众起义。王小波向广大群众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这个著名的“均贫富”的战斗口号，是为了反对土地掠夺和繁重的租税而提出的。它是封建社会的农民为消灭地主权力和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最革命的思想。它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强烈要求。革命风暴迅猛发展，起义后十天左右，就形成一支好几万人的革命大军。起义军以破竹之势，攻克了青城和彭山等县城。彭山解放后，立即处决了爱钱如命、贪污害民的县令齐元振，并“剖其腹，实以钱刀”，严惩和揭露这个用残暴手段掠夺人民财产的坏蛋，并将其所存金帛，散发给广大群众。这些措施，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使起义队伍不断壮大。同年十二月，起义军进攻江原县（四川崇庆县境），王小波中流矢后牺牲。群众公推李顺为领导人，继续执行“均贫富”的革命纲领。起义军每到一处，就把当地的“富人大姓”召集在一起，命令他们将家中所存的财产和粮食数字呈报给起义军。起义军根据其家庭人口等情况，留下必需的生活费用，其余全部归公。用这些钱粮“大赈贫乏”。这种“均产”斗争，给封建统治势力，以沉重地打击，使革命力量不断有了新的发展。

公元九九四年正月，起义军锐不可挡，迅速向成

都推进。因受到成都守敌的顽抗，起义军为保存实力，转移敌人视线，弃成都之围，用两天的时间攻下汉州和彭州。乘敌人疏于戒备之时，再率大军猛攻成都，敌军被迫弃城逃跑。起义军进城后，迅速建立了农民政权，国号大蜀，年号应运，李顺称大蜀王。李顺调兵遣将，夺取敌人盘踞的附近城乡，“所向州县”，“无复完全”，敌军纷纷投降，起义队伍不断扩大，“使两川大震”，形势一派大好。这时，北起绵州，南至巫峡，大部分地区都在农民政权控制之下。

成都解放后，北宋王朝惊恐万状，立即派大军，准备从川东和剑阁两路入川。由于起义军未能及时夺取“青天为路，剑为锋”的剑门要地，使战斗失利。北宋军队首先从栈道入川。九九四年五月，宋军攻入成都，十多万守城义军，全部壮烈牺牲。起义军余部，在张余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到九九五年二月，张余被俘牺牲，这次起义才告结束。

王小波和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沉重的打击了北宋王朝的统治，特别是横扫了四川的封建势力，使广大佃农的封建依附关系有所减轻。北宋王朝在成都设立的博买务，四川佃农的“旁户”称号，都被农民革命的铁扫帚扫进了历史坟墓。推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这次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北宋王朝的社

会矛盾，仍在继续发展，“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的农民起义，大有“遍满天下”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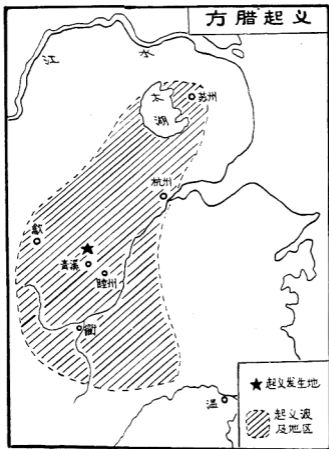
三

北宋时期，汉族地主政权与辽、夏贵族的矛盾一直很尖锐。宋王朝在同西夏与辽的历次战争中，一再失利，节节退让，最后屈辱求和，每年“以百万计”的银、绢送给西夏与辽的统治者，用人民的血汗来换取朝廷的苟安，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北宋末期的皇帝宋徽宗，为了满足其纸醉金迷的生活，和蔡京、童贯、朱勔等“六贼”狼狈为奸，大肆搜括江南的奇花异石，供他们玩赏。一一〇二年童贯在苏杭等地设置了造作局，集中各种工匠几千人制造各种奢侈品。又特设了“苏杭应奉局”，把搜括来的花石等，用大量船只运往开封，每十船为一纲，叫做花石纲。凡是百姓家中有可供玩赏的一石一木，都被抢夺了去，“江南数十郡，深山幽谷，搜剔殆遍”，官吏还借机敲诈勒索。在搬运又大又重的山石时，遇到桥梁太矮，就拆掉桥梁，遇到城门太窄，就拆毁城门。蔡京、童贯、朱勔等一伙竟这样恣意掳掠和役使人民，搞得连中等人家都破了产，至于贫苦农民更是苦不堪言。当时有首民谣说：“打破筒（指童贯），泼了菜（指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广大人民对北宋王朝的地主阶级罪恶统治，已经



方腊号召群众奋起反抗宋王朝的统治

方腊起义



达到深恶痛绝的地步。

公元一一二〇年，浙江歙州(安徽歙县)人方腊，借传播魔尼教(唐朝时从波斯传到中国的宗教)举起了革命造反大旗。他借魔尼教“二宗三际”(二宗是指世界上有明与暗两种势力斗争，三际是指斗争的发展阶段)的主张向信仰魔尼教的人宣传当时是处在黑暗(指封建势力)超过光明的中际，号召每个教徒必须和黑暗势力作斗争，才能达到光明的后际。号召农民要用革命去战胜封建势力。还提出“法平等，无有高下”和“男女无别”的平等主张。他们崇拜张角为祖师，不吃荤，不喝酒，不拜神佛，提倡互相救济等。这些主张和做法对儒家思想是有力的冲击，在反封建斗争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恩格斯指出：“这种严格的禁欲主义的风纪，这种摒弃一切人生享乐的要求，一方面是要面对警统治阶级树立起斯巴达式严格平等原则”。

青溪县境内的梓桐、帮源各洞，方圆都有几百里，其间山谷幽险，遍地都是竹林、漆树和松杉等经济作物。北宋统治者，在这里的勒索特别严重，因此，起义首先在这里爆发。方腊曾在歙州、青溪为佣，是雇农出身。方腊在公元一一二〇年十月起义时，率领一千多群众，在一处漆园里发表誓师动员，在动员中无情揭露了北宋王朝残酷剥削压迫广大革命群众的罪行，明确地指出了斗争目标：既反对北宋王朝的反动统

治，又反对辽、夏的掠夺。主张“十年之内，终当混一”，推翻北宋王朝的反动统治，解除人民的痛苦。在方腊奋臂高呼：“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的号召下，广大人民纷纷响应。方腊自称圣公，改元永乐，置官吏将帅，领导人民进行反封建斗争。起义几天后就由原来的一千多人发展成十万以上的造反大军了。同年十一月，起义军在青溪县的息坑，歼灭敌军五千多人，攻占了青溪县。十二月克睦州、歙州(安徽歙县)、衢州(浙江衢县)、处州(浙江丽水)等地。月末进逼杭州，知州事赵霆弃城逃走，起义军杀了制置使陈进、廉访使赵约，占领了杭州。另一支起义军向西挺进，攻下婺源(江西婺源)、包围了信州(江西上饶)。起义军在几个月内，取得很大胜利，攻占了六州五十二县。这时，兰溪灵山的朱言、吴邦；越州剡县的仇道人；台州仙居的吕师囊；方岩山的陈十四；苏州的石生；归安的陆行儿等，都率领成千上万的群众，纷纷起义，他们都打着方腊的旗号，只要喊一声“方腊来了”，所到之处，敌人便望风瓦解。这样，以浙江为中心，包括江苏、安徽、江西的一部分地区，都控制在义军手里。各地民众积极支持义军，往往自动当响导，引导义军“劫富室，杀官吏”和儒生。农民革命威震东南，起义人数达百万以上，成为十二世纪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宋徽宗惊恐万分，急忙派刽子手童贯、谭稹率领十五万军队，开到江南，对农民起义进行血腥镇压。同时又玩弄政治欺骗，在一一二一年正月，宋徽宗假惺惺地下“罪己”诏，宣布撤销“苏杭应奉局”，停止“花石纲”的征敛，罢了朱勔的官，以麻痹与瓦解起义农民思想和革命斗志。一一二一年一月，六万起义军进攻秀州（浙江嘉兴），驻秀州的宋军与地主武装进行顽抗，恰在这时，童贯率领军队从镇江赶来，和起义军展开激战，因寡不敌众，义军退守杭州。二月杭州被围困，又转移到睦州，接着敌军又包围了睦州。起义军经过两个月战斗，损伤很大，粮食与武器非常缺乏，只好在四月退到青溪县的帮源洞和梓桐洞。四月廿六日起义军的最后据点——梓桐洞被攻破，方腊等五十二名领袖被俘牺牲。余下的七万多人在敌军重重围困中，英勇不屈，坚持战斗，最后全部壮烈牺牲。今天在皖南地区的休宁、歙县各地，还流传着“粮食登场官府抢”，“石塔露水腊为王”的歌谣，反映了方腊在收获粮食，石塔露出水面的季节，领导起义，抗拒封建官府抢粮的斗争业绩，永远为中国人民所怀念。

就在方腊被俘之时，宋徽宗立即恢复了苏杭应奉局与花石纲的征敛，朱勔也官复原职，并采取了极为毒辣的手段对起义军和无辜群众进行了血腥的反攻倒算。

大约于一一一九年，在北方的山东爆发了梁山泊（山东梁山附近）农民起义。梁山泊，在宋代属东平府（鄆州）管辖，处于汶、济二水的汇合处。梁山泊，泊面广阔，方圆数百里，其间芦苇丛生港汊交错，地势非常险要。历来就是起义的好地方。北宋王朝设立的“西域括田所”，搜括与抢掠土地的灾难也波及到山东，下令把梁山泊全部收归“国有”，强迫以打鱼、捉虾、采莲藕为生的劳动者缴纳沉重的租税，并强制农民佃纳租，稍有违抗就上枷上锁被捉进监狱，逼得农民和渔夫“无所衣食”。派到那里的地方官都是敲诈勒索的“酷吏”，官逼民反，于是山东境内梁山泊的农民大起义爆发了。这支起义军沉重地打击了以宋徽宗为首的封建统治势力。到这一年的年末，起义军活跃在山东境内的青州、齐州、单州、濮州之间。他们的人数虽不很多，可是勇不可挡，战斗力很强。北宋王朝派了许多军队前去镇压，不是被打败，就是不敢同他们交锋。这支起义军，一直坚持到一一二一年或一一二二年，才暂告结束。

四

十二世纪初，我国东北黑龙江流域的女真族逐渐强大起来，在一一一五年建立了金政权，并和北宋联合攻辽。一一二五年辽战败，金统治者又对北宋展开

了攻势。一一二六年金军攻陷开封，结束了北宋的统治。一一二七年宋高宗赵构从商丘跑到了临安(杭州)，建立了南宋政权。

公元一一二九年金军渡过长江，烧杀掠夺，吓得南宋小朝廷跑到海上去躲避。南宋统治者对金军的掠夺，一味的屈辱忍让，不敢抵抗，执行投降路线，而江南广大人民群众却奋起抵抗，坚持抗战路线，迫使金军不得不在一一三〇年撤军，南宋朝廷才又从海上回来。这时南宋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日甚一日。它们编造种种名目向劳动人民榨取重税。有什么麴引钱、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帖钱、保正牌限钱，甚至打官司打输了要缴罚钱，胜了还要纳欢喜钱等等名目不一而足。制造兵器所用的翎毛、箭干、皮革、铁条和针叶以及竹木物料等等，都让各地农民按户按亩交纳，逼得农民走投无路。被金兵打败的南宋军队又到处流窜，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在阶级压迫与金军掠夺的摧残下，福州、吉州、赣州与鼎州等地，都先后爆发了反抗压迫的斗争，其中规模较大的是钟相、杨么领导的农民大起义。

早在北宋末年，鼎州(湖南常德)的农民，在钟相领导下，组织了一个会社，平时积资累钱，需时互助共济，成为团结群众的组织。钟相还提出了“等贵贱，

均贫富”的政治主张，号召大家起来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许多地方人民都纷纷参加了这个组织。于是在一一三〇年二月十七日爆发了以钟相为首的农民起义，迅速建立了革命政权，国号楚，年号天载。

洞庭湖中，湖州交错，港口复杂，历来就有重湖之称，起义军以此为根据地，进行反封建斗争。他们到处“焚官府”、“杀官吏、儒生、僧道”，指斥封建的“国法为邪法”，向地主富豪“劫财为均平”。同时，还宣布：凡是参加起义军的，一律免除赋税科差，对于“执耒之夫”和“渔樵之人”等劳动者，一律不许伤害。这些革命措施，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起义不久，洞庭湖周围十几个县全被义军所控制。这时鼎州的土豪劣绅和地主们急忙勾结孔彦舟这股匪军进驻鼎州，以便消灭义军。孔彦舟是个投降过金的叛将，极其凶狠毒辣。他使用各种阴谋诡计，派遣大批匪徒混进革命内部，又假惺惺地宣扬要把军队撤走，企图使起义军放松防御。三月廿六日夜间突然攻入钟相兵营，敌人里应外合，使起义军遭到很大损失，钟相与钟子昂被俘壮烈牺牲，革命受到了挫折。

钟相牺牲后，他的部下杨么率领起义群众，继续和敌人展开战斗。他们以龙阳(湖南汉寿)为根据地，在洞庭湖周围的各村设立许多水寨和陆寨，制造了许

多“车船”，在船上装置踏轮，靠踏轮推动船身前进，速度相当快。采用了“陆攻则入湖，水攻则登岸”的两栖战术，以防守和打击敌人。他们一边战斗，一边生产，在这一地区继续实现他们“等贵贱、均贫富”的主张。后来起义军赶走了孔彦舟，南宋王朝又派老官僚程昌寓带兵到鼎州，这些士兵看到“村家有猪羊鸡鸭之类”就大肆抢劫，起义军趁机进攻，除程昌寓只身逃走外，其余所有南宋官兵全成了起义军的俘虏。

起义军还坚决抗击了金掠夺者扶植起来的刘豫政权。一一三四年刘豫派人引诱义军攻宋，说攻占宋地以后，得州的做州官，得县的做县官，起义军就把派来的人扔在水里淹死，表现了起义军大义凛然的革命气节。

一一三三年到一一三四年，刽子手王瓌多次率兵攻打起义军，最后被起义军打得几乎全军覆没。南宋王朝慌忙把在北边和金军作战的岳飞调回，代替王瓌镇压起义军。在一一三五年六月，这支起义军终于被岳飞所镇压。

这一次起义虽然失败了，可是阶级斗争仍然激烈地进行着。在南宋统治的一百五十二年中，先后爆发了二百多次的农民反抗地主的武装斗争。

五

两宋时期的农民大起义，虽然因时代和阶级的局

限失败了，但农民英雄坚持革命斗争的可歌可泣的业绩却是不能抹煞的。

两宋时期的农民起义是反封建、反掠夺的武装革命，斗争矛头始终指向两宋王朝的封建统治和辽、夏、金的掠夺，沉重地打击了宋、辽、金的反动统治，打乱了反动统治秩序，削弱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

这个时期的农民大起义，在反封建的斗争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平等的农民革命思想。列宁指出：“农民小资产者的平等思想是正当的和进步的，因为它反映了反对封建农奴制的不平等现象的斗争”。王小波、李顺起义时提出“均贫富”，方腊起义时，提出“法平等，无有高下”，钟相、杨么起义时提出“等贵贱，均贫富”，这些革命的口号，都是唐末黄巢大起义时提出的“均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起义军内部又初步实现了政治上平等，经济上平均，这就使农民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日趋完整，从而更有力地团结广大农民群众猛烈地冲击封建势力，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两宋时期的农民革命，对孔老二的思想——反动理学的斗争，空前激烈。反动理学家认为地主剥削农民，就是“天理”，“犯上作乱”就是违背“天理”，但是革命人民认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是“安有此理”，对于“乱常”、造反，则认为是“天理当然”，同孔孟思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特别是金代红袄军的起义，

他们曾攻占曲阜，烧毁了孔庙，使“殿堂庑廊灰尽什伍”，表现出革命农民对孔老二罪恶的无比愤怒。宋代农民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要革命必须进行反孔斗争。

此外，起义军适应战争的需要，发挥了农民群众的智慧，创造了装有踏轮的轻便快船，对航海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宋代三次较大的农民起义，都坚持革命路线，同起义军内外敌人的投降“招安”路线进行坚决斗争。以封建皇帝为首的宋朝统治集团，对农民起义，主要采取残酷的武装镇压手段，同时还辅之以阴险的政治欺骗(包括招安)，这是地主阶级最毒辣的一手。宋王朝对王小波、李顺起义军，宣扬“能归顺者，释其罪”，并提出“化贼为民”的反动口号。对方腊起义军，也提出“能自首者，免罪给赏”，并“诱之以官”。对钟相、杨么起义，更提出杨么等“如率众出首，当议与湖南、北路差遣”的官爵，并以“黄榜放罪”等欺骗手段，妄图瓦解农民革命武装。但是，广大起义群众，对“招安”的骗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宋王朝“招安之人屢遣，而大半不还”，并坚决以革命的武装同反动派战斗到底，象王小波、李顺、方腊、钟相、杨么等起义领袖，都是率领革命战士拒不投降，坚决革命到底的农民英雄。由于起义军内部混进了伪装革命的地主分子，以及起义军内部被腐蚀的蜕化变节分子等一小撮反动

势力，同宋王朝的“招安”相配合，在起义军中推行投降路线，因此，革命农民，必然要同他们展开激烈地反投降斗争。在钟相、杨么起义军中，投降和反投降的两条路线斗争，表现的尤为激烈。起义军中水寨头领之一杨华，接受“招安”，变节投敌，并派亲信到水寨，“遍谕杨么等诸首领，各请出来受犒”，领取出卖革命的赏钱，公开推行“招安”路线。但杨么等诸首领，拒而不听，还“极口大骂杨华不是丈夫汉”，并下令战士频击战鼓，率领无数只战船，向敌军进攻，并“声言要杨华归寨”。杨么等英勇的反投降斗争，使敌人惊恐万状，慌忙把杨华押走，从而击败了这次内外敌人搞的“招安”投降阴谋。以杨么等为首的广大革命战士，坚持革命路线，反对投降路线的革命气概，为后代农民革命树立了光辉榜样。

毛主席指出：“历史上所谓‘海盗’和‘水寇’，曾演过无数的武剧，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梁山泊起义军依靠烟波无际的水泊，“横行河朔，使官军数万，无敢抗者”，钟相、杨么起义军依靠湖州交错的洞庭湖，进行兵农相兼，水陆两栖的战法，使宋朝统治者闻风丧胆。他们的斗争，丰富了农民革命战争的经验。

元末红巾大起义

在元朝(公元一二七一年——公元一三六八年)末年，爆发了红巾大起义，它是元代阶级矛盾的总爆发，给地主阶级以极为沉重的打击。

毛主席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以蒙古贵族为主的地主阶级建立起来的元朝，是极其黑暗的封建王朝。蒙古贵族为维护它的统治，在统一中国后，即开始全面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反动政策。当时蒙古统治者把全国各族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我国西部各少数民族，以及从东欧来到中国的人）；第三等是汉人（包括女真、契丹、高丽等族人和原来在金统治下的汉族人）；第四等是南人（包括南宋灭亡后，南方的汉族和我国西南各族人）。对于这四等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政治上的待遇和经济上的负担都作了不同的规定，例如：法律上规定，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蒙古人打死汉人，只是流放到北边去充军。蒙古统治者，同一切反动统治阶级一样，妄想制造民

族矛盾和民族隔阂，来维持其反动统治。

这种民族压迫的反动政策，说到底，仍是阶级压迫。被列入所谓三、四等的汉人和南人，他们中间的劳动人民遭受到阶级的和民族的双重压迫和剥削，而他们中间的少数地主阶级和文武官吏，却受到蒙古统治者的重用，有的汉族地主，在蒙古贵族的庇护下，“广占良田，驱使佃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而被列入所谓一、二等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他们中间的上层分子，是元朝统治阶级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享受种种封建特权，而他们中间的广大人民，却同样遭到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有许多蒙古人民，在剥削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沦为奴隶，甚至有的被贩运到海外。到元朝中期，已有大批的蒙古族贫民流落到大都（北京）、通州（河北省通州）各地，有的还被卖到汉官之家作奴婢。从这些事实中，可以透过元代民族压迫的外表，看到它阶级压迫的实质。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农民和地主两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以蒙古贵族、汉族地主和各族上层分子所构成的封建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劳动人民。

元代的国家赋税是非常沉重的，人民要向封建国家缴纳户税、丁税、地税，此外如盐、茶、酒、醋、金、银、铜、铁、竹、木以及山泽、湖泊、乳牛、鱼苗等等，无不有税。这一切名目繁多的赋税，都强加

在劳动人民的头上。

元朝的地主阶级，尤其是蒙古贵族，不断地进行土地掠夺，使土地占有高度集中。地主阶级从农民手中夺去了大量的土地，迫使自耕农纷纷破产，不断地沦为佃户，而地主又以苛刻的条件，把夺去的土地租给大批失掉土地的农民耕种。当时，农民要向地主缴纳五成、六成以至八成的高额地租。同时，地主还通过各种方式对农民进行残酷的掠夺和野蛮的榨取。沉重的地租，迫使广大佃户继续破产，当时有人说，这些大地主是“吃人的肚皮”。元朝的这些吃人的大肚皮们，“有万贯家财，鸦飞不过的田产”，他们是“旱路上有田，水路上有船，人头上有钱”，而广大的贫苦农民，则是“又无房舍，又无田，每日烧地眠……衣不遮体，食不充口”。地主阶级对广大佃户还进行人身奴役，地主对佃户可以随田典卖，甚至有的地主犯罪时，竟强迫佃户去顶罪替死。广大的贫苦农民，已经被逼到无法继续维持生活的困境。

元代的蒙古贵族、色目大商人和大地主等剥削者，在元朝政府的支持下，大放高利贷，向人民进行重利盘剥，其中最残酷的借贷形式叫做“羊羔儿息”或叫“斡脱”钱，贫民借富家的钱，到本利相当时，富家将本钱收回去，再将利钱作本钱，反复地进行盘剥。广大的贫苦农民，一旦陷入高利贷的魔掌之中，就是倾

家荡产，也无法还清这笔阎王债。高利贷者，将还不起债的贫苦农民的子女、儿媳拖将去，面皮上刺着印子，作奴婢。他们为了追索利息，甚至毆人致死。残酷的高利贷剥削，迫使无数的贫苦农民家破人亡。还有很多的贫苦农民，被迫沦为奴隶，当时被叫做“驱户”或“驱丁”。他们是主人的私产，可以任意买卖，在当时的大都、上都(内蒙多伦西北)等城市，都有公开标价出售奴隶的市场，同牛市、羊市、马市并称为“人市”。封建地主，为了防止奴隶逃跑，强迫奴隶们饮哑药，或者把他们的脚用火烙成印子，像牲畜一样驱使他们。广大奴隶们是元代社会中的最底层。

元朝末年，皇帝、贵族腐化成风，用各种手段掠夺民脂民膏。朝廷不但出卖官爵，“高下有定价”，而且还滥发纸币，加重税收。各级官吏更是用尽心机，搜括钱财。如下属拜见要“拜见钱”，无事白要叫“撒花钱”，逢节要“节钱”，过生日要“生日钱”，迎送要“人钱钱”，发拘票要“賚发钱”，打官司要“公事钱”等等。有时朝廷派钦差大臣到各地以检查吏治为名，装点门面，其实这些奉使钦差同地方官相互勾结，大发横财，给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痛苦。当时有一首民谣说：“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元朝的吏治腐败已极，各级官吏对广大人民的掠夺，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

度了。

总之，封建地主阶级对各族人民进行残暴的剥削和压迫，使元代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再加上灾荒连年，广大人民的生活处于极度贫困的悲惨境地。劳动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因此，他们不断地起来进行反抗斗争，农民起义贯穿着元代整个统治时期，农民革命的火炬照亮了元代社会前进的道路。

二

毛主席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革命的人民，对元朝统治者，满怀着无比强烈的阶级仇恨，他们往往利用民谣的形式配合武装斗争，大造革命舆论，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当时的民谣有：“天雨线，起民怨，中原地，事必变”和“……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还有“塔儿白，北人（指统治阶级）是主南是客，塔儿红，南人（指各族人民）来作主人公”等等。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迫切要求推翻元王朝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强烈愿望，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

“堂堂大元，奸僂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

何曾见！……。”这首醉太平小令，在元末流传全国各地，它揭露了元朝政府的腐朽和反动，同时也指出了红巾大起义的直接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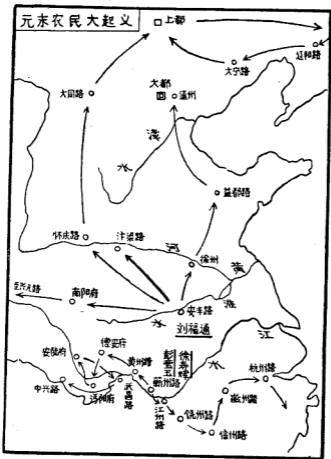
一三五一年(至正十一年)四月，由于历年来黄河屡次决口，造成严重的水灾，元朝统治者为了增加赋税收入，强征十五万农民出工，在山东曹县，开河二百八十里，准备把黄河勒回故道。元朝政府，派遣重兵监督民工劳动，被强征来的广大贫苦农民，在残暴官吏的鞭笞之下，担负着繁重的劳役，就连政府发给他们很少一点伙食费，也是“官吏多不尽给”，被贪官污吏掠夺了去，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因此，使“河夫多怨”。既然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在这里产生，那么强烈地反抗和斗争也就必然在这里出现。农民领袖韩山童，长期利用白莲教作掩护，发展教徒，宣传造反思想，蓄积革命力量。这时他抓住了这个有利的时机，积极地大造革命舆论，组织起义队伍，他派人到处宣传早已流传于河南一带的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并在暗地里凿了一个石人，只开其一眼，又在石人背后刻上：“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字样，埋在黄陵岗工地。不久，民工们挖出了这个独眼的石人，“遂相为惊诧，而谋乱。”黄陵岗事件，象革命巨雷的导火线，在全国引发了农民大起义。

韩山童和刘福通，见到起义时机已经成熟，遂聚



红巾军乘胜前进

元末农民大起义



众三千人，在河北永年县(今名)白鹿庄准备起义，他们规定，以头裹红巾为号，后来称为“红巾军”，大家公推韩山童为“明王”。但是由于事机泄露，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韩山童被捕牺牲，刘福通突围逃出，继承韩山童的遗志，继续组织红巾军。革命人民喊出了“天遣魔军(指农民起义军)杀不平”，“杀尽不平方太平”的响亮口号，各地人民纷纷参加起义，“贫者从乱如归”，同敌人展开了浴血奋战。他们攻克了颍州(安徽阜阳)、罗山(河南今县)、上蔡(河南今县)、汝宁(河南临汝)等许多地方，在攻下朱皋镇(河南固始县附近)后，把地主的粮仓打开，分给穷苦人。义军人数很快发展到数十万，声势十分浩大，史书上说，半个中国都照耀着红光。同时，全国各地农民也都纷纷起义，分别组成了无数支大大小小的起义队伍，“天下反”的形势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到处都敲响了元朝统治者的丧钟。

三

毛主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红巾大起义，使元朝统治者更加惊慌失措，在一三五一年，调来了“精锐善战”的回回阿速军六千名，进攻颍上(安徽颍上)红巾军。当阿速军头目，刚一见到严阵以待的红巾军的强大阵容时，就慌慌张张地夺路而逃，嘴

里还不断地大喊：“阿卜！阿卜！”（走的意思）元军丢盔弃甲，狼狈逃跑。元政府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又派巩卜班率军数万，屯驻在汝宁（河南汝南）沙河岸边，准备进攻红巾军，红巾军乘敌不备，黑夜偷袭其大营，巩卜班被击毙，元军大溃。元政府再派也先不花为总兵，率“精兵”三十万进驻沙河，当威武的红巾军出现在阵前时，又吓得元军丧魂落魄，还没等交战，元军头目也先便打马先逃，守汝宁的地方官挡住他的马头，哀求他不要逃跑。也先拔出佩刀就要砍这个官吏，并气极败坏地说：“我的不是性命！”遂带头往后逃跑，结果三十万大军全部溃散。红巾军缴获的军用物资，堆积如山。

历史证明，反动统治阶级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农民革命的滚滚巨流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它以急风暴雨之势，冲击着元朝地主阶级的腐朽统治。在北方，刘福通领导的起义军，在战斗中不断地成长壮大，他们提出了“贫极江南，富夸塞北”“摧富益贫”的政治口号。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元朝反动统治，改变这种贫富不均的现实。这一口号，不但指出比较明确的斗争方向，而且有力地批判了孔老二宣扬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反动的天命论，对起义军的发展和壮大，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了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这支义军于一三五五年（至元十五年），在亳州（安徽亳

县)，建立了农民政权，公推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为“小明王”，称国号为“大宋”，建元“龙凤”。这时候，中原各地的红巾军，都在“大宋”的旗帜下，进行革命斗争，元末农民起义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一三五七年（龙凤三年），刘福通分三路大军进行北伐。中路军由关先生、破头潘等率领，向河北、陕西一带进攻，其中一支起义军，越过太行山，先后攻占了大同等地，并进而攻克了元朝上都，烧毁了蒙古贵族的宫殿。不久，又攻下东北重镇辽阳，并转战辽东各地。东路军由毛贵率领，先后攻占河南东北部与山东大部分地区，并攻克济南，然后又北进至蓟州（河北蓟县）各地，离元朝统治心脏——大都（北京）不过百里，元顺帝匆忙地安排后事，准备逃跑。西路军由白不信、李喜喜等率领，直趋关中（陕西省），攻下兴元（陕西汉中），进入凤翔（陕西凤翔），并转战四川、甘肃、宁夏等地。此外，刘福通亲率大军转战黄河南北，也取得了许多胜利。在一三五八年（龙凤四年），攻克了汴梁（河南开封），并把汴梁定为国都。

红巾军以强大的革命武装力量，攻占了无数州县，迫使元朝守土官吏，望风而逃，红巾军的势力有了极大的发展，当时“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都有起义军的势力，腐朽的元朝统治者，已陷入农民革命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面临总崩溃的前

夕。在北方红巾军中，以毛贵为首的一支队伍最为出色。他们在莱州(山东掖县)，建立了三百六十处屯田，每屯相距三十里，叫兵民耕种。并造“挽运大车百辆，凡官、民田十取其二”，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红巾军的这些革命措施，不但对红巾军的巩固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山东一带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这是我国农民战争史上又一个伟大的创举。

在南方以彭莹玉、徐寿辉为首的红巾军，是红巾军中比较强大的一支，在一三五一年(元至正十一年)八月，这支义军攻克了蕲州(湖北寿春南)，声威大震，革命力量得到迅速发展。这时，彭莹玉等公推布贩徐寿辉为首领，以铁匠邹普胜和渔夫倪文俊为左、右丞相，以彭莹玉为军师，组成了农民起义军的领导核心，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定国号“天完”，建元“始平”。这支义军，在农民政权的统一指挥下，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他们在不断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分兵两路，向敌人进行主动进攻。一路由邹普胜率领，攻取汉阳、武昌(都是湖北现在地名)等地；另一路由彭莹玉率领，攻取江州(江西九江)、饶州(江西鄱阳)、信州(江西上饶)、袁州(江西宜春)各地。这支红巾军所控制的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南部，以及浙江西北部的广大地区，红巾军所向无敌，地主阶级

的统治政权，被打得七零八落，当时有民谣说：

“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
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

这首民谣，反映了头裹红巾的起义军，象烈火一样，把地主官吏烧得焦头烂额，并全部赶跑，从而夺取了地方政权。义军的纪律严明，“不杀不淫”，只是将统治阶级的“府库金帛”运走，以充军资。起义军得到了广大群众热烈拥护，队伍很快就增加到一百万，他们在南方猛冲猛打，使元朝政府赋税收入的重要地区，受到严重威胁。义军切断了南粮北运的运输线，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给元朝统治者以致命的打击。

四

元末红巾大起义，虽然给封建统治者以强有力的打击，但是，由于当时没有先进的无产阶级领导，最后还是失败了。刘福通领导的北方红巾军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但由于南北两支红巾军各自为战，加之北伐军孤军深入缺乏统一指挥，结果被蒙汉地主武装各个击破。

元朝统治者，为维持其反动统治，不断加强反革命武装力量，大肆收买各地的“义士”、“义兵”等反动土豪和地主武装。同时，还用“招安”的政治欺骗，瓦解起义军。当时，在江苏一带有一支非红巾军系统的

起义队伍，由盐贩子张士诚领导，它们“行劫于江湖”，“负固于海岛”，元朝政府，曾多次以“赦其罪”，赐“万户告身”、“御酒龙衣”等手段，进行“招安”。张士诚在元朝政府收买下，执行投降路线，接受元朝政府“太尉”的封爵，并受元朝政府的调遣，派兵同官军夹击北方红巾军。北方红巾军在一三六三年（龙凤九年），被张士诚的反革命武装攻下了最后一个革命据点——安丰（安徽寿县），刘福通等农民领袖壮烈牺牲。后来，张士诚的反动武装，被朱元璋的队伍击败，张士诚被俘，朱元璋下令，将张士诚乱棍打死（一说，令其上吊自杀）。这个可耻的叛徒，得到应有的下场。

这支在北方奋战十三年之久的红巾军虽然失败了，但从根本上动摇了元朝的统治，为南方红巾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最后推翻元朝政权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一三五二年的时候，濠州（安徽凤阳东）的郭子兴率众起义，属于刘福通红巾军系统。就在这一年，一个出身贫苦，被迫当了和尚的朱元璋，投奔到郭子兴的部队里。郭子兴死后，朱元璋成了统辖郭子兴旧部的大将。正当南北两大红巾军主力，同元朝统治者展开英勇奋战的时候，朱元璋在一三五六年，率军渡江攻占集庆（南京），采纳了徽州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在集庆加强防守，巩固后方；

发展生产，多储备粮食；缩小目标，积极的充实力量。朱元璋采用屯田的办法，进行且耕且战，解决军粮不足的问题。同时还派专人督责兴修水利，注意发展生产。另外，又设“管领民兵万户府”机构。抽调民间壮丁，编为“民兵”，作为维持地方治安的力量。这样，不到几年的时间，就控制了皖南、浙东等地区，成为一支拥有实力的红巾大军。当时有许多地主阶级野心家，见元朝大势已去，就纷纷地“改换门庭”，投靠朱元璋。妄图利用起义军作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挂着“文人学士”招牌的地主分子李善长、宋濂之流，混进了朱元璋的领导机构里，竭力为朱元璋出谋划策，推行复辟封建政权的路线。拥有相当权势的朱元璋终于在地主阶级的腐蚀下滋长了个人野心，放弃了农民革命路线，对他们是言听计从。后来朱元璋公开谩骂起义军“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并派人谋杀了红巾军领袖韩林儿。朱元璋终于在政治上、组织上彻底背叛了农民起义，变成了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此后，朱元璋在南北红巾军给元朝统治者以致命打击的基础上，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又一个封建王朝——明朝。

五

元末红巾大起义，是元代社会阶级矛盾的总爆发，是对元代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总清算。红巾大起义最

后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推动中国历史向前发展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首先，沉重地打击了元朝的封建统治势力。起义军所到之处，各地的地主政权纷纷倒坍，蒙古贵族、汉族地主成批地被镇压和大量的逃散。因而在明朝初期出现了“往年大姓家，存者无八九”的现象。这次农民战争，给地主土地占有制以沉重打击。在农民战争期间和以后，出现了大量的无主荒田，其中有元朝统治者的“官田”，蒙古贵族的“庄田”，“废寺田”，“畏吾儿田”以及逃亡地主的土地等等。其中一部分土地被广大农民所占有。因此，明朝初年自耕农有所增加，同时也改变了土地高度集中的现象。

其次，在红巾大起义中，有许多奴隶乘机挣脱了枷锁，获得了解放，“王公甘久辱，奴仆尽同升”，正是广大奴隶获得自由的写照。此后，所谓“驱户”、“驱丁”等奴隶名称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了。同时，这次起义，也给蒙古贵族制造的反动的民族压迫政策，以毁灭性的打击。我国各族人民，通过自己的斗争，把反动的“四等人”政策，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加强了联系，增强了团结，共同推进了祖国社会历史的发展。

再次，红巾大起义经过十几年的英勇奋战，革命足迹踏遍了黄河、淮河、长江、珠江以及辽河等流域。

它们在斗争中，继承了我们农民革命的光荣传统，创建了许多宝贵经验，象毛贵起义军在山东创立的“屯田”制度，朱元璋起义军在南京采用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措施，以及创建的“民兵”制度等等，都给后代革命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重要的启示。

总之，红巾大起义，改造了封建统治，打破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严重束缚，横扫了维护那种腐朽的生产关系的儒家思想，有力的推动了明代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革命战争

明朝（公元一三六八年——公元一六四四年）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战争，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是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次革命战争，它不但沉重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而且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

在元末红巾大起义的推动下，明朝前期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由于地主阶级不断的加重剥削和压迫，在明朝初期，农民起义就连绵不断，到明朝中叶，又爆发了叶宗留、邓茂七领导的矿工和佃农起义，刘通、李原领导的荆襄流民大起义，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等等。在这些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明代社会经济又多少的向前发展了一步。尤其是刘六和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不但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而且直接地打击了孔老二的反动思想。有一支起义军攻占曲阜，驻军孔庙，砸碎了地主阶级的尊孔祭器，将孔庙中所藏的“四书”“五经”扔到水池里，表现

了革命农民对孔老二及其反动思想的极大愤怒和蔑视。地主阶级的剥削本性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到了明朝末年，地主阶级的统治更加残暴和腐朽，使社会阶级矛盾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

明朝末年，地主阶级疯狂地掠夺土地，使土地占有空前集中。例如，在湖南桂阳县，有一户地主所占的土地，“数十里田舍相望”，甚至在河南出现了占田“至十余万亩”的大地主。特别是明朝藩王占田的情况最为严重。明神宗赐给他儿子福王的土地，以“河南、山东、湖广为王庄至四万顷”，由于它侵犯了其他大地主的利益，因此才由“群臣力争乃减其半”。明熹宗赐给惠、桂二王的土地，由于各州县已经无田可拨，于是勒令各地农民分摊银租，叫做“无地之租”，这是历史上罕见的现象。正由于这种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地鲜立锥”的严重现象。

明朝末年，封建国家的田赋、徭役和各种加派的捐税，更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一六一八年（万历四十六年），明王朝借口辽东战争紧急（同我国东北满洲贵族之间的战争），向人民加派“辽饷”，前后三次共征银五百二十万两，相当于政府全年收入的总赋税三分之一以上。到天启统治时期（一六二一年到一六二七年），田赋加派还感不足，又增加关税、盐课和各种杂税，而所有这些负担都强加在贫苦农民的身上。就

是倾家荡产，割肉剔骨，也应付不了这无穷尽的“皇粮国税”。同时，封建徭役逐年增加，强征丁银，滥派差役，使老百姓把徭役看作是“猛虎毒蛇”。那时候，豪绅地主是“产无赋，身无徭，田无粮”，而广大的贫苦农民则是“留者输去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因此，广大农民继续失掉土地，不断地沦为地主的佃户、雇工和奴仆，甚至沦为饥饿的流民。地主对广大佃农的剥削极为残酷。明末江南地区的每亩收成，少者一石，至多也不过三石，而私租却重达一石二、三斗，在苏州重达一石八斗，个别地区还有重达两石多的。地主还用小斗借出，大斗量入的办法对佃农进行盘剥。此外，广大佃农还要向地主送鸡、鸭、猪、羊之类，农民女儿出嫁也要先送给田主银子。地主还强迫广大佃户负担各种杂役，甚至有的“私设公堂”、“吊拷租户”、“驾帖捕民”、“格杀庄佃”等等，无所不为。至于沦为长工和奴仆的农民，根本没有人身自由。明朝法律规定，主人打死长工不偿命。奴僕的生活更为悲惨，他们一经立契为奴，就世代永远为奴，当时叫做“伴当”和“世僕”。广大人民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下，过着糟糠难继的苦难生活。而地主阶级却把广大人民创造的财富窃为己有，挥霍无度，过着极端腐朽的生活。以神宗皇帝为例，每年宫女的胭脂用费，达白银四十万两，甚至宫中每年喂猫的用肉，也达到七

百二十多斤，神宗本人，吸毒中疯，荒淫无耻。特别是宦官垄断朝政，飞扬跋扈。在熹宗统治时期，宦官魏忠贤，被称为九千五百岁，他的狗腿子遍布全国各地，他手下的重要爪牙，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干儿子）、“四十孙”（干孙子），他们为非作歹，横行乡里，使社会矛盾不断地激化起来。

二

毛主席指出：“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陕西地区，是明朝统治最残暴的地方，陕北尤为严重。明朝末期，灾荒连年，从万历到崇祯（一五七三年到一六四四年）的七十一年间，只是水、旱、饥、疫四灾，就占去六十八年之多。史书记载陕北的贫苦农民，在秋收的时候一无所得，九月里，采蓬草充饥，十月间，剥树皮为食，到了冬天，只好吃山中的白石粉延续生命。由于石性腥冷，吃过几天便肚子肿胀下堕而死。这时候，官府和地主，还是照样的催租逼税，“急如星火”。广大贫苦农民，被逼得已经无法再生活下去了，因此，他们不得不纷纷而起，砸碎套在他们身上的沉重桎梏，走上光荣的武装起义道路。

一六二七年（天启七年），陕西澄城知县张斗跃，在这饥荒的年月里，仍然是残暴地鞭打人民，严催赋税。

这时，正是青黄不接的二、三月间，农民王二组织了几百个贫苦农民，用墨涂面，闯入县衙门，将正在“坐堂比粮”的张斗跃杀死，举起了造反的大旗，揭开了明末农民革命战争的帷幕。第二年，安塞县的高迎祥等率众响应，不久，李自成也参加了高迎祥的起义队伍。此后，陕北各地农民纷纷起义，革命的春雷划破黑暗的长空，以不可阻挡之势，震撼着摇摇欲坠的明朝统治政权。

李自成，生于一六〇六年（万历三十四年），是陕西米脂县怀远堡李继迁寨人。这里是一个偏僻的地区，本来，到处都是漫无边际的野草荒原，春冬两季，经常有怒吼的狂风，漫天的飞雪，再加上地主阶级的残暴掠夺，更是人烟稀少，满目荒凉。自成幼年（乳名叫碾生子），曾为地主放羊、牧马，经常被黑心的老财打骂，甚至“鞭之见血”。父母死后生活更加困难，又被迫给地主当佃户，由于地主残酷的榨取劳动力，自成常在田地里“枕耒而卧”。后来又当过铁匠的徒弟、卖酒的佣人等等。最后被迫到银川当驿卒，靠传送公文、运输货物维持生活。由于他欠下艾姓地主的债，这个号称“老举人”的地主勾结官吏，把自成上了枷锁游街，然后又晒在烈日之下，断绝他的饮食，又派狗腿子从旁监视，逼他还债。自成造反精神很强，他面对着敌人巍然屹立在烈日之下，坚强不屈。当时，众驿

卒替他求情，又遭到狗腿子们的打骂，群众愤怒已极，砸碎了自成身上的枷锁，同自成一起逃去。满怀着深仇大恨的李自成，逃到甘肃当了兵。可是广大士兵的生活也非常难熬，官府和长官经常扣押、积欠他们仅够维持生活的兵饷，士兵们被逼得不得不典当盔甲、器械，甚至卖妻卖子。西北的秋天，寒风刺骨，当长官们点名的时候，士兵们有“单衣者”、“无裤者”、“无鞋者”，李自成就在这样的牢狱式的兵营里，继续过着“衣不蔽体”，“日不再食”的日子。在一六二九年（崇祯二年），李自成所在的部队，被调往北京，沿途上广大士兵受尽了残暴军官的打骂，激起了李自成及其伙伴们的无比愤怒，他们乘机杀死了反动的军官，举行起义，打回了陕北，不久就参加了高迎祥的队伍，走上了光荣的革命道路。

明朝统治者，在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十分惊慌，于是不断地加强反革命围剿的力量。一六三五年（崇祯八年）正月，明朝政府派洪承畴出陕西，朱大典出山东，率官军从两面夹击起义军。为了打破这种反革命的围攻，在一六三五年正月，拥有十几万起义军的各路十三家七十二营的著名首领，大会于河南荥阳，共同商讨对敌作战方案。在会上，马守应主张北渡黄河，入山西境，张献忠当面批评他是害怕敌人，一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这时，李自成坚持革命路线，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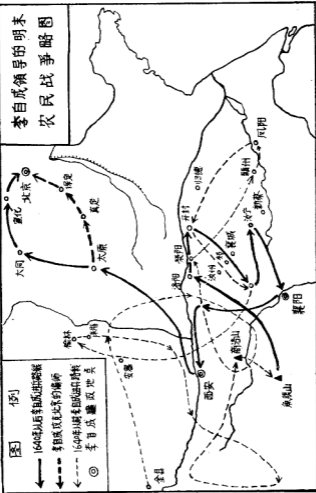
排众议，他说：“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鼓励大家坚持胜利信心。并提出了联合作战，分兵出击的作战方案，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会议决定：起义军共分五路打击敌人，北路、西路、南路以防御为主；东路主动进攻；另一路往来策应。荜阳大会，是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这次会议决定，把分散的起义军联合起来，进入共同对敌作战的新阶段，它是明末起义军在八年多浴血战斗中的经验总结，是中国农民革命战争史上一次伟大的创举。

荜阳大会以后，东路大军在高迎祥、李自成等率领下，向官军展开了猛烈的进攻，进展异常迅速，从河南入安徽，并攻克了朱元璋的故乡中都凤阳（安徽凤阳），焚毁了明朝皇帝的祖坟，粉碎了朱明王朝进行神权统治的反动堡垒。表现出起义的农民，对封建统治的血海深仇和推翻明朝反动统治的强烈要求。一六三六年（崇祯九年），高迎祥率部进兵关中，在准备袭取西安的途中，遭到敌军孙传庭部的伏击，高迎祥不幸牺牲。起义群众公推李自成为“闯王”，率领他们继续作战。但因这一次战斗损失较大，使义军在军事上处于被动地位。一六三七年（崇祯十年），李自成起义军又误中敌人埋伏，队伍被打散，李自成、刘宗敏等十几个人被迫逃伏于商（陕西商县）、雒（陕西雒南县）



李自成大军进入北京，受到群众夹道欢迎

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战争略图



丛山之中。商洛山区，位于秦岭山脉的东侧，山深林密，回旋余地很大，是一个休整队伍的好地方。李自成在山居期间，同战友们，白天在丛山之中，练习射猎、击剑，苦练杀敌本领，晚间在茅草屋里读书、思考，总结古今农民革命的经验教训。他还不断劝说周围战友，要加强革命信心。艰苦的生活更加坚定了李自成领导群众，推翻明朝反动统治的雄心壮志。后来，有人形容李自成在山居期间生活：

“收拾残破费经营，
暂驻商洛苦练兵。
月夜贪看击剑晚，
星辰风送马蹄轻。
……”

这首诗，表述了李自成受挫后的沉重心情和百折不回、革命到底的一段艰苦生活。

李自成在一六三九年（崇祯十二年），率众出山，曾痛骂敌人的招安使者，撕毁“招安”文书，坚持革命路线，英勇战斗。但是，由于力量单薄，在一六四〇年（崇祯十三年），再次被困于巴西鱼腹诸山中。后来，具有顽强斗志的李自成，只率五十骑人马突围，闯入河南。

三

河南地区的阶级矛盾始终是很尖锐的。河南的大

地主中有“八王”和“四凶”的绰号。他们霸占土地，压榨人民，无恶不作。因此，在河南的广大地区中，到处可以见到“有采菜根、木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父弃其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除了这些，只有“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已经断绝了河南广大劳动人民的衣食之源，因此，他们纷纷起来造反。这种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给李自成起义军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李自成等进入河南后，广大贫苦农民纷纷起来响应，使这支队伍迅速扩大，明末农民革命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高潮时期。这时候，杞县（河南今县）举人李岩，率领一部分起义群众，参加了李自成的部队，接着又有举人牛金星、卜者宋献策等人前来参加。起义军根据革命飞快发展的形势，和继续扩大革命力量的需要，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以及“不当差不纳粮”、“平买平卖”等政策。所有这些革命的口号和政策，都是针对明末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横征暴敛的罪恶行径提出来的，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因此它有力地促进了明末农民革命战争，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

李自成起义军，在进军的过程中，到处宣传农民

军所制定的革命口号和政策，严格要求起义军遵守纪律，竭力保护人民。李自成提出，对广大人民，“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女如淫我母”并下令“各营有擅杀良民者，全队皆斩”，“马腾入田苗者斩”等等，而对地主阶级却进行坚决镇压。在一六四一年（崇祯十四年），起义军攻克洛阳时，抓到了罪大恶极的福王朱常洵。李自成向群众宣布：王侯贵人，剥削穷苦老百姓，使其挨饿受冻，因此，我代表大家处决这个坏蛋。镇压了朱常洵并把福王及大地主的存粮数万石，金钱数十万，分给穷苦人民。当时远近饥民，扛着大旗来响应农民军的，就象流水一样，日夜不绝。出现了一片喜庆解放的景象。在一六四一年，攻克归德（河南商丘）时，起义军“使百姓担百货入营中，进行平买平卖”。因此，起义军到处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例如，在几次攻打开封的过程中，都有人民支援，当时，乡民抬大车、门板帮助义军建筑掩体攻城。城内铁匠偷着替自成打造箭鏃，称起义军为“天兵”。城内妇女还以挖野菜为名，出城向起义军提供城内情报。所有这些都表现出起义军同广大人民之间的鱼水深情，这是起义军能够克敌制胜的根本原因。

李自成起义军，为了使广大群众更好地了解农民军的政策，以便更快地打垮敌人夺取政权，他们大造革命舆论，由农民军将领李岩等，编出了通俗易懂的

歌谣，展开了广泛的政治宣传。例如：

“金江山，银江山，闯王江山不纳绢”。“吃他娘，穿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迎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

这些歌谣，迅速地一传十，十传百地传遍各地。起义军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在远离起义军的地方，家家户户都急切地盼望着闯王的部队尽快到来，就连地主阶级，也不得不承认，人民对起义军的欢迎，已达到了“举国若狂”的程度。

毛主席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李自成起义军，在革命的斗争中，越战越强，仅在河南一地，起义军就同敌人进行了数次惊心动魄的大搏斗，（一六四一年的新蔡战役和襄城战役，一六四二年的朱仙镇战役和郟县战役等）给敌人的有生力量以毁灭性的打击。以朱仙镇战役为例，在一六四二年（崇祯十五年）四月，李自成率八十万大军围攻开封，采取“围而勿攻”的战术，以主力消灭敌人的援军，迫使开封守敌坐毙。明朝督师丁启睿，率十几万官军前来增援，其先头部队同起义军侦察三千，相遇在朱仙镇。李自成留下部分兵力围开封，亲率主力南下，占领了朱仙镇南部的有利地形，迫使敌人集结在镇东一带，李自成

作了周密的歼敌部署，事先派一支小分队，化装敌左良玉部援军，同开封守敌接触，令他们“以防守为急”，战斗开始后，不可轻易出兵。从而解除敌人从后面进攻的可能。同时，在敌后东南要道，挖成深广各丈余的巨沟，环绕敌后约长百里，准备切断敌军粮道和拦击逃跑的敌军。战斗从六月下旬开始，起义军以凌厉的攻势首先击溃明军的精锐左良玉部，左军向襄阳方向溃逃，被起义军追杀、截击，死于深沟的不可胜数。丁启睿也率残兵向汝宁方向溃逃，起义军跟踪追杀四百多里。这一场大会战，共歼灭敌军数万，缴获骡马两万余匹，大获全胜。这一仗，基本上摧毁了明政府在河南东部战线的力量。

起义军在河南取得重大胜利后，接着南下湖广，攻占襄阳和许多州县，李自成又发出“剿兵安民”的布告，各地农民更加热烈地拥护起义军。在一六四三年（崇祯十六年），自成改襄阳为襄京。起义军拥戴自成为“新顺王”，在中央设左辅、右弼等官职，地方设府尹、州牧、县令等三级官职，初步地建立了农民政权。

一六四三年，明末农民革命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迫使明政府处于战略防御地位。起义军开始了有目的、有计划战略进攻阶段。这是明末农民战争史上的重大转折。

四

毛主席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一六四三年夏天，李自成主持召开了重要的军、政首领会议，讨论推翻明朝反动政府的作战路线。在会上左辅牛金星，主张先取河北，直捣北京。礼政府侍郎杨永裕，主张顺长江东下，先取南京，断绝敌人的粮道，然后再出师北伐。兵政府从事顾君恩，不同意前两种主张。他指出，攻取南京，虽然比较稳妥，但它的毛病是太慢；直捣北京，如果不胜，连退路都没有，因此它的毛病是太急。他主张先攻取关中，占领西安巩固政权，肃清陕西的反动势力，然后取山西，进兵北京。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进战退守，万全无失。”李自成排除了来自“左”、右两方面军事路线的干扰，采纳了顾君恩的意见，同年出师，向陕西进兵。明政府，匆忙下令陕西总督孙传庭，率十五万军队和三万辆“上载火炮，中载衣粮”的“火车”出陕西，进兵河南，堵击义军。九月，孙传庭进驻河南汝州（河南临汝县），在汝州东南郟县一带，同李自成主力大军对垒相持。孙传庭派一部分主力留守在汝州，汝州是明军运粮的必经孔道。当孙传庭不断向郟县运兵的时候，

李自成派出一支轻骑队，插入汝州的后方——白沙，切断了明军向汝州运粮的道路，并猛攻汝州。这时李自成率大军也展开猛烈攻击，明军前后受敌，溃不成军，“火车”数万辆塞满道路，自成的骑兵健儿凌空而过追杀敌人，步兵勇士手持各种武器，大量的杀伤敌人，明军的兵将互不相顾，纷纷逃命。李自成率铁骑穷追猛打，一昼夜行军四百里，追到孟津，孙传庭率残部逃回潼关。汝州战役，击溃孙传庭部十几万官兵，缴获军器、辎重以数十万件计，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宜将剩勇追穷寇”。闯王大军乘胜向关中挺进。十月破潼关，将大刽子手孙传庭等击毙，明军纷纷溃散，宛如西风落叶，起义军旋及攻下西安。一六四四年（崇祯十七年）正月，起义军改西安为西京，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进一步完善和巩固了农民政权的组织。这时，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已经是“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的百万雄师了。一六四四年二月，大顺军由龙门飞渡黄河，直下太原。再由太原分兵两路，一路由刘宗敏统兵数万为偏师，东出故关，克真定（河北正定）、保定等地，另一路由李自成亲率主力大军攻克大同（山西大同）、宣府（河北宣化）等地，两支大军象一把铁钳一样，直取北京城。

原来，李自成为了更快的推翻明朝反动统治，在正月间，就派出大量战士，他们以“或卖绒货，或酒

米店，或设账市药”作掩护，埋伏在北京城内，有的还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大者买将，小者买兵”，伪装明军官兵各守城上。因此，李自成能够及时了解敌人的动向。当大顺军，已兵临北京城下的时候，埋伏在城内的义军战士，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宣传，使敌军更加闻风丧胆，恐慌不安。李自成挑选五千名年轻勇敢的起义健儿，组成“孩儿军”突击队，他们信心百倍，高唱着自编的战歌：“孩儿军师孩儿兵，孩儿攻城管叫赢，只消出个孩儿阵，孩儿夺取北京城”。在三月十九日凌晨，大顺军攻进内城，明崇祯皇帝走头无路，从后门溜到煤山（北京景山）上吊自杀，明朝地主阶级的全国统治政权，在农民革命直接的打击之下终于崩溃了。

大顺军进驻北京后，李自成立刻出榜安民，下令市民要“各安生理，不许关闭店业”，又严格要求部队，“大师临城，秋毫无犯，敢于擅掠民者，凌迟处死”。因此，北京城的社会秩序，很快的安定下来，农民政权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在农民政权的领导下，释放了被明政府关押在监狱里的“犯人”，并将数以万计的宦官全部驱逐出宫，名曰“打老公”。并到处捕捉反动士大夫，“拘系枷锁，相望于道”。同时，还专门设立一个“比饷追抚司”的专政机构，主要任务是巩固农民政权，为民除害，对贪官污吏进行追赃助饷。

毛主席说：“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农民军对大地主、大官僚进行坚决的镇压“人皆快之”，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北京城在农民政权的领导下，起着翻天覆地的革命大变化。大顺政权还派出自己的大批官员，到所控制的地区掌管政权。有的地区还执行了“贵贱均田”的政策，例如，李自成派往山东诸城县的地方官，“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确贴出告示，号召贫苦农民，“产不分久近，许业主（失掉土地的农民）认耕”。因此，在诸城县不但地主阶级的“百年之宅，千金之产”被农民所占有，而广大农民还夺回了一部分土地，当时有“楼子庄之占，草桥庄之占，草泊庄之占，东潘旺之占……”等等。在诸城地区农民革命热火朝天，“一邑纷如沸釜”。从诸城县的事例中，可以看出，失掉土地的广大农民，在农民政权的领导下，镇压了地主阶级，打乱了封建秩序，并一度夺回了土地。这些情况虽然是属于局部地区，但这是中国革命农民的伟大实践，它具有极为深刻的反封建的历史意义，它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又一个光辉的伟大创举。

在农民革命政权的影响下，各地人民，尤其是佃农和奴仆纷纷起来，向地主阶级进行猛烈的斗争。例如，在江西的吉安（江西吉安市）地区，广大佃农和奴仆纷纷而起，他们“裂裳为旗，销锄为刃”，号称“铲

平王”。主张铲除“主仆、贵贱、贫富而平之”。他们占据了地主的房子，分掉了地主的粮食，并把地主缚在柱子上进行斗争，他们质问地主：“都是人，你为什么叫我奴隶？今后应当反过来”。

由此可以看出明朝政权被推翻后，建立了农民政权，存在的时间虽短，但在农民革命的影响下，广大人民纷纷起来斗垮了地主，使其威风扫地无余。

五

李自成起义军进入北京后，大顺政权面临着三个严重问题。首先，是居住在我国东北的满洲贵族势力的威胁，他们勾结汉族地主阶级，准备推翻大顺农民政权，夺取全国的统治权。其次，是地主阶级复辟的威胁，当时在北京城内，地主阶级分子到处张贴反动标语，制造反革命复辟舆论，进行猖狂的反革命复辟活动；当时在全国也有许多地方，地主阶级组织了反动武装，尤其是在南京成立了南明地主政权，同农民政权相对抗，进行垂死的挣扎。最严重的问题，是盘踞在山海关的明朝总兵吴三桂，拥有一支反动武装，时刻威胁着北京的安全，并且随时随地都有同满洲贵族勾结起来进行反扑的可能。事实证明，被推翻的剥削者，是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他们必然会“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

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革命队伍中来。当时农民军内部的斗争，也是十分尖锐的。大顺军进北京后，一部分在农民斗争高潮中混入革命队伍的地主分子，如牛金星之流，认为飞黄腾达的时机已经到来，热衷于高官厚禄，每天都是“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勾结地主分子，培植私人势力，干着争权夺利的勾当，腐蚀新生的革命政权。尤其是进入北京后，有的人经受不住都市豪华生活的诱惑，经不起官僚地主腐败风气的濡染，他们在生活上也开始腐化起来。特别是明王朝被推翻后，有些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大功告成，以功臣自居，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对阶级敌人丧失了革命警惕。有的领导者对吴三桂盘踞山海关的势力，则认为“此弹丸者，不足当京师一角，用鞋尖踢倒耳”，对江南地主政权的态度，主张“可传檄下也”，对各地地主武装叛乱，更表示“不畏民变”等等。从这里可以看出起义军中，某些领导者如刘宗敏等的骄傲轻敌思想，已经发展到何等危险的程度。

就在这种情况下，吴三桂终于投降了清军，同满洲贵族结成了满汉地主阶级的反动联盟，把清兵引进关内，共同攻打农民军。李自成亲率十万大军征讨吴三桂，由于麻痹轻敌，把全部军队放在山海关内，列成一字长蛇阵，使兵力过于分散，正在同吴三桂进行

激战的时候，满洲贵族的十数万骑兵，集中力量对农民军进行突然袭击，农民军被迫败退下来。这时，北京附近的地主阶级，认为复辟的时机已到，纷纷组织地主武装向农民军进行反扑，向广大人民进行反攻倒算。李自成在这样极端不利的情况下，不得不作战略性的退却。在一六四四年四月三十日撤出北京，向陕西转移，清军乘机占领了北京。大顺军退出北京后，内部矛盾日益尖锐，由于李岩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有过一定的贡献，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因此，遭到了阶级异己分子牛金星的忌恨，竟恶毒地使用阴谋诡计，杀害了李岩和他的弟弟李牟，引起群众的不满，内部斗争进一步激化。举人牛金星，混进革命队伍后，就“心有他志”，进北京后，推行招降纳叛，腐蚀革命的复辟路线，退出北京后，又乘机破坏团结，分裂革命，给革命造成损失。后来，牛金星投降了清朝，充当了无耻的走狗。

大顺军继续在河南、山西、陕西一带进行战斗，虽曾取得多次胜利，但终未能扭转整个战局。一六四五年，清军向陕西进攻，经过激烈战斗，农民军又转移到湖北南部。一六四五年四月，李自成在通山县九宫山地方，亲率二十八人上山察看地形的时候，突然遭到地主武装的袭击，李自成壮烈牺牲，终年三十九岁。

李自成牺牲后，大顺军尚有四、五十万人，广大战士得知李自成牺牲的消息，“满营聚哭”，异常悲痛，他的牺牲，是明末农民革命战争中一个极其重大的损失。大顺军把悲痛化为力量，整顿队伍，踏着同伴的血迹，继承英雄的遗志，继续进行战斗。大顺军余部，在湖南、湖北、四川等各地，同活跃在西南地区的另一支兄弟部队——大西军，相互支援，坚持了十九年的抗清斗争，直到一六六四年（清康熙三年），大顺军的斗争才告结束。

六

明末农民革命战争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次波澜壮阔的群众武装斗争。这次农民战争的主力军是广大贫苦农民，还有手工业者、小商贩、城市贫民和士兵群众参加，直接投入农民战争的人数不下数百万。从长城内外到云贵高原，从四川盆地到滨海丘陵，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从一六二七年起义大军坚持斗争达三十七年之久，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次起义，从小到大，从弱变强，最后创建了百万大军，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农民政权，树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在我国农民战争史上，留下了光彩夺目的篇章。

波澜壮阔的明末农民革命战争，以巨大的革命暴

力，全面的震撼了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起义军在“剿兵安民”的斗争中，把明朝二百七十多万的反动军队，几乎全部消灭。在“杀富济贫”的斗争中，先“将宗室杀死，以行安民”，使十分之九的皇亲国戚被送上了断头台，有数不清的大地主“先倾其家而后杀之”。在革命巨浪的席卷之下，各地的封建政权，纷纷坍倒，最后，击溃了地主阶级统治人民长达二百七十多年的全国封建政权，迫使崇祯皇帝上吊自杀，他的王冠跌落在煤山脚下，成为历史陈迹。它们“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这是明末农民革命战争的巨大历史功绩。

明末农民革命战争是一次反对封建剥削制度的革命。这次农民革命战争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李自成根据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提出“均田免粮”的革命纲领。起义军不但宣布“三年不征”、“五年不征”、“预免民租”等免粮免租的法令，而且在个别地区还进行了“贵贱均田”的伟大尝试。领导贫苦农民“占立田产”、“分其田舍”。象山东诸城、日照等地都出现了清算地主霸占农民土地的斗争。另一支起义军，还把大刽子手杨嗣昌“霸占土地，查还小民”。因此，“均田免粮”的纲领，必然成为动员广大贫苦农民起来革命，猛烈地冲击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巨大物质力量。它们以暴风骤雨之势，废除了封建王朝的“皇粮国税”，摧毁了千百座

的大地主庄园。打乱了地主阶级土地占有关系，制止了土地兼并恶性发展，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象这样把平均土地的要求，作为一个政治纲领明确地提出来，这在中国农民革命斗争史上还是第一次。它表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民革命的斗争水平，已提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

同时，李自成还提出了“平买平卖”的政策，进一步调动了城市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参加农民革命的积极性，狠狠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城市工商业的重利盘剥与垄断，从而推动了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这是明末农民革命战争的新功绩，它为中国农民革命战争的历史作用，增添了新的光彩。

毛主席指出：“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明末农民起义军，在推翻各级封建政权的过程中，对其他三种权力，也进行了猛烈地扫荡。起义军焚毁宗族祠堂，使地主贵族“覆宗绝祀者，不可胜纪”，给封建的族权以沉重打击。他们不但焚毁皇帝的祖坟，而且捣毁城隍庙，“斫神象如碎粉”，使神权动摇。同时受压迫的妇女，也直接杀向反封建斗争的战场，象红娘子领导的起义军，李自成队伍中的妇女，甚至有的起义军还有“婆子军”的编制。她们同千百万阶级兄

弟并肩战斗。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她们摆脱夫权的束缚，批判了男尊女卑的吃人礼教。特别是这次革命，同维护封建四种权力的儒家思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反动的理学家王守仁，曾提出农民必须“当差纳粮”，革命的农民则提出“不当差不纳粮”，孔孟之徒宣扬“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起义军则是镇压地主阶级，“刑不及庶人”，保护人民，是“不杀平民，唯杀官”。尤其是起义军所到之处，烧毁尊孔的文庙，使各地文庙“遗迹鲜有存者”，并把《六艺》等宣传孔孟之道的经书，“供马卧”，或烧成“灰烬”。使祭祀反动理学家程颢、程颐的二程祠“庙貌倾圮，俎豆（祭器）沦落”，同时，使程庙中保存的《四书》、《五经》和《二程全书》“斯灭无存”，全部毁掉。当时把儒家思想和它所维护的封建秩序，打得落花流水，使封建的“纲常法纪，扫地无余”。地主阶级曾咒骂参加起义的人，是“不顾孔孟道义，不顾祖宗德泽，不顾一身节义”，这种无耻的咒骂，正反映了革命人民反孔斗争的战斗光辉。

在明末农民战争中，投降和反投降的两条路线斗争，始终很激烈。这是农民和地主两个阶级的斗争在起义军内部的反映。李自成为首的革命力量，在起义军内部不断坚持反投降斗争，给明朝政府“剿抚”并用的反革命两手以及革命内部的投降路线以沉重打击，

从而推进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在一六三九年，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明朝政府，对李自成“以檄谕之”降，但“自成出谩语屈强”的拒绝这种可耻的“招安”。李自成率数十名战士，路过谷城时，已投降的张献忠，洋洋得意的劝李自成“从我降”，何必“仆仆奔走乎？”李自成仰面冷笑并坚定的回答：“不可。”并率领少数战士继续战斗。在一六四二年，革命开始进入高潮时期，投降和反投降的斗争更加激烈。起义军首领之一的罗汝才，是被敌人腐蚀的蜕化变节分子，在敌人“招安”阴谋的引诱下，“且降且叛”，曾数次投敌。后来又投归李自成。在一六四二年，起义军围攻开封时，罗汝才借口缺粮，准备“谋他徙”，要搞分裂，李自成“出余粮”帮助，才把他留下来。当派他执行战斗任务时，“汝才所部怨自成”，不愿执行命令。这时混进起义军内部的地主分子，也从中进行阴谋挑唆，有一个姓陈的地主分子，主张要“以口舌，令二贼相图，可并灭”，还有一个出身孝廉的地主分子吉珪，向罗汝才说：“某观李帅（自成）非容人者”，“将军何不早自计也”。这时罗汝才“以天命未改，潜谋归顺（明朝），欲杀自成献功”。斗争日渐激烈。李自成经过周密准备后，采取断然措施，处决了罗汝才，后来又镇压了陈、吉两个地主分子。在罗汝才所部中，少数执行投降路线的变节分子，也乘机离去，投降了明朝。李自成将罗汝

才旧部进行了改编，“参之以亲信”。这次反投降斗争的胜利，有力的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发展。明末农民起义军中，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革命，反对投降的两条路线斗争，给后代革命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七

明末农民战争失败了，原因较多。其中最引人深思的一点，是不能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不断加强反腐蚀的路线斗争，滋长了太平观念，犯了骄傲的错误。在进北京以前，李自成领导的百万大军，是一支纪律严明，勇敢、朴素的革命队伍。领导集团同士兵同甘共苦，尤其是李自成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并坚决进行反腐蚀的斗争。对那些生活腐化的起义军将领，常流露出内心的憎恶。农民军首领之一的罗汝才，妻妾成群，“被服纨绮”，“酣燕歌舞”，“自成尝嗤鄙之”，批评他“多嗜好，不足数”是“酒色之徒”。曾有一个敌官吏叫张国绅，向起义军投降后，首先把关中出名的美女邓太妙“进献”给李自成，企图达到腐蚀领导者的卑劣目的。李自成非常气愤，为了杜绝此类事件继续发生和整肃全军，立即将张国绅处决，并派人将邓氏送回家去。表现出这位农民英雄的高贵品质。

进北京后，起义军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初到北京的时候，起义军中的马厮、伙夫都穿着粗布的旧衣

服，不久，有的人就换上了丝织品，还有的人“高唱边关太平调”，认为天下太平了，产生了“富足还乡之心”。特别是领导集团中，有的人以功臣自居，住进了地主贵族的深宅大院，过着笙歌燕舞的生活，开始厌倦斗争。象刘宗敏（铁匠出身）这样一个身经百战的著名将领，也有腐化的迹象。李自成虽然还保持其艰苦朴素的作风，头戴白毡帽，身穿蓝布上马衣，“早起啜小米汤”，但是，他不能继续加强反腐败的路线斗争，无力杜绝其部下的这种变化。

特别是推翻明朝的全国统治政权，这一“天崩地解”的巨大胜利，有些人为了这种胜利的形势所陶醉，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对阶级敌人丧失了警惕，忽视了内外复辟势力的疯狂活动，尤其是满洲贵族这个大敌。看不到新政权在被腐蚀。在新的斗争形势下解除了思想武装，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以至使政权得而复失。最后终于失败了。

明末农民战争的失败教训，给我们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借鉴，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腐蚀演变，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高度警惕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毛主席在一九四四年四月，抗日战争胜利的前一年，也正是三百年前李自成起义军在北京活动的时期，

谆谆告诫全党同志，要以明末农民起义的历史教训“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今天，伟大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线，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这些胜利，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革命所不能比拟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学习明末农民革命战争的历史，重温毛主席的亲切教导，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清代中叶各族 人民大起义

鸦片战争前的清王朝（公元一六四四年——公元一八四〇年），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中叶的封建社会，早已进入它的末世阶段。社会各种矛盾普遍尖锐，封建制度本身百孔千疮，地主阶级为维持其苟延残喘的统治，凶残的吞食着劳动人民创造的一切财富。因此，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使其迅速走向灭亡。

一

清代中叶，地主阶级对广大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又达到空前严重的程度。它们用各种卑劣的手段，疯狂地掠夺土地，使土地高度集中。乾隆统治时期，怀柔郝氏占有良田一万顷。嘉庆统治时期的大臣和绅，占有土地八千余顷。有一个官僚叫百令，任广东巡抚不到一年，就掠夺土地达五千顷之多。除官僚地主和一般地主掠夺土地外，富商大贾和高利贷者，也通过“乘机图占”和“广为收买”等手段占有大量土地。因此，在全国造成了“旧时有田之人，俱为佃耕之户”的

严重局面。

失掉土地的广大农民，大部分沦为地主的佃户，备受地主的奴役和剥削。清代地租剥削率不但达到百分之五十至八十以上，而且佃户租种地主土地之前，还要先交“押租”和“预租”，甚至平时地主也要“寅年吃了卯年租”。地主的恶奴下乡催租时，又向佃户索取“脚步钱”、“草鞋钱”、“酒食费”等等。当佃户通过辛勤的劳动，把下等田变成上等田、荒地变成熟地时，地主就立刻加租，否则，地主就把土地收回去，另以高租出佃，叫“增租夺佃”。在北方八旗大地主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被叫作“屯居旗下家奴”，实质上是庄田地主的奴仆，他们要向地主交纳繁重的地租，稍有拖欠，立刻被锁拿到府，受尽各种折磨。在冰天雪地的寒冬里，遭“冷水灌顶”之罪，晚间受“铁索加头”之刑，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清代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除受清朝政府的剥削和压迫外，还受到本民族的剥削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广大满族人民，也不断失掉土地，沦为地主的佃户和雇工，同我国各族人民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清朝政府的各级官吏，更是贪污腐化成风。清政府不但通过征收钱粮和捐税来维持其反动统治，同时，将定额之外的收入提取一部分，供官吏个人的额外开支，美其名曰“养廉银”，实质上把官吏贪污合法化。

其结果是“养”而不廉，越“养”越贪。乾隆末年，毕沅为湖广总督，福宁为巡抚，陈准为藩司，三人狼狈为奸，向人民敲榨勒索，当时民谣说：“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而且官位越高，贪污越大，军机大臣和珅，当政二十余年，大量的搜刮民脂民膏，被嘉庆皇帝赐死后，其产财估银，约达十亿两，超过封建国家二十年的赋税总收入。由于他严重的威胁了皇权统治，因此，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谚语。“贪不贪，一任州官，雪花银子三万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等民谣，有力的揭露了各级官吏普遍贪污的丑恶嘴脸。地主阶级从劳动人民手中掠夺去的财富，进行无止境的挥霍，过着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乾隆皇帝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避暑山庄七十二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热河人民，讽刺他在该地建筑的山庄说：“皇帝之庄真避暑，百姓仍是在热河”。有一年，为乾隆母亲祝寿，各地献纳上万个千奇百怪的小金佛。他还花费三千多两黄金铸造“金发塔”，用来盛他母亲掉下来的头发。有一次乾隆皇帝出外巡遊，住在怀柔大地主郝氏家，这个地主所供奉的“水陆珍错至百余品”，“一日之餐，费至十余万”。京西大地主祝氏，“富逾王侯，屋宇至千余间”，园亭环立，“遊十日未竟”。《红楼梦》中对大地主阶级的腐朽生活，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宁国府、荣国府，金银财宝如粪土”，正反映了乾隆时期

大地主阶级腐朽的罪恶生活。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广大人民反封建斗争的声浪，起伏不停。农村中的广大佃农，不断掀起抗租据庄运动。他们“乘风鼓浪，竖旗抗租”，“霸耕”地主的庄田，反对夺田另佃。城市中的广大手工业工人，也不断进行反封建奴役、反克扣工资的“齐行叫歇”（罢工）斗争。他们“散发传单”，“成群结队，抄打竟无虚日”。特别是各族人民的武装起义更是连绵不断，一浪高过一浪。所有这些斗争，都在有力的冲击着封建统治的堤坝。

二

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湘、黔地区，爆发了苗族人民大起义。

湘、黔地区的苗族人民，身受清朝政府和本族封建“头人”的双重压迫。清朝政府以上贡的名义向苗民进行剥削，但土司乘机搜刮，“上征一，而土司取十、取百”，甚至“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迫使苗民倾家荡产。同时，满、汉地主阶级和高利贷的魔掌，也不断伸入苗族地区。他们以“放新谷”、“断头粮”等借债手段，进行高利盘剥，使广大苗民刚收获完毕，已是“盗无余粒”，“此债未清，又欠彼债，剥削既久，田产罄尽”。另外，剥削阶级还以各种名目进行敲榨勒

索。苗民每家一灶，要交“火坑钱”二钱三分银子，入山垦荒，每只锄头要纳三钱五分银子。甚至杀死苗民，还要强迫其家属交“垫刀金”，苗民去告状，清政府还要“规矩钱”。正是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广大苗族人民不断掀起反抗斗争。

一七九五年的春天，贵州松桃厅（贵州松桃县）大寨的石柳邓首先率众起义，接着湖南永绥厅（湖南花垣县）黄瓜寨的石三保、凤凰厅（湖南凤凰县）苏麻寨的吴半生、乾州厅（湖南吉首县）平陇寨的吴八月等纷纷响应，一时起义“火光照百十里”。起义军迅速的控制了湖南、四川、贵州交界的广大地区。起义开始时，提出了“逐客民，复故土”（驱逐满、汉地主等反动派，收复被他们剥夺去的土地）的口号，还发出“打到黄河去”、“不到黄河心不甘”的誓言，表示其奋战到底的决心。

苗族人民掀起的革命风暴，使清朝政府十分惊慌，立即调遣云贵总督福康安等率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七省的十余万军队，围攻起义军。这一年四月间，福康安进兵永绥，企图进攻黄瓜寨。起义军在鸭保寨进行拦击，使清军“粮道不通”，湖南提督刘君辅，从永绥出兵，妄图打通鸭保粮道，结果被起义军重重围困，几乎全军覆没，而“鸭保粮道卒不通”。同时，由福宁率领的另一路清军，由瀘溪

往援乾州，中途遭到起义军的伏击，几乎全军被歼，福宁躲藏在辎重车中，“仅以身免”。各地起义军越战越强，使敌人望风披靡。

“官有万兵，我有万山；
其来我去，其去我来。”

苗族人民，使用这一传统的游击战术，给清军以沉重打击。起义军平时分散各处，如果发现敌情，“一鸣锣吹角，四面涌如潮水”，在战斗中，他们三、五成群，或“附木依崖”，“或在山巅”，“或在沟内”，准确的射击敌人，使“兵勇不可防备，每被戕伤”。当战斗失利时，立即分散隐蔽，使敌人无法追踪，当敌人收兵后，“男女赤足，健捷如飞”，漫山而来，截击敌军后路。因此，清军的处境，是“前坚后险”，实有“羝羊触藩”之势。

一七九五年的秋天，吴八月以平陇为据点，称吴王，统一起义军号令，石柳邓、石三保等都在他的指挥下进行战斗。清朝政府又采用“以苗攻苗”的阴谋诡计，来分化瓦解起义军。在敌人的诱惑下，鸭保寨百户吴陇登变节投敌，并使用奸计捕杀了吴八月。吴八月是这次起义的著名领袖，广大苗族人民世代都怀念他，在民间广泛的传唱着：“平陇吴八月，上山能降虎，下海能擒龙，那怕清兵千千万”的山歌。人们用最美好的言词歌颂这位敢造反的起义英雄，并鼓舞自

己同反动派继续战斗。吴八月被捕牺牲后，清军集中兵力围攻平陇寨，石柳邓率起义军坚持保卫平陇的战斗。从一七九六年九月，一直坚持到十二月，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起义军又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石柳邓壮烈牺牲，平陇失守。起义军转入山地，继续进行英勇顽强的战斗。

这时候，由于湖北、四川一带白莲教组织的大起义，正在轰轰烈烈的展开，清政府被迫把镇压苗民起义的大部分军队调去镇压白莲教起义。对苗民起义军则采用反革命两手的狠毒政策。一方面假意许诺“苗地归苗，民地归民”的谎言，企图暂缓人民的反抗，另一方面加紧推行“专守碉堡”和“屯田养勇”的反动政策。清朝政府到处修筑碉堡，大力推行“屯田养勇”，培植地主武装。但是，广大苗民，并没有被收买和吓倒，而是继续战斗。起义军有时“盘踞村庄”，组织力量；有时围攻敌人碉堡，痛击“乡勇”，不断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一八〇四年（嘉庆九年），反动派下令，在永绥厅各寨，收缴苗族人民手中的武器，并以丈量土地为名进行反攻倒算。广大苗族人民，在石宗四（曾被吴八月任命为起义军的将军）等人的领导下，进行“抗缴械，阻丈田”的反倒算斗争。并聚众“数千人，围夺官粮”，同大剑子手傅鼐率领的反动乡勇，进行激烈地战斗。苗民起义军以一万多人的兵力，夜间突袭傅

肱的驻地——阳孟寨，傅肱惊慌失措，光着脚，狼狈逃窜。苗族人民大起义，一直到一八〇六年（嘉庆十一年），才暂告平息。

苗族人民大起义，坚持了长达十二年之久，迫使清朝反动政府调动了七个省的数十万兵力，消耗大量军费。而大批反动军队被消灭，并使福康安以下大小头目一百多名丧命。这次起义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

三

苗民大起义第二年（一七九六年，嘉庆元年）的春天，在川、楚地区又爆发了白莲教组织的农民大起义。

清代中叶以后，许多农民起义，是通过秘密宗教和秘密会社的形式组织和领导的。在北方以白莲教为中心，在南方以天地会为中心组织革命活动。为了避免官府的注意，它们的名称经常变化，支派很多。

川、楚、陕、豫四省边界的广阔地区，明清以来聚集了大量的流民，群众基础较好。起义的领导者们，不断的通过白莲教的形式组织和扩大革命力量。由于革命的力量不断扩大，使清朝统治者日夜不安。清政府根据乾隆皇帝要把白莲教徒“根除干净”，“勿使漏网”的反动命令，派出大批走狗，到处搜捕白莲教徒，

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残暴的勒索和屠杀。仅在荆州、宜昌等地，就“株连罗织数千人”，使广大人民家破人亡，无以为生。因此，“仇官思乱”的民情，更加高涨，革命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一七九六年二月，湖北宜都的广大农民，以“官逼民反”相号召，纷纷起义。三月，襄阳王聪儿（即齐王氏）、姚之富等聚众万人起义，接着各地人民纷纷响应。一时“荆、宜、襄、郢、施五郡，所在充斥，多且数万，少且数千人”，造成了“三楚震动”的局面。同年十月，四川达州的徐天德等也纷纷树旗造反。起义烽火已成燎原之势。

各地起义军中，以襄阳王聪儿、姚之富为首的一支最为强劲。王聪儿，湖北襄阳人，幼年跟随父亲流浪各地，以走马卖艺维持困苦生活，受尽了地主阶级的污辱和迫害。她为了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和争取自身的解放，英勇地冲破了孔孟之道的罗网，坚决走上了革命道路。她同其夫齐林都是白莲教徒，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后来齐林被捕牺牲。王聪儿剪去长发，身穿白衣，执刀跨马，领导广大群众，投入火热的武装革命斗争。这支队伍在湖北一带给敌人以重创后，于一七九七年（嘉庆二年），分兵三路向河南进军，再由河南挺进到陕西境内。由于遭到敌人的重兵阻击，起义军采用“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的战术，迷

惑敌人，从而转入四川，在东乡同徐天德等起义军会师。起义达到高潮阶段。各路起义队伍，分别以青、黄、蓝、白、绿等五色为号记，又设掌柜、元帅、先锋、总兵、千总等各级领导职位。王聪儿所部称“襄阳黄号”，徐天德所部称“达州青号”。各路起义军旗帜鲜明，统一领导，相互配合，分别在各地进行共同的反封建斗争。

农民革命的风暴，使清朝统治者心惊胆裂。乾隆皇帝在宫里，大念“西域秘咒”，企图咒死革命首领，并慌忙调遣湖北、河南、陕西、四川、甘肃等五省兵力，又不断增派京营满兵、陕甘回兵、山西兵、广东兵、苗疆兵和东北的索伦兵等前来帮凶，进行大规模的“围剿”，企图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但是，同这种反动的主观愿望相反，“愈剿愈炽”，革命烈火越烧越旺。统治者还企图用“招安”的阴谋，从内部瓦解起义军，但起义军与之针锋相对，他们撕毁“招安”告示，捕杀“招安”使者，清除内部投降派，使革命力量更加强盛。清朝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对起义军，是“剿之不畏，抚（招安）之不来，绝无悔心”。

王聪儿为首的农民军，率主力从川东再向湖北挺进，在夔州、白帝城一带，遭受敌军阻击，农民军不畏险阻，“燃炬夜攻，更番迭战”，以破竹之势击溃清兵，打回湖北，转战于房县、竹山和郧县各地。在郎

县击毙清朝护军都统惠伦，再经陕西转入四川。起义军到处都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他们所到之处，有房屋可以住宿，有衣食火药接济，有骡马可以换乘，有人民“为之响导”。农民军越战越强。有时“连营二十里，分队迭战”，同敌人展开正面战斗，有时“从大股分出小股”，化整为零，在“万山之中任奔走”。在战斗中创造了许多打击敌人的方法，他们不但使用大炮和鸟枪，而且创造了“木炮”、“线枪”和“火弹”；不但利用夜间和云雾等气候变化，打击疏于戒备的敌人，而且乘“上风顺放烟火”眯敌眼目，痛歼顽敌。还利用“白鸽”做为招集队伍的信号，组织新的战斗。总之起义军机动、灵活的打击敌人，活跃在川、陕边界一带。

清朝政府，集多年的反革命战争经验，以大量金钱为诱饵，招募乡勇，扩充反革命力量。同时还采用“坚壁清野”、“筑堡团守”的毒辣手段，强迫人民入堡，企图断绝农民军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在这一反革命策略的基础上，集中兵力围攻起义军主力。

一七九八年（嘉庆三年），被嘉靖皇帝咒骂为“贼中首逆”的王聪儿，率马、步军两万，进兵宝鸡、岐山一带，围剿官兵，使西安守敌手忙脚乱。后来农民军在郿西三岔河附近，遭到强敌围攻，双方展开激战，起义军遭到重大损失。最后，年仅二十二岁的王聪儿和姚之富以及队伍里仅剩下的十几名妇女宁死不投降，

相继跳崖，壮烈牺牲。其余部同四川起义军会合，继续战斗。

四川的起义队伍，从东乡大会后，在徐天德等领导下，到处打击敌人。起义军在一八〇〇年（嘉庆五年），闯过涪江、嘉陵江，袭击川西，迫使成都戒严。清廷十分震惊，清朝皇帝气极败坏，迫令无能为力的四川总督魁伦自杀。另一路起义军，穿过岷山草原，转战于岷州、秦州一带。后来徐天德等虽然相继牺牲，但革命烈火仍在到处燃烧。到一八〇五年（嘉庆十年），才告结束。

白莲教组织的大起义，是清代中叶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它在湖北、四川、陕西一带“绵亘数千里”的老林中，坚持九年多的战斗，起义群众达数十万。曾击毙清朝一、二品大员二十余人，副、参以下军将四百多号，横扫了湖北、四川、陕西、甘肃、河南等五省的封建势力。

四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八一三年（嘉庆十八年），在北方又爆发了八卦教组织的农民起义。

八卦教又名天理教，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流传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各地。信八卦教的人大都是贫苦的农民。当时八卦教的领导人林清和李文成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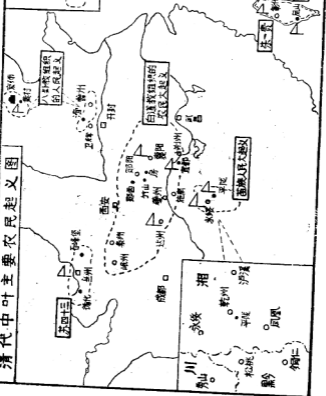


王聪儿起义军重创清兵

清代中叶主要农民起义图

▲ 起义爆发
地点

○ 起义波及
地区



林清是河北大兴县黄村人。李文成是河南滑县人，木工出身，人称“李四木匠”。人们还都传说他是“李自成转世”，希望他能象李闯王那样，领导人民干革命。林、李二人，都在本地以传教为名，组织反清活动。

八卦教规定，凡是入教的人，都要缴纳“根基钱”，“凡入教的给钱二、三十文不等，给粮食一、二升至一、二斗不等”，并答应起义成功后，分给教徒们土地。还“填注簿号”，开写合同交给本人作证据。领导者把教徒缴纳的“根基钱”，用作帮助贫苦农民维持生活，在黄村一带，“乡村仰食者，万余家”。同时，还用作购买战马、铸造武器、操练战士等革命活动的经费。由于八卦教支助贫苦农民，特别是许下分给土地的诺言，因此，八卦教组织的一系列革命活动，都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支持，使革命力量迅速得到发展。

一八一二年（嘉庆十七年），李文成到黄村会见林清，商讨革命大计，他们约定在明年九月十五日，各地同时起义。林清准备打进皇宫，推翻清朝最高统治政权，李文成决定选派精干人员，化装商贾，按时到北京参战。并且规定了联络口号：“明号是奉天开道，暗号是得胜二字”。此后，他们分别进行准备活动。

不料河南滑县起义的机密被泄露，一八一三年九月五日，李文成被捕。反动知县对他进行严刑拷打，令

其招供，李文成“坚不吐实”，并斥责县令诬良为盗，县令气极败坏，竟用夹棍将李文成的腿骨夹断，但他所得到的回答，是“仍不吐实”。李文成在被捕期间，严守革命机密，同敌人展开英勇斗争，他的身体虽然遭到反动派的摧残，但是，他的革命意志，是阶级敌人永远也不能战胜的。

广大革命群众，为了营救李文成，决定在九月七日提前起义。三千多名起义军一举攻克滑县，镇压了反动知县，救出了李文成。李文成出狱后，指挥起义军“分众守城”，“联络各路，据守要害”，又“开帅府，设羽帐”，每发出一项命令，“军士传呼，声激数里”，大振革命军威。李文成被推为天王，下设人王、地王、军师、元帅等大小头领九十余人。初步的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各地群众纷纷响应，同地主阶级展开了英勇斗争。

清朝政府严密封锁了滑县起义的消息，因此，林清仍按原计划组织起义，有关“将帅军伍”，旗帜号令，都准备就序。九月十四日，派二百余人的队伍，分成两个小分队，头裹白布，身藏暗器，进入北京城。潜居在酒楼茶馆之内，准备行动。九月十五日，他们分别由东华门和西华门闯入紫禁城，立刻同清朝护军展开械斗，起义军迅速的集中在“隆宗门”外，有的战士还冲到了“养心门”，斗争非常激烈，在今天故宫的“隆宗

门”匾额上，还保存着当年起义战士射向阶级敌人的箭头。由于起义军战士对宫内地理情况不熟，时间拖的过长，又无外援，加上敌人已将清军火器营调入宫内，起义军被迫退出皇宫，有三十多名战士壮烈牺牲，这次起义失败了。这一场在地主阶级统治心脏中，进行的惊心动魄的武装搏斗，使皇权遭到巨大的震动。当时，在北京城“人心惶惶，讹言四起”，嘉庆皇帝慌忙从热河赶回北京，对革命群众进行疯狂镇压。由于叛徒告密，林清在黄村被诱捕，遭到反动派的酷刑拷打，但林清“默然无语”，坚强不屈，终于被敌人杀害。

李文成率起义军攻克滑县后，又控制了距滑县十八里路的道口镇，该镇是河南的屯粮区，敌人集中兵力同起义军争夺道口镇，起义军放弃道口镇，敌军乘势把滑县包围起来。起义军一方面坚守滑县，同时，李文成率领部分军队突破敌人包围，清政府立刻将围攻滑县的官军，分出部分兵力，追赶李文成，双方在辉县司寨展开了激烈战斗。起义军“据险掷石，枪炮齐发，官军死伤甚众”、“尸如山积”，给敌军以沉重打击。最后进行激烈的巷战，李文成等起义战士，战斗到最后，乃“举火自焚”，壮烈牺牲。

清政府集中兵力围攻滑县，滑县起义军展开英勇的反围攻斗争，李文成之妻张氏，曾率领小分队，“夜捣官军，三入三出，官军被戕者甚众”。他们从九月初

七到十二月初十，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条件下，坚持战斗达三个月之久，城破后又展开激烈巷战。事先，起义首领们，曾劝张氏化妆难民，出城先走，但她坚定表示：“城亡与亡，不死者非英雄”，并“挥刀巷战”，杀伤许多敌人，张氏为了不受敌人的污辱，最后“自尽”牺牲。守滑县的起义军，终因孤立无援而失败。

这次革命不但消灭了大量清军，而且象一把锋利的匕首，插入地主阶级统治的心脏——紫禁城，给封建的皇权统治以致命的创伤。统治阶级也不得不承认，这次攻打皇宫的事件，是“汉唐宋明未有之事”。

五

清代中叶的各族人民大起义，虽然相继失败，但是，那种敢造反、敢革命的斗争精神，是永存不灭的。农民起义军，有时在万山丛中打击被拖疲的敌人，有时在监狱里同刽子手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甚至敢于闯进戒备森严的皇宫里造反，搅得敌人惊恐万状，闻风丧胆。他们的斗争业绩，有力的粉碎了“上智下愚”的儒家谬论。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国的劳动妇女，在这次起义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她们同广大起义的阶级弟兄一样，不畏强暴，英勇战斗。象王聪儿，指挥千军万马，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李张氏同顽敌短兵相接，把敌人杀得人仰马翻。而又都是宁死不屈，壮烈

牺牲。她们不愧是农民革命中的妇女英雄。她们所创造的历史功绩，有力的批判了“男尊女卑”的吃人礼教。

在这次反封建斗争中，各族人民并肩战斗，互相支援，在战斗中增强了革命团结和血肉联系。一七八一年，苏四十三领导的回民起义，就有撒拉族人民参加；一七二一年朱一贵和一七八六年林爽文领导的台湾人民起义，都是由汉族和高山族人民所组成。特别是苗族人民大起义，不但有“气类相通”的贵州布衣族人民起义应援，而且同汉族人民共同战斗。一七九四年，四川省秀山县青龙屯的汉族人民，树起反抗杨姓土司的造反大旗，石柳邓立即率苗族人民前往支援，曾捣毁土司衙门，分掉土司财物。一七九五年，苗民大起义，也有汉族人民参加，所谓“有教匪（白莲教）潜诱之”，正说明了白莲教参预斗争的事实。特别是苗民大起义和白莲教组织的大起义，在斗争中遥相呼应，使清政府顾此失彼，疲于奔命，都为对方的反封建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事实表明，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它们在反剥削和反压迫的斗争中，联合起来，共同推动着祖国的历史前进。

这次各族人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冲击了腐朽的生产关系，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以清政府为首的地主阶级，镇压了各族人民大起

义之后，更加疯狂百倍的进行反攻倒算，不断加重对各族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因此，各族人民的反封建斗争也从未停止，武装起义连绵不断。尤其是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强盗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加深，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终于在我国近代史上形成一个反侵略、反封建的巨大的农民革命风暴——太平天国运动。

一九七三年九月一日完稿

一九七五年八月一日修改

附：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简表
(公元前475年—公元1840年)

公元年代	起义名称和首领	纲领口号	政权建设和称号	主要活动地区
前209—206年	秦末农民战争陈胜吴广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国号“张楚”	黄河流域
前99年	徐勃起义徐勃			山东
前22年	铁官徒起义申屠圣等		称“将军”	河南
17年	瓜田仪起义瓜田仪			苏州一带
17年	吕母起义吕母		称“将军”	山东日照县境
17—25年	绿林大起义王匡等		称“汉”建元“更始”	湖北、河南陕西
18—27年	赤眉大起义樊崇		称“汉”建元“建世”	山东、河北江苏、陕西
17—24年	铜马起义东山荒等			河北
109—111年	张伯路起义张伯路		称“将军”	山东、辽东沿海一带
111—112年	杜琦等起义杜琦		称“安汉将军”	甘肃一带

公元年代	起义名称和首领	纲领口号	政权建设和称号	主要活动地区
139—145年	徐凤马勉起义 徐凤马勉		徐凤称“无上将军” 马勉称“黄帝” 置百官	安徽
145年	华孟起义 华孟		称“黑帝”	九江一带
154—156年	公孙举、东郭襄起义 公孙举、东郭襄			山东
165年	胡兰起义 胡兰			湖北一带
172年	许昭起义 许昭		称“阳明皇帝”	浙江一带
184年	黄巾大起义 张角	“苍天已死 黄天当立”	自称“天公” 将军	河南、山东、 河北、湖北、 浙江、江苏
303年	张昌起义 张昌		称“汉” 建元“神凤”	长江中上游

公元年代	起义名称和首领	纲领口号	政权建设和称号	主要活动地区
306—307年	刘伯根王弥起义 刘伯根王弥			河南、山东
307年	汲桑起义 汲桑			河南、河北、山东
311—315年	巴蜀流民起义 杜弢		称“平难将军”	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广西
399—410年	孙恩卢循起义 孙恩卢循		孙恩称“征东将军” 卢循称“平南将军”	浙江、江苏、广州、江西一带
432—437年	赵广起义 赵广		称“蜀王” 建元“泰始”	四川
445—446年	“卢水胡”盖吴起义 盖吴		称“天台王” 置百官	陕西
485—486年	唐高之起义		称“吴国” 建元“兴平”	浙东
523—525年	六镇各族人民起义 破六韩拔陵			内蒙
524—531年	关陇各族人民起义 万俟丑奴等		称“天子”	甘肃、陕西

公元年代	起义名称和首领	纲领口号	政权建设和称号	主要活动地区
528年	河北流民起义 邢杲等		称“汉王” 建元“天统”	山东、河北
611—624年	隋末农民大起义 翟让 窦建德杜伏威等		窦建德称“长乐王” 建元“丁丑”	山东、河南、河北、江淮一带
653年	陈硕真起义 陈硕真		称“文佳皇帝”	浙江东部
762—763年	袁晁起义 袁晁		建元“宝胜”	浙江、江西
859—860年	裘甫起义 裘甫		称“都知兵马使” 建元“罗平”铸印“天平”	浙江东部
868—869年	桂林戍卒起义 庞勋			桂林、山东、安徽、江苏等地
874—884年	唐末农民战争 黄巢等	“冲天均平”	国号“大齐”建元“金统”	山东、河南、陕西、湖北、安徽、江苏、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河北等地

公元年代	起义名称和首领	纲领口号	政权建设和称号	主要活动地区
约930—943年	张遇贤起义 张遇贤		称“中天八国王” 建元“永乐”	广东、江西
993—995年	王小波李顺起义 王小波李顺	“均贫富”	国号“大蜀”建元“应运”	四川
1043年	京东路起义 王伦			山东、安徽、 江苏
1043	东西路起义 张海等			河南、湖北、 陕西交界
1043—1047年	瑶族人民起义 盘知谅唐和			湖南
1047—1048年	王则起义 王则		国号“安阳”建元“得圣”	河北
约1119—1122年	梁山泊起义			山东、河北、河南、 江苏各地
1120—1121年	方腊起义 方腊	“法平等， 无有高下”	称“圣公” 建元“永乐”	浙江、安徽、 江苏、江西
1130—1135年	钟相杨么起义 钟相杨么	“等贵贱 均贫富”	钟相称“楚王”建元“天载”	洞庭湖地区

公元 年代	起义名称 和首领	纲领 口号	政权建设 和称号	主要活动 地区
1130—1132年	范汝为起义 范汝为			福建、江西、 浙江
1214—1220年	红袄军起义 杨安儿 杨妙真等		建元“天顺”置官署	山东、河北
1351—1368年	红巾大起义 刘福通徐寿辉 朱元璋	“摧富益贫”“杀尽不平”	刘福通起义军建国号“大宋”建元“龙凤”	辽河、黄河、 长江、珠江流域
1420年	唐赛儿起义 唐赛儿			山东东部
1447—1451年	叶宗留矿工 起义 叶宗留			浙江、福建、 江西交界
1448—1449年	邓茂七佃农 起义 邓茂七	“铲平”	称“铲平王”	福建
1449—1450年	黄萧养起义 黄萧养		称“顺民天王”建元“东阳”	广州一带
1464—1471年	刘通李原流 民起义 刘通李原		刘通称“汉王”建元“德胜”	湖北、陕西、 河南交界

公元年代	起义名称和首领	纲领口号	政权建设和称号	主要活动地区
1510—1512年	刘六刘七起义 刘六刘七	“重开混沌之天”	设“奉天征讨大元帅”职务	山东、河南、山西、河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
1510—1511年	兰廷瑞鄢本恕起义 兰廷瑞鄢本恕		兰称“顺天王”鄢称“刮地王”	四川、陕西、湖北
1622年	徐鸿儒起义 徐鸿儒		称“中兴福烈帝” 建元“大成兴胜”	山东
1627—1664年	明末农民战争 李自成 张献忠等	“均田免粮”	李自成建国号“大顺” 建元“永昌” 张献忠建国号“大西” 建元“大顺”	黄河、长江流域及云贵等广大地区
1721年	朱一贵起义 朱一贵		称“中兴王” 建元“永和”	台湾
1764年	维族人民起义			新疆

公元年代	起义名称和首領	綱領口號	政權建設和稱號	主要活動地區
1774年	王倫起义 王倫			山东
1781年	回民起义 苏四十三		称“回王”	甘肃
1786—1788年	林爽文起义 林爽文		称“順天盟主大元帥”建元“順天”	台湾
1795—1803年	苗族人民大起义 石柳邓 吴八月	“逐客民 复故土”	吴八月称“吴王”	湖南、贵州、 四川边界
1796—1805年	川楚白蓮教大起义 王聰儿等	“官逼民反”	设掌櫃、元帥等职	四川、湖北、 陕西、甘肃、 河南
1813年	八卦教起义 林清李文成		李文成称“天王”下设地王人王元帥等职	河北、河南、 山东
1826年	高山族人民起义 黄文润			台湾
1831年	瑶族人民起义 赵金龙			湖南、广东